文化百科丛书

宗臣史家

杨明珠 著





文物出版社

文化百科丛书



文化百科丛书

宗臣史家

杨明珠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编辑　崔　陟
责任印制　陆　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臣史家 / 杨明珠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6
（文化百科丛书）
ISBN 7－5010－1587－2

Ⅰ．宗…　Ⅱ．杨…　Ⅲ．司马光（1019～1086）－人物研究　Ⅳ．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1418 号

宗　臣　史　家

杨明珠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850×1168　1/36　印张：7
2004年6月第一版　2004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587－2/K·805　定价：18元



司马光像

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
居然不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司马光《自题写真》

資治通鑑卷第一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周紀一 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威烈王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

资治通鉴



司马光祠



司马光砸缸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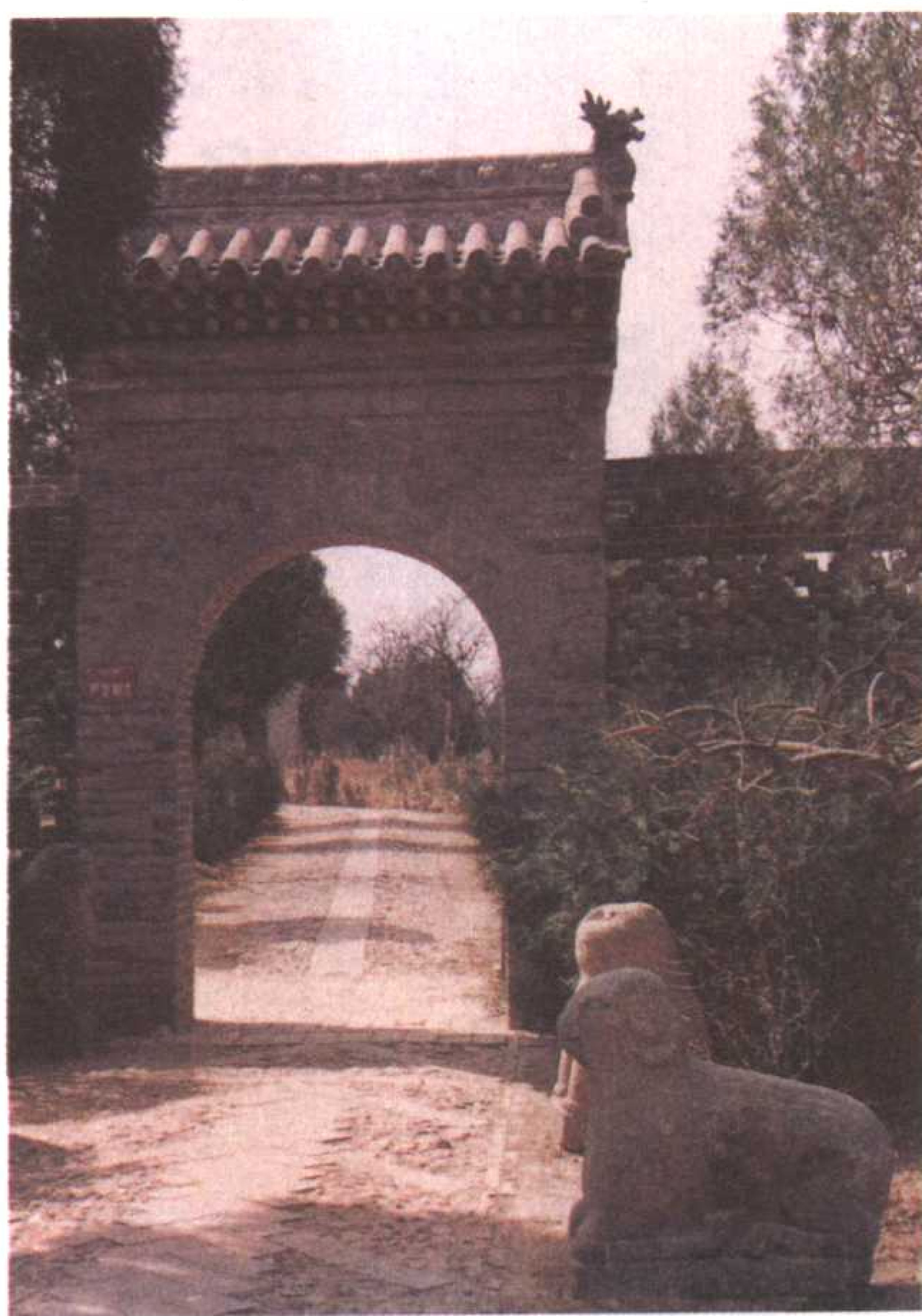
司马光像



司马光著书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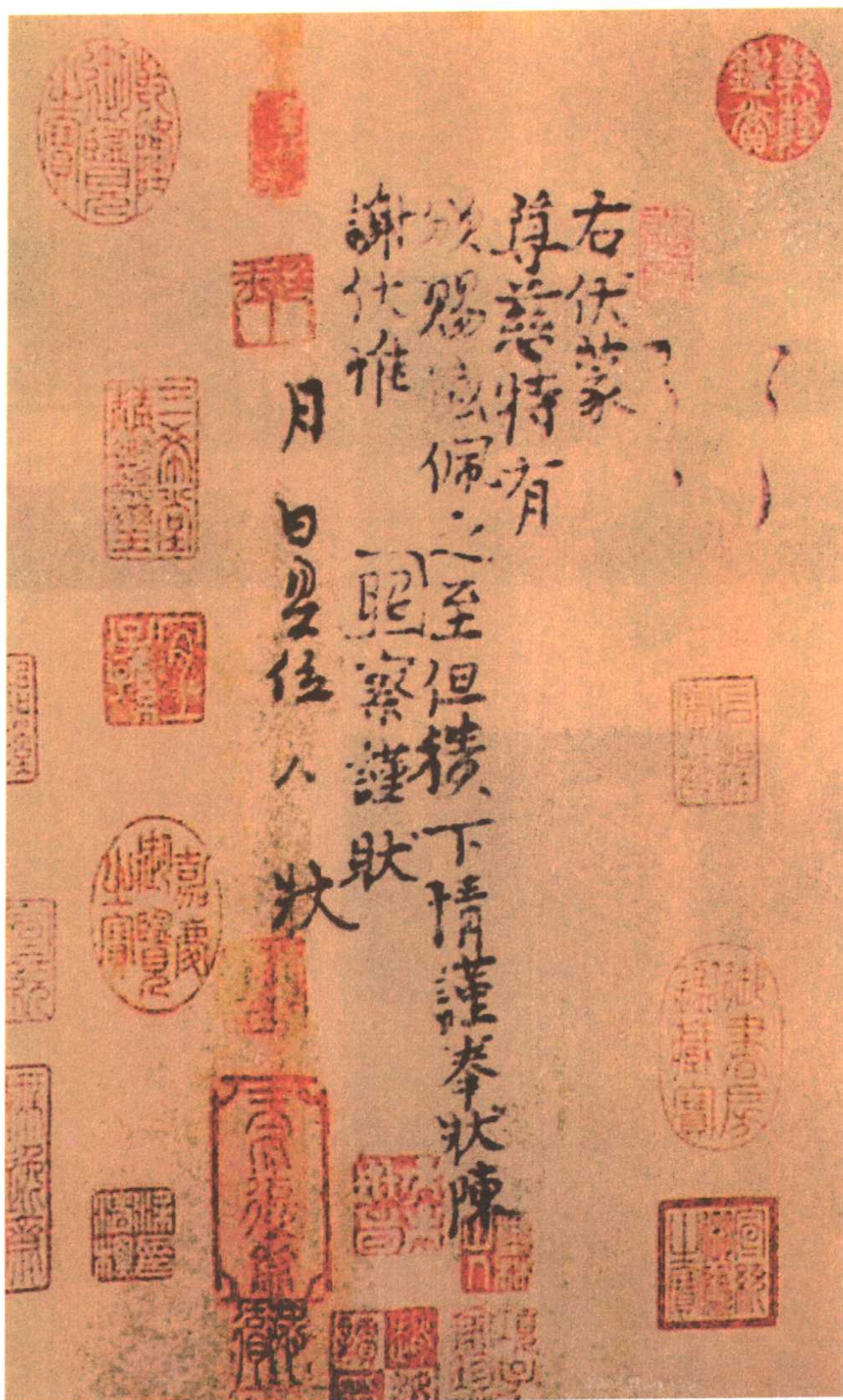


司马光墓园



司马光墓园

司马光《宁州帖》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



司马光祠堂



司马光墓园石兽

司马光墓园





余庆禅院



忠清粹德碑楼



别有天地匾



司马光墓



司马故里坊碑记



禅院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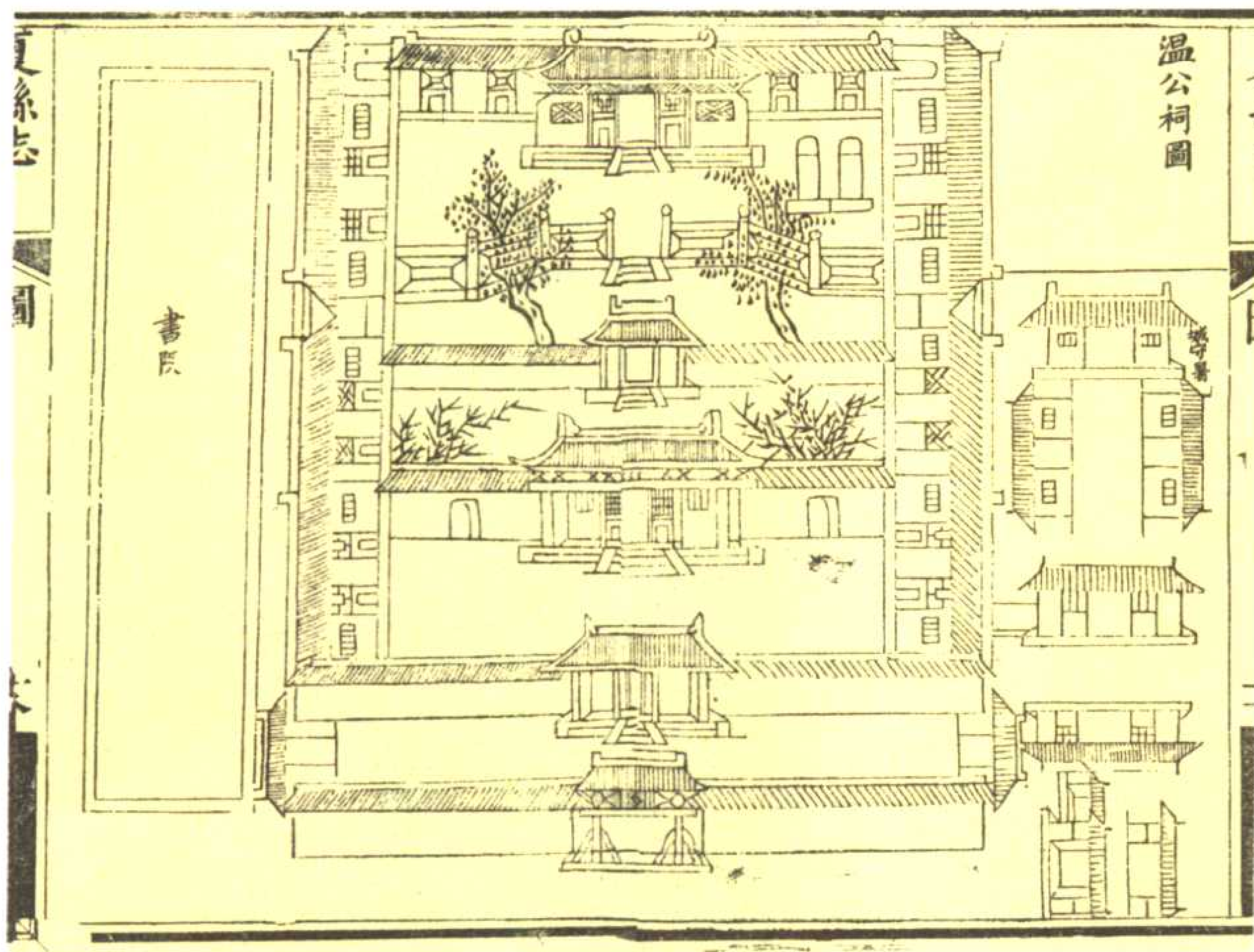
禅院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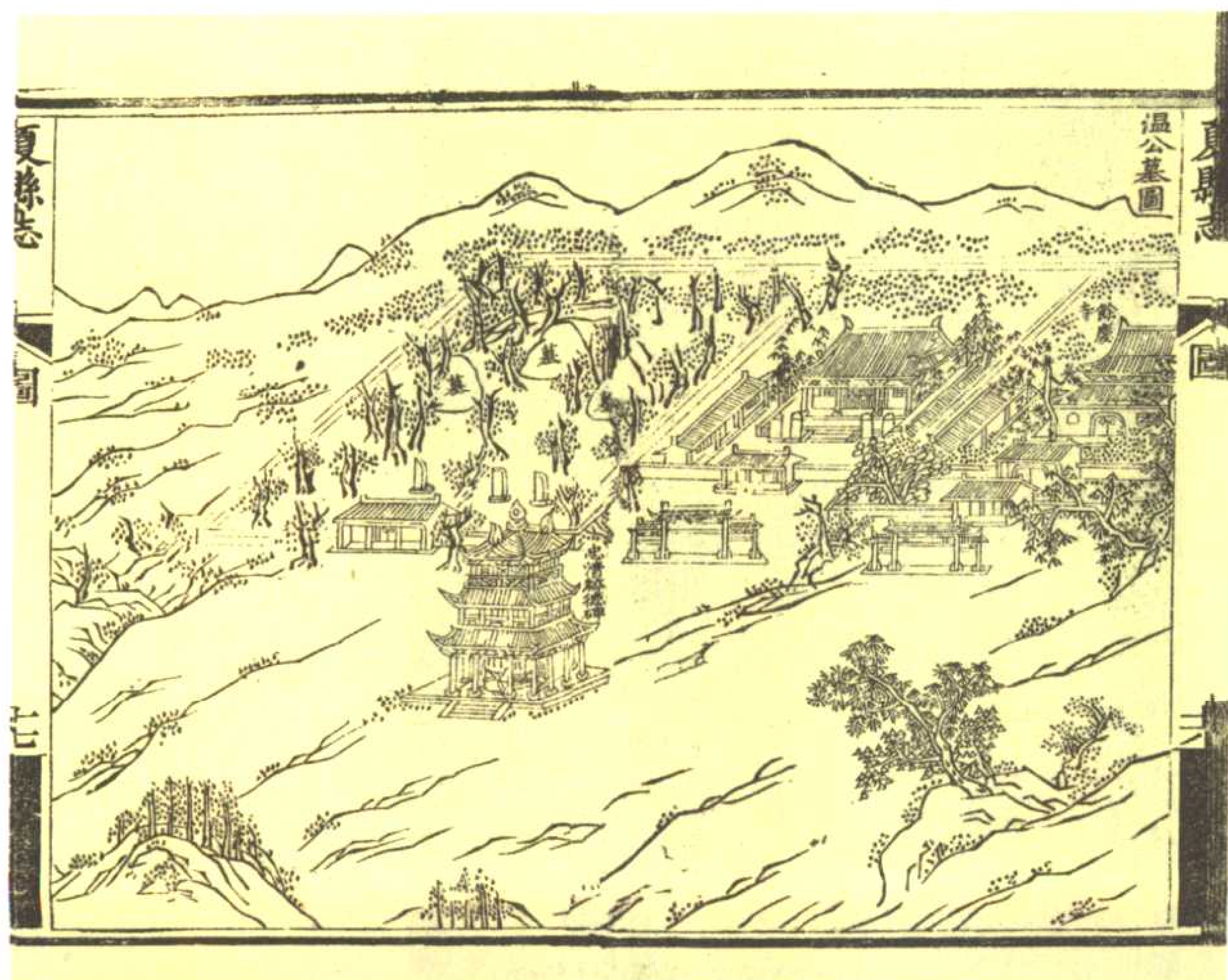
墓园石像



禅院佛像



夏县志 · 温公祠图



夏县志 · 温公墓图

香花供養司馬太師



巳未巳巳過田年
炎來覆照自天然
千萬重陽難賞菊
却赴瑤臺會九仙
悞了清朝多少事
深恨無常甚不偏
君恩厚祿還誰守
爭奈初更上帝宣
九月初二日上石

香花供养司马太师碑（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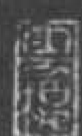
宋涑水司馬文正公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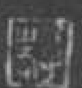
公自題寫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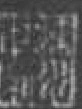
黄面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居然不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温公深衣小像上係以自題絶句蓋荅家廟儀刑逼真原石刻歲間歲久中断嘉靖己丑南陽鍾侯怨知縣事别鐫此石以便摹搨跋数語於其側因事中輟爾後遂不知石之所在去歲季冬十二夜震普院傾頹舊石覆没迩日予珂經搖臺山觀新刻卧道院地上遂家藏并紀其由以見保之不易云後二十七年歲在丙辰季秋望日鄉學希迂生馬巒謹跋







司馬文正公賛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来惟公一人始未可為爲鍾不受逢時多艱為世父母允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循難亦獨何修欢化甚速誠於為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正學方先生著

涑水晚學馬珂頓首謹書

石工邑人裴廷朝鐫

宋涑司马文正公真像（拓片）

虽无完人有高贤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文学作品中，许多杰出的人物都有一件在一生中很辉煌的事情，也就是有那么一个特别闪光的亮点。我们一说到这个人，马上就想起他的那件事来，而且还是滔滔不绝，喋喋不休。比如说到诸葛亮，那就是借东风了；提起赵云，自然就是大战长坂坡；一说黄盖，准是苦肉计，还得说他和周瑜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像匡衡凿壁、孔融让梨、孙康映雪、车胤囊萤、东方朔偷桃、杨贵妃出浴、关老爷过五关斩六将……都是这样的事情。

今天我们要说司马光，大家都会想到他小时候砸缸救人的事情。虽然那是他小时候的事情，后来他又有许多很辉煌的业绩，但还是这件事让人津津乐道，因为它太典型了，太出色了，让人怎么也忘不了。这故事还是几乎所有儿童的启蒙教材之一，在家爸妈讲，到学校老

师说，反反复复，不胫而走，大概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

说起司马光真是一位名人，他聪明过人，19岁就中了进士，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比三朝元老还多一朝。他在沉浮不定的宦海内遨游了近五十年，也算是很难得的。正因为树大招风的缘故，还有他政治观点鲜明，所以他的一生有人赞誉，也有人诋毁，可谓二者参半。从来是金无足赤，司马光虽然不是什么完人，但是他却是一位高贤，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谁也不可能抹杀的。

司马光是一位史家，他在一度退出政治舞台后，潜心著述，用十五个春秋完成了《资治通鉴》，这是一部差不多可以和司马迁的《史记》媲美的史学巨著。我在教高中时，课文里一篇《赤壁之战》，就是选自《资治通鉴》，文笔流畅，形象生动，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其中的一些细节还记得清清楚楚。写史不是文学创作，必须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进行。我们试想冯梦龙的《三言》和施耐庵的《水浒》，是可以充分发挥作者的想像，尽可能地展开写；至于《封神演义》《西游记》更是

上天入地，呼风唤雨，任所欲为。可是，司马光却不行了，他必须有严谨的约束，必须时刻束缚自己的想像机能。谁让他自己挑选了写史这条路，使得自己少了用武之地。在他死后，人们查阅他的几百卷文稿时发现，他的每个字都写得工整规范，没有一笔草率。就像朱熹在《名臣言行录》里引用邵雍的话，说“君实，脚踏实地人也”。

司马光是一位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不如李白、杜甫那样的闪烁，但是其实力也绝对不可以低估。他的一首《自题写真》诗：“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居然不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仅二十八个字，就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自己的性格和抱负，那可真是言简意赅，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似乎看到一个消瘦但精神矍铄的文人形象。他有着铮铮的铁骨，不屈的志向；他严谨治学，严于律已，尽管行走在坎坷崎岖的路上，已经是“黄面霜须”，但是从来没有过悲叹和悔恨。正是有了这样一群不知道进退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文明才得以延续着，行进着。他们的诗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心底的呼声，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司马光的才华在诗文里

得以最充分的体现。

诗人毕竟是诗人，他即使在写史的时候，不断提醒自己“收敛”些，但还是要显示出才华来。首先在取舍上大胆放手，节奏上是疾徐有致，有的时候是泼墨如雨，有的地方则又惜墨似金。他的潜意识里已经察觉到，他是在勾勒点染历史的长卷画，所以必须有画坛巨匠的笔触。我们在读《资治通鉴》时，似乎有了这样的感觉，语言已经润色到少一言则欠缺憾，多一语则浮华，真是恰到好处，适度适得叫人只有叹服而已。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治通鉴》又是文采焕然的，它精髓简练的文笔，赢得了后世的赞誉。毛泽东同志曾在谈话中，多次提到这部史书，据说他读过很多遍。他认为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是《史记》，一是《资治通鉴》；他还说这两部书“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逆境中编写的”，并且说“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具体评价《资治通鉴》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此评价可谓不低矣。

司马光是宋代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名臣，他的性格使得他在大是大

非的问题上，不会采取妥协和回避的态度。因此，他的仕途也就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他死后还被蔡京列入“逆党”，在那有名的《元祐党人碑》上，留下姓名。尽管事后能有个公平的说法，但当时心里的苦痛与愤懑，只有当事者才知道。人的豁达、坦荡都是相对而言的，他承受压力写出《资治通鉴》，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可他只能是排遣郁闷和寄托志向唯一有效的手段。

一个人应该也必须是多“功能”的，这样在相得益彰的作用下，他的各个方面的特长，才能充分地发挥。司马光因为是诗人，才有火一样的激情；因为是史家，才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因为是宗臣，才有铮铮的铁骨……这些素质的综合，使得他的诗、他的字、他的文章具有鲜明的个性，闪烁着独特的光彩。这些素质的综合，使我们才看到一个活生生、棱角分明的古人。

山西运城的杨明珠先生，居晋南而思天下，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弘扬与研究。数十年来，多有著述。多蒙不弃，为我们的“文化百科丛书”写了这本普及读物。本书里有对司马光全面客观的评价，还辑录了历代文人墨客有关司马光的诗

文。这本书，其实就是一篇论说明了的论文。他的观点颇有不俗之处，大量的古诗文就是他的论据，而对诗文的注解、分析，实际上就是论证的过程。他很巧妙地将古今说道融为一体，让人在阅读时随之喜怒，不自觉地进入他所营造的氛围里。这本书由于资料的翔实，还增加了普及读物的含金量。似乎在告诉人们，普及的读物并不是苍白的，虽非浩瀚大海，但是水量充沛，足够我们畅游一回的。

总之，读此书可对于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司马光，大有益处。至少会有这样的认识：难怪当初他敢砸那口大缸，就是非同凡响啊！

崔陟　甲申年于骀荡春风中

千古风流说司马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故世称"涑水先生"。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 年），仁宗宝元元年（1038 年）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沉浮宦海近五十个春秋，曾任过许多地方及中央的官职，最后累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六十八岁的司马光为相八个月卒。

关于司马光生前的功过是非，我们在此不做赘述（详见书后《盖棺毁誉千古事》），但不妨来了解或加深一下他故世后的一些事情，这样，或许对理解本书中的诗文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代文豪，也是司马光的生前好友苏轼，在其受命撰书的《司马温公神道碑》中，曾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他于当时所亲

历的史实：谓高太皇太后闻听司马光逝世的噩耗后，十分悲恸，时年不到十岁的宋哲宗也尤为哀痛。祖孙俩亲临其丧，甚至几日里连朝也不上。不仅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赐予他“文正”这样一个美谥和一品礼服，银三千两，绢四千匹等，还命大臣将其灵柩护送回夏县祖茔安葬。当时，朝廷从京师和陕、解、蒲、华四州调集能工巧匠，为司马光治丧。期间，苏轼、文彦博、范镇、程颐等名辈均曾前往司马光家里吊唁。天下的百姓亦为之沉痛举哀，京师之民父老相偕以致奠，商人罢市而往祭。当其灵车从汴京发往司马光的故里夏县时，更是万人泣送。到司马光下葬之日，四方前来会葬者多达数万，大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悼念司马光。而“画像以祀、饮食必祝”司马光的人，朝野上下更是比比皆是。据说，不少画工因此而暴富。由苏轼奉敕撰文并书丹，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额的《司马温国文正公神道碑》也于同时在司马光墓前赫然竖起。其碑高大雄伟，其文洋洋洒洒，其词生动感人，彰显了司马光一生的大节元勋。

时至绍圣初年（1094年），即司马光逝世不到十年间，由于元祐“党争”

的祸根，章惇、蔡卞等便以司马光“诬谤先帝（神宗）”之罪名，预谋发冢斫棺。宋哲宗虽然在臣子们的力谏下，没有让章、蔡一伙上演“并非盛德之举”的恶作剧，却下令摧毁了由他亲自篆额、苏轼撰书的司马光神道碑，并诏示天下：“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于绍圣四年（1097 年）将司马光“追贬”为“清远军节度副使”。

宋徽宗即位后，曾一度为司马光恢复名誉，追赠“太子太保”。但因崇宁间，史称“六贼之首”的蔡京为相，司马光再度受辱，不仅差点被毁了由他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还先后两次与文彦博、苏轼、秦观、程颐等数百人，列为“奸党”，刻入《元祐党籍碑》，昭示于京城和全国各州县。以致使入籍者死蒙耻辱，生遭迫害，“祸”及株连。直到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徽宗才有所悔悟，下令销毁该碑，将生者复原官，死者复前职，但他们的子孙也未能少受牵连。

南宋末年，宋理宗赵昀于宝庆二年（1226 年）绘司马光像奉存于崇德阁；度宗咸淳元年（1265 年）将司马光从祀于孔庙。

此后以迄明清，由于司马光德业之

隆（如苏轼所总结的“诚”“一”）与文章之盛（如《资治通鉴》等），历代封建帝王与名臣、学者，无不将司马光视为人臣儒子之楷模典范，衷心地表以敬慕，给予推崇。从而由章惇等所毁的《司马光神道碑》先后被金代夏县令王庭直、明代巡御史朱实昌重刊或重立；司马光墓及其祖茔也得到守护和修葺。历代帝王与仕子更将《资治通鉴》一书奉为圭臬，尊为国器；朱熹、袁枢并在通鉴的基础上，创立了“纲鉴”与“纪事本末”两种新的史书体例；宋元之际的胡三省，元代的忽必烈，明代的方孝孺，清代的梁启超、顾炎武、龚自珍、曾国藩等，无不对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给予极高的评价与赞誉。明清时，司马光被奉为位于孔、孟之下的第三个儒学圣人，享祀于孔庙之内……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不仅将《通鉴》阅读过十七遍，还亲自指示著名史学家吴晗主持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资治通鉴》点校本，并由衷地感赞司马光“有决心”，“有毅力”。

司马光，不愧为一代名贤与史学伟人！

本书对司马光的生平进行论述并编选部分诗文，即自北宋至民国间，包括

帝王到名流以及其后裔凭吊司马光的诗文中的极小一部分（其中排列在书前的司马光三首诗，因与此书内容密切相关，故亦选入集子里）。但从这些不同的诗文体裁中，可见当时和后世千百年间，围绕司马光这位历史人物，各阶层人士从不同角度对司马光的认识及他们面对司马光所倾吐的真实情怀与心迹。

由于凭吊的对象是一个人，作者的立意和角度虽各不相同，因此，难免内容上的重复。故在选注中，尽量在详略上有所侧重，或据史料作以说明。希望通过这本小集子，或能使您对司马光有新的了解，或能加深对这位历史名人的印象与认识。

鉴于水平有限，选录与注解中不免有错讹之处，尚祈方家鉴谅并指正。

杨明珠

二〇〇三年杏月

识于河东博物馆

目　录

一代宗臣　杰出史家

生于高门　才志出众功名并

北宋真宗（赵恒）天禧三年（1019年），司马光诞生于光州光山（今属河南）县，当时他的父亲、年已40岁的司马池正在那里担任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为“光”，以示纪念。如今，在当年光山县署所在地，还完好地保存有一口“司马光井”（简称“司马井”），据说司马光出生满三天时，司马池曾汲取这口井中的水为小儿子司马光洗过澡（当地风俗叫做“洗三”）（《一统志》、《光山县志》）。

关于司马光的出生地和取名，在今四川郫县另有一说。说当年司马池任郫县县尉时，生子光于官廨，字之曰“岷”，是以山而名（《宋人轶事汇编》卷一《成都文类》）。

司马光生于何地及如何得名，可以说，对于他的成长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家庭影响和成长环境，决定了司马光的人生。

据载，司马氏本为程伯休父（又作“休甫”）之后。此姓源于《史记·太史公自序》。程伯，即程国之“伯”，为封爵；休甫，为字。司马光曾有一方私印，即曰：“程伯休甫之后”。程伯以下、秦汉以上，司马氏世系绵远，不可详考。远祖是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封“安平王”，谥“献”），司马孚的哥哥就是司马懿，原籍河内（今河南沁阳）。到了北魏时，司马孚的后裔征东大将军司马阳，死后葬于夏县涑水乡高堠里，其子孙便在此定居，遂为夏县人。之后，由于司马家族政治地位下降，他的家世也渐趋式微。司马光的高祖司马林、曾祖司马政，均因五代战乱不仕，以布衣终身。

直到北宋初年，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始考中进士，重得仕进，司马光的本支也由此冠冕世替。他的祖父司马炫官秘书省校书郎，终于耀州富平（今属陕西）县令。虽然官做得不大，却很有名气。他不仅以气节著称于乡里，而且在就任富平县令不久，就使“境内大治”，颇有政绩(《富平县志》)。苏轼曾撰词称赞他：“笃学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难进，止于一命”，其贤可知(《夏县志》)。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是一位胸

怀大志的知识分子，他少年丧父，家资数万，但他并没有沉湎于这些财富之中，而是将它一概推与诸叔父，自己则一心读书，终举进士，以文学行义历仕真宗、仁宗朝，官至天章阁（宋真宗晚年在宫中建立的藏书阁。宋仁宗时专藏真宗遗墨）待制，担任皇帝顾问和掌管国家钱谷出纳与财政收支的高级副官——三司（盐铁、户部、度支）副史。“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司马光的母亲聂氏，也是一位知书达理、才德俱佳的女子。所以，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在《寒食上冢至澜洄庄追思祖烈感而为诗》里，就曾述及他的荣耀门第：“高门驷马流余庆，当见吾家世有闻。”

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书香和清贵门第，少年时代的司马光在严父慈母的关爱下，自然受到良好的人格熏陶和文明教育。六岁时，父亲和长兄（司马旦）即教他识字读书，七岁就听讲《左氏春秋》，并能了解其大旨，熟练地给大人们复述。其实，司马光并不是神童，也不是天才，他没有王安石那种过目不忘的天赋，但他的学习精神却是惊人的。在学习上，司马光非常勤奋刻苦，他常常

担心自己的学业不胜别人，所以每当老师讲习完后，小朋友们都去玩耍，他却不去，坚持把古代圣贤的文章背诵如流，而且也非常注意学习的方式方法，坚持朝诵夕思，诵读与理解并重。他曾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书籍中博大的知识与深刻的道理，使司马光深有难以尽穷的感受，因此，他勤读善思的学兴与日俱浓，到了整日手不释卷，不知饥渴寒暑的程度。为了争取更多的读书时间，他用一截圆木做成枕头，名为"警枕"。每当学习困倦入睡，稍一翻动，木枕便滚动，随之而醒，伏案再读。正是这种勤读善思的精神，使他很早就显现出了聪明才华和过人之举。七岁时，他便以"砸缸救友"名闻天下，并有人把它绘成《小儿击瓮图》在开封、洛阳到处张挂。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他则"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他曾在一首诗中这样谈自己的读书感受：

圣贤述事业，细大无不完。
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
于中苟待趣，自可忘寝餐。
(《司马温公文集》)

司马光自小就培养了诚实做人的优良品德。他兄姐几人，他为最小，但父母对他并不溺爱惯娇。五六岁的时候，父亲给他买来些新摘的青核桃。姐姐替他去剥，却怎么也剥不掉，气得走开了。这时，一个女仆过来，用开水一烫，就全剥开了。姐姐回来问他是谁剥开的，司马光谎称是自己所做。没想到，事情的前因后果，全被父亲看到，司马池当即便严厉地训斥他说：“一个小孩子，怎么能撒谎胡说？”尔后，晓之以理，加以耐心的教导。从此以后，司马光铭记在心，再也不说一句假话了，并且就像他的名字“君实”一样，一生诚实，为人处事从不掺假，即便做了大官，也始终以诚实作为律己待人的信条。

据说，一次他的学生刘安世问他，待人律己以何为重？他答道：“一个字，诚。”再问他应该从何做起，他说：“从不说假话做起。”他不仅说得到，更是一辈子都做得到。

司马光闲居洛阳时，一天，他叫仆人把家里的一匹老马拉到集市上卖了，他再三叮嘱仆人道：“这马夏月有肺病，一定要给买者讲清楚。”为此，许多人笑他傻，他却不屑一顾。还有一次，司马光回夏县

老家，途遇一村夫向他提了个古怪问题。他一时答不上来，便老实地承认自己没有考虑过，待研究后再作回答。村夫于是逢人便夸："我曾难倒了司马光！"对此，司马光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司马光曾这样总结道，他每做事情，都是十分小心谨慎，"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并说，"我并无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只是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不能对人可讲。"

朱熹在他的《名臣言行录》中也记载说，有人曾问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家邵雍："你认为司马光是个什么样的人?"邵雍回答："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可见司马光的诚实品格是名实相符的。因此，苏轼在为司马光所作的神道碑中即说："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

司马光十九岁那年，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五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和后人都享有补官的特权。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司马光自然当在其列。自小聪颖的司马光本能得个好差使，他却让给了他的两位从兄，自己只恩补了一个郊社郎的小官职。后来，经再奏，改为将作监主簿。恩补入仕的人，历来不受人重视。胸怀大

志、饱读诗书的司马光，不想靠祖先“阴德”的庇护和赐予，遂于宝元元年（1038年），一举考中进士甲科。在当时的情况下，以二十岁的年纪题名金榜，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却不因此而自满自傲，并不无豪迈地说：“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足见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气度。因此，当宋仁宗开宴庆贺他们这批新科士子时，每人赏赐名花一朵，他却不戴。同榜们劝他：“这是皇上所赐，君命不可违也”，这才勉强簪上一枝。

其实，司马光并非哗众取宠，而是自小就不喜欢华靡奢侈。当他还是三岁小孩子的时候，父母曾给他做过一件镶金带银的华美衣服，司马光一看见，就觉得赧颜，于是便弃之。后来，司马光身居高官，在生活上依然如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宋人轶事汇编》），始终保持着一种俭朴节约的作风，并教育他的子孙后人继承这种优良的家风。他在晚年写给儿子司马康的一封长信中，曾谆谆告诫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充腹。”“别人都以奢靡为荣，我却独以俭素为美。”并列举出历史上许多以俭朴而成大业、扬名后世，和因追求奢

靡、贪慕富贵而一事无成，甚至坏名败家、丧身亡国的正反典型事例，来阐明“以俭立名，以奢处败”的道理，以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深义。

司马光这种俭朴的生活作风，不仅体现在生活大事上，尤其显见于生活细微中。比如，他对待书籍视作读书人的“命”，藏书万卷，但历数十年，册册如新，卷卷整洁。原因就是他无论披览或放置，都格外谨慎，并常常趁着好天气拿出去晾晒。他曾经对儿子司马康说：“商人藏钱，而儒者藏书。所以读书人就应当知道爱护书籍。”并把他对书籍的收藏、晾晒、翻阅、披览等经验传授给司马康。另外，从他遗存的一份《资治通鉴》残稿上，我们还可看到，他所用的纸，竟然是在别人用过的信纸上，先用淡墨将原字涂掉，尔后晾干再写文字。

由此可见，一个人要成大器，除了客观的因素外，更主要的还要靠主观努力，并切切实实地从小开始，从一点一滴做起。

宦游四方　行义高洁有嘉声

司马光进士及第后，便由此正式步入仕途，开始在政治上奠定基础。朝廷首先

授以他奉礼郎，华州判官。当时，他的父亲任杭州知州，为了便于奉亲，司马光请求到苏州做官，得到朝廷允准。不料，康定元年（1040年）、庆历元年（1041）母亲、父亲接踵而亡，司马光因丁内外艰，在家服丧。先后五年间，他一直沉浸在哀伤悲痛的阴影里，行止履礼，以致形销骨立。在此情形下，司马光并埋头于经史子集，撰成《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史论。等到守丧期满，他又出任武成军判官等职，"政声赫然"，为民称之。二十八岁那年，他调入京师，先后任大理平事、国子直讲、大理寺丞等职。

皇祐元年（1049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司马光，以其忠淳秉性和出众才智，蒙其父亲生前好友枢密副使庞籍的青睐和推荐，担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并第一次与范镇一起参与校阅仁宗策问贤良方正和武举进士策卷这样的高级文职活动。

馆阁校勘是负责编校典籍的职务，这对爱好经史的司马光而言，实在是件难得好差使，不仅利于他借阅皇家秘阁所藏图书，而且对他后来治史也多有帮助。

在此期间，他曾写就了《古文孝经指解》等，并上疏请求朝廷能把荀子等人的

书论加以考订印行。太常礼院则执掌有关礼法等事。在任时，司马光恪尽职守，不怕得罪权贵，对朝廷不合礼法的事也敢于抵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件事：

一是皇祐元年，中官麦允言死后，仁宗诏命给他一品卤簿。司马光认为，卤簿，这本是赏赐给有军功之人的，“麦允言乃近习之臣，并没有什么元勋大功，不当如此。”二是皇祐四年（1052 年）宠臣夏竦死后，仁宗赐谥他“文正”，司马光几次上书谏争，认为：“文正，谥之至美，无以复加。”而夏竦“平生不协群望”，名实不符，有负天下。如果皇帝念旧，可以采取厚抚其家的办法。最终说服仁宗，改赐“文庄”。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唐介、包拯等人，对仁宗授予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宣徽节度使一事，进行过直言谏争。并先后任职殿中丞、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等。这些官职，虽无足轻重，但都使司马光在从政的同时，从而获取机会去进行史学的研究与探求。

皇祐五年（1053 年），庞籍因嫌罢相，次年降为户部侍郎，出知郓州，聘任司马光为幕僚，典州学。司马光又离开京城，出入庞籍左右。至和二年（1055 年）庞籍改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再

荐司马光为并州通判，作为他的副手。

并州，地处边塞，气候恶劣，环境十分艰苦。而且时值隆冬，由京城开封至并州路途遥远，关山险阻。司马光在庞籍仕途失意、身处困境时，并没有远而避之，去趋炎附势，而是知恩图报，义无反顾，偕妻携子，甘心情愿地跟着庞籍赴任边城。他在《苦寒行》一诗中，曾这样记述他随庞籍奔赴并州时的情形和心情：

穷冬北上太行岭，霰雪凝结风峥嵘。
熊潜豹伏飞鸟绝，一径仅可通人行。
僮饥马羸石磴滑，战懔流汗皆成冰。
妻愁儿号强相逐，万险历尽方到并。
并州从来号惨烈，今日乃信非虚名。
阴烟苦雾朝不散，旭日不复能精明。
跨鞍揽辔趋上府，发拳须磔指欲零。
炭炉炙汤涉笔重，重复画字终难成。
谁言醇醪能独立，壶腹迸裂无由倾。
石脂装火近不执，蓬勃气入头颅腥。
……
我来盖欲报恩分，契阔非徇利与荣。
古人有为知己死，只恐冻骨埋边庭。
……

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司马光的意志犹坚如磐石，努力尽责尽职，做好每件事情。

当时，地近西夏的北宋边城麟州屈野河西，田土广阔，西夏人不仅常常蚕食其地，而且游骑也往往直至城下，成为河东一大患。庞籍遂命司马光前往察看。司马光不辱使命，根据实地勘察和当地官吏建议，呈请在州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以加强防备。同时，募民在此耕田种地，既可免遭西夏人强占疆土，又能解决缺粮问题。这样，麟州则永无侵轶之虞。庞籍认为此策可行，便在情急之下，一边奏报朝廷，一边命人兴修。不料，尚未动工，西夏之人已结集此地。麟州守将郭恩胆大妄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竟打开城门，引兵夜渡，径往河西。结果腹背受敌，一败涂地。庞籍因此被人以“擅修堡寨，引惹边事”而受诬遭谗。为保护司马光，庞籍引咎自贬。司马光于心深为不安，连上数状，申述此事全因“诸将恃勇轻敌、临事无备之所致，本非修堡之过”，庞籍无罪，责在自己。可仁宗一直未加理会。

由于司马光的高洁志行，加之庞籍的无私呵护，使司马光在仕途上还较为顺利而从心。嘉祐二年（1057 年）改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从而结束了他宦游地方的政治生涯。因此，司马光深感“受公（庞籍）恩如此其

大，灭身不足以报。”六年后，即嘉祐八年（1063年），当庞籍郁郁而终后，司马光深深感念其知遇恩泽，不仅为庞籍撰写了祭文和墓志，还撰写了《相国颍庄敏庞公籍挽辞》三首，以表衷心沉痛哀悼，其中第三首这样写道：

沧波与邓林，鱼鸟久飞沉。
一旦成陈迹，何人识寸心。
高山亡景行，流水失知音。
泪尽离东阁，归来破故琴。

尔后，又隆重升堂，拜其妻如亲母，抚其子如亲弟。其情其义，深为时人贤之。

在辗转任职于地方那段时间，正值风华正茂之年的司马光虽然身处江湖之远，但平生所怀“忠君、爱国、利民”之志一刻未减，并多次为不能全力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而深憾，以致白发陡添。他在《初见白发慨然感怀》一诗中即有这样的慨叹：

万物壮必老，性理之自然。
我年垂四十，安得无华颠？
所悲道业寡，汩没无他贤。
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
视此足自儆，拔之乃违天。
留为鉴中铭，晨夕思乾乾。

鉴此，只要一有机会，司马光便抓住机遇，为国建言效力。至和三年（1056年）六月，年近五十又没有子嗣的宋仁宗身体欠佳，已累月不朝，因太子一直未立，朝野上下都对此十分忧心，唯恐将来为争夺皇位血溅宫门。但同僚们又怕惹怒皇帝，招致横祸，个个缄口不敢语，就是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负的唐介，也无声息。唯有担任谏官的范镇首发其议。当时，正在并州做通判的司马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继之而起，连上三状，决心丢官或以死来配合范镇。最后又再次写信给好友范镇说："此大事，愿公以死争之。"在司马光的支持下，范镇言之益力。后来，仁宗病愈，这件事虽"若投羽毛于沧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被暂时搁置下来。但到后来司马光入京任职，又当面和仁宗谈及此事时，宋仁宗不得不感佩道："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于是，司马光再次上疏，终使仁宗大为感动，立了他的宗室之子赵曙，这便是宋英宗。

迁官京师　正直敢言不辱职

嘉祐二年，司马光调离并州，荣升京官，由此成为中央政权一位重要官员。

从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到英宗

治平三年（1067年）间，司马光先后任开封府推官、度支员外郎、判勾院，又加修起居注、判礼部，迁起居舍人、知谏院，以及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等职。

这是司马光入仕从政以来的黄金时段，也是司马光政治思想初露、才华能力突显的重要阶段。期间，司马光怀着一腔“忠君、利国、爱民”之志，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连连献策建言，指陈时事，阐发政治理念和观点，并斡旋于统治集团内部，参与处理不少国事争端。在他于嘉祐六年（1061年）起担任谏官的五年当中，司马光可谓直节忠亮，竭尽丹诚，以其非凡的学识和见地以及刚正率真的性格，从内政外交到社会道德，提出了大量的、系列的批评和建议。据统计，仅收录在《传家集》中的各类奏章就有一百七十余份。大到王朝立嗣继统、政治举措、人事进退、生民治乱，小至皇帝起居、皇室生活等等问题，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犯颜直谏，无所顾避。而且在一些事情上，都是一奏再奏，绝无徬徨和顾虑。

司马光的忠直之行、竭诚之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件大事上：

第一，是按照儒家传统的理念，阐发了对君道、吏治、兵事的政治思想和主

张。他认为，作为一个明君，必修必具仁、明、武“三德”。所谓“仁”，就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就是“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所谓“武”，就是“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这是“修心之要”，也是“人君之道”。关于吏治，他认为，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这是“御臣”之术，也是“治国之要”。关于兵事，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废兴之端，安危之要”。鉴于“当今国家之患”，问题是在于“士卒不精”，所以，主张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

在此基础上，司马光又进一步提出了“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所谓“五规”。其用意是：“以祖宗开业之艰难，国家致治之光美，难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业。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为功；颓壤之势，从而救之者难为力，故作惜时。道前定则不穷，事前定则不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作远谋。燎原之火，生于荧荧；怀山之水，漏于涓涓，故作重微。像龙不足以致雨，画饼不足以疗饥，华而不实，无益于治，故作务实”。他认为，这些都是“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司马温公文集》）

以上这些，既是司马光的治国方案和政治主张，也是司马光明确的施政纪纲。虽然这些建议很少被采纳，但在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确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第二，是继续恳请建储，最终使宋仁宗将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赵宗实（赐名“曙”）立为皇太子。两年后，仁宗死，赵曙即位（即宋英宗），顺利地完成了皇位的过渡，使这一关系到宋王朝国运的政治核心得以稳固。在这期间，赵曙先是判知宗正寺，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仍迟迟不肯受命。立为皇太子后，赵曙又称疾不入。司马光前后奔波，责之以义，喻之以理，终于使赵曙领命。

第三，是成功地调解了宋英宗与皇太后宫廷内部的严重不和。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死，四月赵曙即位。岂料，几天之后英宗忽然生了重病，不能亲政，便由皇太后曹氏听政。期间，英宗不但举措失常，而且时或有违忤曹太后之处。于是，原来阴谋另立太子，以便掌控朝廷的任守忠等人便从中谗言离间，两宫产生隙怨。司马光唯恐英宗与不是亲生之母的曹太后矛盾加深，多次上书给双方，从大到国家、小到亲至骨肉苦苦相劝。既劝曹太后上看在仁宗同堂兄赵允让的面

上，下怜惜英宗从小鞠育于宫中，而且目前又不幸得了重病，请她特加爱念，包容海涵；又劝宋英宗想想自己自幼就是皇太后抚养，应当念其恩情，对她应该像先前侍奉自己的父亲濮王一样。在司马光的竭诚努力下，两宫终于和好如初。英宗病好后，曹太后又还政于英宗，从而避免了一场皇室危机的发生。对于此事，清帝康熙曾有诗赞云："仁英继统，韩富当朝。谐孝两宫，伊韩之劳。"苏轼亦曾赞云："母子之间，莫如孝慈。人所难言，我则易之。"

第四，是本着"利国、养民"的原则，以农为本，为民请命。司马光在升任京官之前二十年间，长期在地方上做官，对于民瘼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他十分关心百姓疾苦，并多有同情。在当时灾异屡臻，"风雨害稼，民多菜色"的景况下，他针对宫中宴饮、赏赐动辄数以万计的颓败风气，上书指责朝廷"上忽天戒，下忘民病"，呼请皇帝力戒之，以"慰元元困穷之望"。面对淮南、两浙发生水灾，百姓无食，"赤子冻馁，滨于沟壑"的惨状，司马光疾呼"朝廷不可不深心为忧"，更憎恨那些地方官员，还趁机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贩盐饥民，抢争蝇头之利，"岂为

民父母之意哉?!”他还在《劝农札子》里上言:“食者，生民之本，为政之首务也。饥馑之世，珠玉金银等于粪土，惟谷之为贵，不可一日无也。”“今农夫苦身劳力，恶衣粝食，以殖百谷”，却遭横征暴敛，切实应予以注意，特加悯怜。并主张和提醒“了解农家之困苦，体察稼穑之艰难”。以示“爱民之意”。多次阻止皇帝，罢去宫廷一切浮费和营建，“侧身克己，痛自节约”。他更反对战争，揭露战争给生民带来“人人有丧，户户被惊，号哭之声，弥天亘野，天地为之惨凄，日月为之无色”的深重灾难。

第五，是关于英宗追封他的生父濮安懿王的事。当时，有人蛊惑英宗把他的生父追封为“皇考”，英宗命大臣们几次讨论。究竟应给濮王一个什么样等级的礼遇呢，臣子们面面相觑，不敢言语。司马光一人奋笔独议说:“为人后嗣的就是人家的儿子，不应顾念私亲。当然，濮王德盛位隆，也应有个尊礼。但如果将濮王称做皇考，那么先帝仁宗又该放到何位呢?”而这一意见却与当权大臣不和。为此，倾向于司马光意见的御史台吕诲、傅尧臣、范纯仁等人曾多次据理力争，结果都被罢官。司马光为其求情，也没能恩准，于是

司马光请求，甘愿一起被贬。

另外，司马光还在取士荐贤、褒直劝忠、惩恶扬善等方面以及关于陕西刺义勇、西戎部将嵬名山等军事大事上，提出过许多有积极意义的谏言。

他认为："台谏之官，天子耳目。"因此，他不仅身体力行，敢于直谏，还要求做谏官的人"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以身谋"(《谏院题名记》)。可惜的是，对于他的建议皇帝均采纳不多，令司马光很是失望和苦恼。最后，他连上三状，索性辞了谏官一职，任龙图馆直学士。

立于庙堂　道同见异起纷争

治平四年（1067 年）正月，宋英宗去世，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以司马光德性纯正，学术通明，识见深远，尤其是在以前选立英宗事情上的卓越表现，以司马光为"社稷之臣"极力向神宗推荐。神宗便于同年三月授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几次上书力辞，也没能获免。四月，又升任为御史中丞。

司马光上任后，又将自己向英宗申述过的一系列治国抱负，上达神宗，并不改以往直言力谏的禀性，弹劾时政。对于司

马光的建议，神宗有的听了，有的仍未从。事实上，神宗对于司马光的道德与学问还是很为佩服，并计划把他长期留在左右，但又觉得司马光言事太直，不免产生顾虑。为此，神宗曾与吕公著私下议论说："司马光方直得是不是有点迂阔了?"吕公著对神宗说："孔子可以说是一位上圣，子路还说他'迂'。孟轲是位大贤，时人也说他'迂'。大概虑事深远的人，都近乎如此。请你还是在今后细细观察他好了。"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在百官表奏、请上尊号的事情中，司马光的建议的确让神宗很是高兴，并下诏奖谕司马光说："如果没有爱卿，我连一些真话也难听得到。"

不幸的是，紧接着在群臣讨论河朔一带发生旱灾，如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上，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便由此开场。因为，当时由仁宗经英宗到神宗，宋朝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其财政情况更为恶劣。在此情形之下，年仅二十岁、朝气勃发的宋神宗，很想有一番作为，针对国用不足、财政困难等积贫积弱的严重问题，他曾派司马光去有关部门看查详对。司马光调查后认为，"国家所以用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

滥，军旅不精”，并建议裁减这五种浮费，深得神宗赞许。河朔旱灾发生后，司马光继续坚持“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而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并非“当今急务”，其症结在于“未得善理财者”。所谓的理财，就是“不加赋而上用足”。司马光当即表示反对，理由是：天下财物百货是有限的，不在民间则在官府。不用加赋便国库富足，财从何来呢？说白了，其终究不过是想方设法在暗中侵夺老百姓的财富，“其害甚于加赋”。两人因此争论不休。神宗虽然也明确表示“朕意与光同”，却迟迟不去施行。司马光见言不为用，于是请求到外地去任职，神宗未许。这样，留在朝中的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都感到了北宋王朝封建统治面临的危机的严重性，主张改变现状，实行政策和制度上的改革，但终因在思想认识上政见不合，二人间遂渐渐生隙。

其实，无论从私人情谊上讲，还是从政治态度上讲，变法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确是一对各自都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他们二人生活的时代、所受的教育和仕途经历大致相同。当仁宗提升司马光为起居注一职时，司马光在《辞修注》（第四状）中，即称“王安石文辞宏富，

世少伦比，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职，独恳恻固让，终不肯为。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安石，相去甚远……（今臣）乃与之同被选擢，比肩并进，岂不玷朝廷之举，为士大夫所羞哉！”俩人常常谈宴终日，以诗唱和，以文会友。当时，二人与吕公著、韩维四人，是人所称羡的“嘉祐四友”。司马光的伯父司马沂之碑，也是当时负有文学盛名的王安石承好友司马光之请所撰。即便是到最后，二人的关系虽不如以前，但也不致成为“敌手”。王安石死时，身为左仆射、因病告假在家的司马光就曾专门上书给处理日常政务的右仆射吕公著说：“介甫这个人，文章节义，颇多过人，就是有点执拗而已。”因此特建议给他的抚恤应加优厚，由此也显示出司马光的君子品格。

熙宁二年（1096 年），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一场政治改革的暴风骤雨便随之急刮猛下，处在这场斗争中的两位代表人物各立潮头，矛盾随之加大。对于这场改革，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认识以及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方法。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则认为：“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

汉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而言，祖宗之法不可变。"关于治国之道，王安石认为："治天下譬如医用药，当知虚实寒热。方虚寒时，纯用乌头附子不患过热。"而司马光则认为："治天下譬如屋室，弊则修之，非大坏而不更造，非良匠美材则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矣。"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结合当时客观实际，来分析研究变法之争的问题，无疑，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只不过在方法上司马光强调节流，而王安石主张开源。王安石的新法既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而司马光所反对的大多是变法中有缺陷的地方。比如当时争论最为激烈的青苗法，既有限制豪强地主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的作用，对解决农民一时困境有利；但在发放青苗钱时，却要收取农民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甚至是成倍的利息。并在推行过程中，也有"抑配"、"摧勒"等不良现象，使农民"困穷憔悴，邻于死亡"。而司马光则主张用常平仓的办法，不取或少取利息。再说免役法，"唯钱是求"，"刻剥贫民"。即要向原来不服劳役的下户即农民，收取不少数量的免役钱。这对富豪地主来

说还可以，但对于贫民，只有穷于应付，负担加重。对于市易法和均输法，司马光认为这是与商人争利，于商品流通极为不利。至于保甲法，司马光认为这样会“疲挠农民”，妨害农事，使农民不安心种地，等等。可见，司马光是从爱民和宽农的思想出发，反对新法中苛民伤农的一面。其根本目的，无疑也是为了保持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防止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本来是应有理有节的，但由于司马光看问题带有片面性，加之朝野上下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高的影响，致使他越来越走向偏激。像农田水利法等，他是可以不加反对的，但他都盲目地予以反对了。

在变法与反变法的纷争中，司马光思想倾向沉稳持重，虑事缜密，为王安石所不及，但缺乏有力的改革措施，尤其是缺乏王安石的创新精神；王安石则思想活跃激进，勇于标新立异，却刚愎自用，急功近利，慎重不足，以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苛之太甚，出现一些失误和问题。尤其是用人不当，如吕惠卿等。司马光在他写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里，即恳切指出过这个问题，但王安石则说当新法初行之

时，人还不能接受，那就得采取些强硬的手段和措施，等人们大都接受之后，再用“仁者”守之。司马光说，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则反之，他们一旦得势，恐怕就难去之。若是硬逐，他日终将为仇。“覆王氏者，必惠卿也。”结果王安石始终听不进去，事实也确如司马光所料，几年后，吕惠卿最终与他反目，成为仇敌。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司马光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也不是任何改革他都反对。他主张当革则革，不当革则坚决不革。如在治平年前后，他就多次指出宋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问题，要求采取措施，革除时弊。如罢招禁军，减少冗兵；施行节用，减少浮费；科场不用诗赋等等。对于这次变法，司马光也不是完全不赞成改革，而是认为没有“良匠”“美材”，条件尚不具备，主张稳健进行，不可激进。这只是方式方法、时间的快慢的问题，在本质上与王安石的目的也并非是截然对立的。

由于变法之争，许多不同意新法的辅弼大臣，都被王安石赶出朝廷，或被迫辞职请求外任。司马光也几次上书，推辞掉翰林学士和枢密副使，要求到外任职。神宗虽一再挽留，也难动司马光坚定的意

志。这样，司马光于熙宁三年（1070年）又一次离开朝廷，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

对于司马光坚辞枢密一事，《皇朝类苑》和《邵氏闻见录》等多有详细记载。说当时司马光因为神宗对自己的建议不从，力辞不受枢密一职，韩琦与文彦博等人均相继劝说。司马光说："自古以来，被官爵名位引诱坏了名节者，实在为数不少。既然言不为用，何必图此虚名。"司马光离去之后，一日，宋神宗不免生有"无人才之叹"，曾当着群臣的面深念说："司马光这个人，不论说别的什么事，只辞枢密一事，朕自即位以来，除他而外，还没有见过呢？"

远避宦海　殚精竭虑著通鉴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在永兴军任上的司马光，虽居朝廷已远，仍一如既往，尽职守责，为地方多办实事，为朝廷多有谏言。神宗很想重用他，下诏调他去许州，并命他路过京城时来面见。当时神宗曾问监察御史程颢说，"卿以为司马光这次来不来？"程颢回答："这关键是看陛下能不能用其言。"神宗回避说："不要说这个问题。但我总觉得，像司马光这样的

人只要能常在身边，那么，我就会少犯过错了。”后来，司马光果真不赴许州，又力辞永兴军公职，一再请求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并四任提举崇福宫等职，从此做了一个投闲置散、有职无权的闲官，在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在《初到洛中书怀》一诗中，司马光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
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
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
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

他在《自题写真》一诗中，这样自画自己：

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
居然不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在给邵雍的一首诗中，司马光也有“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之句。

但司马光并没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把全部精力和心血付诸到《通鉴》的编撰上去。

著史，是司马光读书治学的一桩宏愿，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司马光喜欢读书，尤其喜爱史学，“自幼至老，嗜之不厌”。而且所得颇多，造诣很

深，仅二十岁那年，他就写了三十余篇读史札记。在研读古史时，他深感《春秋》之后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多达一千五百卷，如果不是专门学习的人，穷其一生也很难通览。“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所以，他下定决心，拟采用《春秋》左丘明的编年之体，仿照荀悦《汉纪》的简要笔法，上自战国，下至五代，网罗众说，“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写出一部集众家之长，又有自己特色的编年史，以“勇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可见它的政治价值，并非一般。

早在仁宗嘉祐年间（1056 - 1063年），他就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 年）的治乱兴衰大事，编成了《历年图》，计七卷。治平元年（1064 年），司马光将其进献英宗。接着，又于从政之暇试着编写了《周纪》（五卷）、《秦纪》（三卷），取名为《通志》，于治平三年（1066 年）再呈英宗，深得英宗赏识，并命他自选助手，在崇文院置书局，特许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和三馆秘阁（即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珍贵图书，赐给御府笔墨缯

帛，命司马光继续编著。但当时尚无《通鉴》之名，仅称为“历代君臣事迹”。不久英宗死，即位的神宗也尤爱历史，在朝廷初开经筵，召侍臣在宫中讲经读史。司马光以翰林学士身份参加经筵，奉旨宣读此书稿。神宗听后，十分高兴，对司马光的工作更加重视，不仅认为该书“贤于荀悦《汉纪》”，“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钦定了《资治通鉴》这一书名，还亲自预作了书序，又拿出自己当初在颍邸时的二千四百余卷图书，赐予司马光用以编修，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等费用，也一概由国家支出。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从人员的配备、史料的提供、生活的安排、工作的条件等都给予了极大的便利，加上到洛阳后拥有一个安定的著书环境，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一部编修了十九年、记录十六个朝代、贯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长达二百九十四卷、总计三百余万字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

解析司马光的编修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从治平三年到熙宁三年，为司马光居朝编集时期，即边从政边编修。几年间所成者为周、秦、汉、魏四朝，凡七十八卷。自熙宁三年后到元丰七年，为司马光

居外编集时期。期间六任冗官，计十五年。书所成者为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计十二朝二百一十六卷。

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不啻综千载之典，为帝王治世打造了一面“历史之鉴”，而且成一家之言，为后世史家和学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慧眼识才，知人善任，通力合作，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是司马光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鉴于该书上下贯穿千余载，仅他一人来编修显然力不从心。因此，他亲自挑选组织了一个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编修班子。以年龄而论，刘攽小其四岁，刘恕小其十三岁，范祖禹更小其二十二岁，他的儿子司马康当时只有十七岁。但时年已经四十八岁的司马光，并不以齿论序，而且重其才学史笔。刘攽擅长汉史，刘恕熟治魏晋，范祖禹号称“唐鉴公”，因此，司马光无不欣慰地赞赏说：“此三公者，天下英豪也。”负责“检阅文字”的司马康也是“敏学过人，博通群书。”所以，他们在分工而治的工作中均尽显才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审慎谋篇，严谨考证，认真下笔，反

复修订，是司马光的治史态度与作风。从《通鉴》这部巨著的发凡起例、谋篇布局、甄审别择、阐幽表微，到文字的增删取裁、修改润色，司马光并非像隋唐以来集体修史时那些主编一样，如唐朝官修《晋书》的房玄龄，五代后晋官修《旧唐书》的刘煦，北宋初年官修《五代史》的薛居正等（司马光以后也有不少），只是挂名而已，而是亲自动手执笔。他制定：首先从浩瀚的史料中选取材料，按年月日整理排比、分类，并注明出处，标明事目（即“丛目”），再将丛目中的史料，进行初步地整理和修订（即“长编”）。具体地讲，就是将丛目所列各书各事，经选择、取舍，编排、撰写成文，是为初稿。其原则是“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因为，定稿时繁则删削较易，略则查补较难。凡丛目所选材料中，事同文异者则互为补充，取其详尽者；事迹不同，则核实考证，取其较可凭信者。在以上两步由助手负责编写的基础上，最后由司马光就“长编”加以考订删定，修改润色，写成定稿。

这一阶段的工作最为繁重复杂，难度极大。如范祖禹最初写的唐史长编，原稿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了四年左右的时间才将其删定为八十一卷。即今书中的卷

一百八十五至二百六十五。删去了“长编”的六分之五。这些工作，都需具备渊博的历史知识，卓越的史学见识，较强的分析能力和高超的文字技巧。全书的质量优劣，也多系于此道工序的水平高低，需要作者巨大的毅力和功力，不凡的眼力及魄力，更需精心、决心和耐心。司马光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任，而且由他制定的这种拟提纲、定长编的完整一套周密详致的写史办法，是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创造性贡献。也正是因此，《通鉴》中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史学资料。据宋人高似孙统计，除“十七史”之外，《通鉴》采取的杂史即达三百种以上。

司马光编修通鉴的手稿，仅当时人们看到的，就有两屋子之多。据说，黄庭坚曾看过数百卷，尽管多有颠倒涂抹，但无一字潦草。我们从元初余姚徐氏所藏、流传至今的司马光所写“永昌元年”书稿（共有 453 字）中，即可看得到。由此可以想见，司马光用功之勤，费时之多。

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于 1961 年 6 月 18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一文中有云：“作字方正不仅是写字的问题，而是表现作者落笔不苟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

的，因为这对于那些以潦草轻率的态度，对待编写历史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编写出《通鉴》这样一部“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的史学巨著，是司马光毕生心血的结晶。如果从他嘉祐年间着手《历年图》、《通志》算起，到《通鉴》面世，其用时则长达三十年。三十年的岁月，上万个日夜，占去了司马光人生近乎一半的时间，其大好年华、旺盛精力可以说全都付之焉。正如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总结的那样：“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较计毫厘。”长期从事这样繁重而细致的工作，以致使他“骸骨癯瘁，目视昏近，牙齿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所以，当书成之际，司马光不无感慨地回首道：“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我们从司马光《文集》所录的许多诗篇中，也可看到他在编修《通鉴》过程中的苦、乐自述。如《夜坐》：

……

僮仆悉已眠，书几久倚凭。
涉猎阅旧闻，暂使心魂澄。
有如行役归，丘园恍重登。

有如远别离，邂逅逢友明。

……

人生本不劳，苦被外物绳。

坐愁清旦出，文墨来相仍。

如《晚归书室呈钱君倚》：

得归无所为，未免阅书史。

一种劳精神，胸中异有喜。

人生无苦乐，适意即为美。

再如《不寐》、《宿南园》：

“长年睡益少，气耗非神清。”“昏昏但思眠，疲病知吾衰。”就是这样辛苦，还受到不少奸人的冷语谗言，甚至嫉妒诬陷。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曾记载，司马光以“书局自随，岁月既久”，又上书论新法不便，于是遂有“小人欲中伤之”，到处散布谣言说：“书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并暗中派人刺探，结果并不是他们所想像的那回事。听到这些事情后，司马光对编修工作更加慎重，严格按规程进行考核监察，并以诗砥砺修书同事：

烈火非不猛，不耗百炼金。

寒霜非不严，不凋竹柏林。

小人势利合，倾覆无常心。

君子道德亲，白首犹视今。

诸君闺台秀，相得如璆琳。

离群一昔期，乃尔动悲吟。
古风久已衰，交道日颓侵。
愿名思友操，播之清徽琴。

坚持修书不辍，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著作。后来，有人说，“今读其书，盖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都是因那些小人诋毁，致使司马光不得不“遂急结束”之后果。

元丰七年书成后，司马光将书进呈神宗，神宗特降诏奖谕司马光，称赞他“博学多闻，贯穿古今”，“成一家之书”，并厚加赏赐，提升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可惜的是，司马光未能见到书的刊印，便已溘然去世。

在编修《通鉴》前后，十分有心的司马光同时还有几本《通鉴》的“副产品”问世。为了便于读者翻检，他编写了《通鉴目录》三十卷。为了明去取、别异同，又编写了《通鉴考异》三十卷。这种写法为他书所未有，是司马光在史学编纂史上的又一伟大创举。另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此外，他的《稽古录》（二十卷）、《百官公卿表》（十卷）也均与《资治通鉴》有关。

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对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中发生

的重大政治事件、朝廷统治的得失成败、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行、不同帝王的功过是非，以及农业的丰歉、人民的安定流离等，都作了突出的记叙。对于攸关封建王朝兴亡盛衰的关键问题——战役，《通鉴》里描绘得更为生动而详尽，如《淝水之战》等，可以说是一篇优美动人的文学作品。为提醒帝王不要忽视人民的力量，书中对农民大起义的记载也比较真实、具体。司马光还在《通鉴》中写了百余条史论，它虽然是由事而发，但寓政论于其中，以供帝王“鉴前世之兴衰”，从中悟出道理，明白是非。这种将史和政有机地融为一体的高明做法，正是反映和证明了司马光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不凡眼光和过人才华。当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并非无瑕可指。如，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其立场和观点就大有问题。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

入主政事　以身许国极哀荣

《资治通鉴》书成后，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虽然失去了在朝参政的机会，却因“祸”得福，以高才大德，在朝野上下赢得了极高的声望。田野

夫老、妇人孺子莫不知道他的名字，甚至称他为“司马相公”，把他当作“真宰相”，正如苏轼为司马光所作《独乐园》诗中所云：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元丰八年（1085年），在位十八年的宋神宗病卒，他的儿子、年仅十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当时，韩维等人都去吊唁新逝的神宗。司马光也准备去奔丧，但又怕别人猜嫌，不敢径行。一直处在犹豫之中的司马光，最终在程颐的一再劝说下，遂由洛阳前去京城奔丧。那些朝廷的卫士一望见他，远远地便施礼致意，并相告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至于马都不得前行。大家一再呼吁，请求他不要再返洛阳，留下来好辅佐幼主哲宗，救救百姓。对于这件事情，在宋人的一篇记载中，描绘得更为精彩生动。其中说，元丰末年司马光由洛入京，京城的人都来“迭足聚观，即以相公目之，马至不能前”。在司马光的临时住处，市民前后潮涌，“登树骑屋窥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愿识者，司马公之丰采耳’。呵斥不退，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其得人心如此。”

面对这样的情形，司马光既感动，又害怕。感动的是，多年来人们还没有忘记他，而且对他如此诚心拥戴，敬慕有加；害怕的是，这样张扬，会引起一些人对自己的疑忌，麻烦更大。于是，他趁机便匆忙离开京都这个地方，径直回了洛阳。太皇太后闻听司马光已不辞而别，生气地斥责了一顿主事者，立即派梁惟简去洛阳慰劳司马光，并问政于他目前施政的办法。"仕宦之心久已杜绝"的司马光，见朝廷如此器重于他，难改知识分子的固有习性，不由报国之志复萌，便针对当时"阎闾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诉"的奇怪现象，明确地提出"宜下诏首开言路"。结果，消息被蔡确等人知道了，便事先制定了六条条仪，请诏榜于朝堂。大旨是：对言事若"阴有所怀"、"犯其非分"、"煽摇机事"、"迎合旧令"、上则"徼幸希进"，下则"眩惑流俗"等行为，有一相犯，则立罚无赦。司马光一眼便识破他们明为求言、实为整人的把戏，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只有不说话，一旦说了，则难免逃脱这六条"！高太后觉得有理，改诏而行，于是，言路才得渐开，上书者不计其数。从而，让一向就对司马光深有好感

的高太后，对司马光尤加赏识，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

司马光受命后准备赴职，途经京城，没想到高太后于半道上又将他留下，拜为门下侍郎，并派使者“劳问相望于道”。加上这时苏轼从登州召还京师，述说了沿途上百姓对司马光的深切期盼之情，司马光虽然几次上书力辞门下侍郎，但最终也没能动摇高太后的初衷。

客观地讲，由于王安石变法的措施过于强硬和施行中的偏差，使不少人意见很大。因此，当时的天下百姓都引领拭目，盼望革新政治。司马光也决心尽力而为之。但蔡确等人十分害怕司马光入朝，便在朝中散布说：“三年之内，不改父道。”于是，当政者只是改革了一些细微琐事，想以此来堵堵人们的嘴巴，糊弄天下。司马光上书直言：“先帝所行的法度，合宜的与和好的部分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更改，但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定的东西，已成天下之害，就该像救焚拯溺一样迫切地去改掉它。况且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不对，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律。”由于高太后也一向不满新法，欣表同意，这样众议乃定，意见方趋统一。于是，司马光和吕公著二人，同心辅政，罢

去了保甲团教，不再设保马，废除了市易法，把国库所储的财物全部卖掉，不收取一分利息，免除了百姓所欠之钱，京东铁钱及茶盐法律全都恢复原有的制度。对于司马光的这些举措，有人担心地提示他："熙、丰旧臣如章惇、吕惠卿之辈都是一伙小人，他日一旦这些人以神宗、哲宗父子关系来谗言离间，那么朋党之祸便起，不能不作考虑。"司马光正色道："老天如果保佑大宋，必定不会有事的。"于是，天下释然。其实，在这段时期内，司马光的内心也是很复杂的。他在写给侄儿的一封信里曾这样云："近蒙圣恩，除门下侍郎，举朝忌者甚众，而以愚直处其间，如黄叶在裂风中，几何不坠。是以受命以来，有惧无喜。汝辈当识此意！"

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疾病缠身的司马光，对于仍然没有罢掉的青苗、免役等法，和彻底解决的西戎边境上的一些事宜，时常耿耿于心，长叹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于是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子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现在就把它交给您了。"接着上书力论免役法的五大害处，请皇上下诏废除。并请求废掉提举常平司，建议边境应以"和戎"为策略

等，都被朝廷一一采纳。

元祐元年二月，在苏辙、刘挚等大臣的一再弹劾下，朝廷罢免了蔡确的相位，在朝野共望中，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做了宰相。这时，司马光已经六十八岁。以这样年迈力衰、身体多病之人，要他主持朝政，的确已力不从心。但司马光犹以惊人的毅力，为国鞠躬尽瘁。在相之日，司马光曾亲自书一纸榜稿揭帖公告于庭堂，曰："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等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吩咐吏人传入，光得内自省识，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宦职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计，并请进状。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

按惯例，京城士大夫自宰相至百官出入宫中，均乘马而行。鉴于司马光的身体状况不佳，不能骑马，高太后免他朝觐，特许他乘轿见驾，最后又让他三天一入省。可司马光仍要坚持到朝去听政处事。身体实在不支，则让他的儿子司马康搀扶进宫入对。为相不久，他又废除了青苗法，恢复了常平粜籴法。并陆续将因反对

变法的范纯仁、刘挚、苏轼、文彦博等人召回宫中。在改雇役复差役时，范纯仁、苏轼等均不同意司马光的做法，但司马光以一位老年人的固执，坚持己见，意在必行，而且只限五日，要求全部改之。这时权知开封府的蔡京，见风使舵，极力迎合司马光之意，五日之内，便尽改雇役为差役。为此，深得司马光赞许。这样的做法，导致了司马光在对形势认识和政事处理上的一定失误，从而也酿成了他虽有良好之愿望，但其结果又难令人满意的晚年悲剧。在对待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方面，司马光固然摆脱不了汉族中心观和中原王朝正统观的影响，但是他承认契丹族、党项族等当时的少数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也希望由汉族统治少数民族，但这种统治并不意味着武力征服。主张“交邻以信”，即使在加强战备的同时，也要以大宋的威望和气度去感化辽国和西夏，使他们真正佩服。巩固边防主要不在于扩军，而在于择好将帅，练好兵。司马光更是反对战争。所以，在他任相时将变法期间侵占西夏的领土，应西夏请求物归原主。因此，辽与西夏的使者到了宋，都必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他们的国君更下令给守边的将官说：“大宋已是司马

光为相了，你们切勿在边境生衅滋事！”这段情况，史称“元祐更化”。

司马光见两宫言听计从，越为激发忠忱，于是更加勤政，不分昼夜，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付与国事。大家见他身体日渐瘦弱，劝他以诸葛亮“食少事烦”为戒，他却说：“死生由命，一息尚存，怎敢少懈呢？”反而愈加不顾一切，以致病倒不起。就在他病危弥留之际，他还不停地呓语，所说的全是朝廷天下的大事。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九月，仅做了八个月宰相的司马光，终于在日夜操劳中溘然谢世，享年六十八岁。

长眠地下　毁誉荣辱盖棺起

历经世事沧桑，走完了六十八年人生历程的司马光，怀着抱国之志未竟的遗憾，长眠于故乡的先茔之地。但是，冥冥之中的司马光，的确未能料到，于他身后不久，竟会事端连起，以致在朝野、于后世荣辱与毁誉参半。

在当时那些君臣的眼里，司马光首先是一位良弼忠臣。他常说：“臣世受国恩，常思补报。”“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心非木石，岂能暂忘。”他对宋王朝的感恩戴德，不仅反映在他的大量著作中，而且体

现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中。

当他初举进士步入仕途时，时时以“天下安危为念”，并常常在睡梦中惊起，“着公服，执手版，危坐久之。”参政后，为捍卫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他每每慷慨陈词，力论是非，不惜以死谏争，借以表达自己“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和一贯主张。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那么国家也会因此而“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通鉴》卷七）。这样的看法，在司马光的许多表、札、论、书中，都作过多次发挥，直到他临死的一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在向皇帝呈上《稽古录》一书时，司马光仍然把这段话一字不改地写了进去。可见，他是把用人、礼治、仁政、信义等原则，作为他一生从政和安邦治国的根本准则与政治基石的，而且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他也是努力去实践的。特别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他六七次抗争不受枢密副使，甚至豫作《遗表》，俟死以谏。任相后，更是“躬亲庶务，不舍昼夜，欲以身殉天下”，以至“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为宋王

朝鞠躬尽瘁，忘命舍身。所以，欧阳修曾经向宋神宗推荐，称他可谓“社稷之臣”。《宋史》评价他“有旋乾转坤之功”。司马光辞世后的当年，宋哲宗在《故赠太师追封温国公司马光安葬祭文》里，称赞他是一位“名高当世，行满天下”，为“中外所属”的“社稷之卫”和一代“宗臣”。苏轼在他的《司马文正公行状》、《司马文正公神道碑》和《祭司马君实文》中，更为推崇他的“至诚”和“一德”，“感人心，动天地”。范镇在《司马文正公铭》里，也称其“率其诚心，以佐天子”。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亦称司马光有“夷齐之清，渊骞之德，子产之惠，叔向之直”。著名理学家程颐《祭司马温公文》还是称他“诚贯天地”。类似这样众口如一的推崇与褒奖，虽然不免有点溢美，但至少证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大家对司马光的看法与认识是一致的。

在当时世人的眼里，司马光又是一位君子仁人。《宋史·司马光传》评价他说：“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并举例说，当司马光在洛阳时，他每次回夏县老家，都要去看望他的长兄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侍奉他，还像照顾小孩那样

关爱他。而且说，司马光自少至老，从来不说谎话，他常说："我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因此，深为"天下敬信"。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都被他的德行感化，大家一旦做了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在宦海沉浮中，司马光也始终以言行无私而著称。

对朝政得失、人事进退等，他都敢于切直而论，面折廷争，无论皇帝还是同僚等。如他对王安石的新法有看法，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几次写信给王安石，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并当着吕惠卿的面，指责吕惠卿。后来，因政见不同，王安石拜相，司马光力求外任；司马光拜相，而王安石也同样离京外仕，似这种言听则留、不听则去的行为，的确不失正人君子和政治家的风度。

其他如对王曾、张知白、薛奎、范纯仁的荐贤，对马季良、罗崇勋、任守忠、张广平、高居简、王广渊等的抨击，都刚正不阿，必达目的而后止。

特别为人称道的，是司马光在生活上的清俭自守。无论是作为官宦子弟，还是后来做官为臣，乃至身居庙堂之显位，司马光始终都崇尚俭朴，厌恶奢靡，并身体

力行，廉洁自奉。宋仁宗曾遗赐给他价值百余万的珠金，他三次上章坚辞，在英宗不许的情况下，他便把其中的大部分充公，作为谏院费用。别的士大夫家呼婢唤奴，他居然囊中羞涩，买不起一个佣人。像他一样的官宦之家，钟鸣鼎食，衣锦室金，他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就是他在洛阳时买地修筑的那所“独乐园”，当朝廷使臣光顾时，也不禁为其房舍低矮和陈设简陋而感到寒碜！尤其是他的夫人亡故后，由于经济上不宽裕，他只好将自己的一块田地卖了，才送别亡妻。这便是世代广为流传的故事“司马光典田葬妻”。他常说：“光自结发以来，虽行无所长，然实不敢锱铢妄取于人，此众人所知也。”因此，他以“恶衣菲食以终其身”。直到临死，他的屋里依然是“床箦萧然，惟枕间有役书一卷”。宋人为之作挽词云：“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像司马光这样的勤俭清廉，确实为一般封建官僚所不及。当然，生活在封建社会高层的司马光虽然比同一时代、同一阶级的人要俭朴些，跟广大的黎民百姓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不过，在北宋仕风败坏不堪的浊流中，他能卓然兀立，行高于世，其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朱熹就曾

称司马光是个“严而正”的人。

在当时读书人的眼里，司马光还是一位名贤硕儒。司马光本人曾经常说自己是“家世为儒”，“徒以儒术承家”。据他说，这样的“儒”，既不同于那些“高冠博带、广袂之衣”的人，也不同于“执简伏册，呻吟不息”，或者“点墨濡翰，织制绮组之文”的人，而是像颜太初那样，既埋头钻研先王之道，而又身体力行，德化乡党，不求人知的学者。故而，他一生潜心研读儒家学说，涉猎颇多；并创立涑水学派，著名门人有刘安世、范祖禹、晁说之等，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礼治”和“仁政”思想。《宋史·司马光传》说：“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也就是说，司马光在物质享受上无所求，而对学问则追求广博精深。所以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说他“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朱熹在《六先生画像赞》中，把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和张载，一同尊为北宋理学“六先生”。司马光的著述，除《资治通鉴》以及其他史学著作外，还有《格物论》、《中和论》、《孝经指解》、《易说》、《注系辞》、《注太玄经》、《扬子浅释》、《说玄》、《葬论》等等。虽然他的理学贡

献不如其他五位“先生”宏富精深，但在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初期，司马光仍是居于重要地位的开创者之一。在他的政治实践和为人处世中，司马光也始终是以一个儒家的身份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元代的郝经在《题司马温公画像》一诗里，即称司马光“问学德度兼名节，纯粹骨鲠一大儒”。

不幸的是，由于北宋“党争”的祸根，却给司马光及许多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患及厄运。

宋哲宗绍圣初年（1094 年），在司马光逝世还不到十年，先哲尸骨未寒，宋王朝政治集团内部即爆发出第一次论战，开始对死去的司马光发难。事情自然起因于宋哲宗元祐年间的新、旧党派之间的积怨和矛盾。当时，所谓的“保守派”（“旧党”）中又有三党，即以洛阳籍人士程颐为首，朱光庭、贾易等为主要成员的“洛党”，以四川籍苏轼为首，苏辙、吕陶等为主要成员的“蜀党”，和以北方刘挚为首，梁焘、刘安世等为主要成员的“朔党”。以上“旧党”均与以王安石为首、章惇等为主要成员的“新党”彼此争斗，到元祐八年（1093 年）哲宗独立亲政才告结束。当时，新、旧党的主要代表人物

王安石、司马光均已作古，其他“旧党”中人也多数年已垂暮或去世。因此，这时正身居庙堂的王安石之学生章惇、蔡京及其弟王安石之婿蔡卞，便托“绍述新政”之说，党同伐异，力排元祐党人，挟嫌报怨，陷害异己，株连甚众。司马光无疑首当其冲。他们首先告御状说，司马光“诬谤先帝（神宗），尽废其法”，继之奏请哲宗以谋对司马光行“发冢斫棺”之事。对此朝臣议论纷纷。门下侍郎许将认为：“发人之墓，并非盛德之举。”哲宗也觉没有理。不过，他虽然没有让章、蔡一伙上演成一出骇人听闻的发冢、斫棺、暴尸的恶作剧，却下令夺其“赠谥”，砸毁他亲自篆额、苏轼撰文并书丹的《司马温公神道碑》，同时，诏示天下：“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不久，又追贬为“朱崖军司户”。

宋徽宗即位，曾一度为司马光恢复名誉，追赠“太子太保”。到了宋徽宗崇宁间，因史称“六贼”之首的蔡京为相，司马光再度受辱。为了报复宋哲宗元符末年（1100年）曾经弹劾过自己的大臣，进一步打击、迫害元祐旧臣及其同情者，崇宁

元年（1102 年）九月，蔡京唆使徽宗将元祐年间反对新法的大臣和宋哲宗元符年间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如文彦博、苏轼、程颐、秦观共一百二十人，全部列为“奸党”，作为“党魁”的司马光自然名在其列。并奏请徽宗御书，镌石刻名，立于端礼门，史称《元祐党籍碑》。接着，徽宗又下诏，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或称《元祐党人碑》。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 年）六月，徽宗再次下令重新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反对绍述之政的官员，合为一籍，共 309 人，亦以“奸党”论之。滑稽的是，这次新党中的章惇也名在其中。入籍者不仅蒙受极大耻辱，而且受到极大迫害，甚至其子孙也不得在京师做官，更不能与宗室通婚。后来徽宗感觉不妥，又下令销毁全部刻石。直到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始将元祐党人出籍，生者复原职，死者追复生前官职。但终徽宗一朝，元祐党人均未获重用。

据载，在刻立《党籍碑》时，有个名叫安民的石工，极不忍心将名贤司马光的名字刻上去，蔡京等人便对他施以淫威。无奈之下，安民只好哭着请求他们，恕在碑末不要把自己的名字署上去，以便留下

万世骂名，耻辱子孙。一席话，令所有在场者都感到愧心。据资料可知，《元祐党籍碑》目前全国现仅存二石，但非原物，为南宋时重刻，均保存于广西。一石原碑在广西融水，刻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另有一石，在广西桂林七星山瑶光峰下的龙隐岩，为摩崖石刻，刻于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系梁律据家藏旧本摹刻。石刻距地丈余，蔡京手书的“元祐党籍”四字尚清晰，其余文字因风雨侵蚀多已模糊，但尚可辨认。清代时，有个名叫丘园的人，曾写过一个传奇剧本，名字就叫《党人碑》。说的是蔡京立碑，指司马光、苏轼等人为“奸党”，侍郎刘逵上书谏阻而被捕，其婿谢琼仙也因打碎“党人碑”而逃亡。最后刘逵奉命镇压田虎立功，并与女婿、女儿团圆。

南宋末年，宋理宗赵昀于宝庆二年（1226年）绘司马光像，奉祀于崇奉阁；端平二年（1235年）又将司马光、苏轼等十人从祀于孔庙。宋度宗赵禥咸淳元年（1265年）仍将司马光从祀于孔庙。

自宋而降以迄明清，历代封建帝王与名臣儒子，无不将司马光奉为楷模与典范。由章惇等所毁的《司马温公神道碑》先后被金代夏县县令王庭直、明代巡御史

朱实昌重刊和重立，雄文四播，丰碑再起；司马光墓及其祖茔也得到守护和修葺。明清时，司马光更被奉为位于孔、孟之下的第三位儒学圣人，享祀于孔庙之内。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认识上的差异，十年动乱时期，由于政治的需要，司马光又一度被视为“顽固”、“落后”的“保守派”，甚至是反动的“投降派”、“卖国贼”，近乎丑类和罪人。好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尽管现在人们对他的评价见智见仁，但谁也无法否定司马光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历史功绩。

《通鉴》刊行　影响后世数百年

史学巨帙《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继西汉司马迁《史记》之后，对中国史学的又一巨大贡献。自书成问世，不论在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首先成为宋王室以及后世君王“安邦治世”的“国器”和对皇太子必施的治国“教材”，而且被历代人臣学士奉为“圭臬”和经世致用最权威的“经典”。

据史载，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当司马光把完成了的《资治通鉴》呈给宋神宗时，神宗即降诏奖谕道：“前代还没有听说和见到过这样的书，它比荀

悦的《汉纪》还要好得多了。”并诏来各位辅臣来观，尔后又在每页的首末合缝处，盖上“睿思殿宝”御印，以示珍爱。同时，给予司马光和协修人员职位提升和物质赏赐。后来，尚未来得及安排刊印，神宗就去世了。宋哲宗元祐元年初，司马光奏荐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与范祖禹、司马康同校《资治通鉴》。时至十月，即司马光谢世一个月，《通鉴》始由国子监上奏，并奉旨在杭州镂版。到元祐七年（1092年），历时六年之久，《通鉴》才刻成面世。这是《通鉴》成书后第一次刊行。书出后，宋哲宗降诏：“诸州安抚钤辖司，并西京、南京，各赐《通鉴》一部，又诏以一部赐刘恕家。”因为书成之后，哲宗对编修参与者论功行赏，司马光升迁资政殿学士，范祖禹提拔为秘书省正字，并分别享受了锦帛衣带鞍马之赐。期间，刘攽因事废黜，唯独重要骨干刘恕不幸已故，未能蒙恩受赏。司马光生前也曾以书成陈说过刘恕之功，并请求能给刘恕的儿子安排一个职位，神宗遂诏录其子刘羲仲为郊社斋郎。

宋哲宗绍圣初年后，章惇、蔡京擅政，司马光等被诬为“奸党”，既夺赠谥，仆其碑，又连遭追贬。在范祖禹之《唐

鉴》以及苏轼父子等人文集均被“诏毁刊行”的情况下，章惇、蔡卞又指使“亲党”薛昂、林自上书议毁《通鉴》书版。幸赖太学博士陈瓘，以策士题中特引神宗为本书所写的序文为由，极力相阻，才使《通鉴》书版免遭厄运，从而束之高阁，得以保存。

金人入汴，向宋廷索要国子监内的藏书，指名除苏轼、黄庭坚等人文集外，特别要带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宋高宗赵构读了《通鉴》，对他的讲官们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宋高宗赵构绍兴四年（1134年），高宗遣人出使契丹，以此书作为“国礼”馈赠金人。宋孝宗赵昚在明远楼下，问他的皇太子：“近日《资治通鉴》已熟，还读一些什么书？”皇太子回答他：“经史并读。”孝宗说：“先以经为主，史亦不可废。”可见当时帝王也提倡读《通鉴》，因而《通鉴》也得以广为印行和流传。

据今人高振铎先生考证和不完全统计，该书自成书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九百余年间，至少刊刻过76次（包括节选本）。其中北宋1次，南宋26次，元代10次，明代11次，清代9次，民国7次，

新中国9次。平均每13年刊刻出版一次。具体到以上各代，可知北宋44年1次，南宋每5年1次，元代每9年1次，明代23年1次，清代29年1次，民国5年1次，新中国每3年1次。刊印如此频繁，这在我国古代各种史书刊刻史上确属罕见，也由此可见《通鉴》一书被重视、受欢迎的程度。南宋时期出版印行次数最多，可以说是这一时期"通鉴学"极盛的反映。

不独刊行如此，此书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家、学子也影响极大。晁说之（1059—1129年）曾评价说："博之以《五经》，而约之于《孝经》、《论语》；博之以太史欧阳公《史记》，而约之于《资治通鉴》。"洪迈（1123—1202年）竟将《资治通鉴》用手抄了三遍！张仲隆专门筑室，其间什么东西也不放，而"独取《资治通鉴》数十帙列其中，日尽数卷"，并以《通鉴》名其室。王应麟（1223—1296年）认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赵崇度（1175—1230年）少时，他的父亲赵汝愚曾给他一部《通鉴》，并嘱咐他好好去读，原因是"读是书可以见古今兴坏存亡之故"。宋元之际的胡三省（1230—1302年）认为："《通鉴》不特纪治乱之

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各充其量而已。”据《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对于《资治通鉴》也十分喜爱。“每陈说《资治通鉴》，虽在军中，未尝废书。”并设立蒙古国子学，用蒙语译写的《通鉴节要》作为教材。明太祖朱元璋也推崇《资治通鉴》，每日早晨都要进行研读，“习闻明知古代帝王之道，身体力行《通鉴》原则。”至清代，《通鉴》更是见重于帝王、学者与史家。清圣祖康熙对《资治通鉴》格外迷恋，经常翻阅，并说，《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王鸣盛说：“(《通鉴》)此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作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资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龚自珍在《杭大宗逸事状》中记载说，杭大宗在主讲扬州安定书院时，把《通鉴》与世称“三通”的杜氏《通典》、

马氏《文献通考》和郑氏《通志》，作为课徒的“四通”。顾炎武在其所著的《日知录》中说，他自十一岁便读《通鉴》，十四岁读完，深感它对自己帮助很大。曾国藩亦知重视《通鉴》，认为“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成学”。这“七书”，即为《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和《通鉴》。并在致罗少村书信中这样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公之《通鉴》。其论古皆折中至当，开拓心胸。……阁下若能熟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循，而不至失坠。”

值得一提的是，自《资治通鉴》成书问世后，在史学界更掀起了一浪又一浪“通鉴热潮”。不少人都曾仿照《通鉴》的编年体例和方法，撰写、刊印了许多类似或相关的“通鉴体”史学著作，并在研究领域形成一种专门学问——“通鉴学”。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北宋刘恕的《通鉴外记》（包括目录共三十五卷）、范祖禹的《唐鉴》（二十卷）、胡安国的《通鉴举要补遗》、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

十卷）、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以及明代薛应旗的《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清代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夏燮的《明通鉴》（包括附录共一百一十五卷）、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十六卷）等。而其中尤以袁枢、朱熹为最，对史学贡献非凡。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州建安人。他常常喜诵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在研读中，他发现，《资治通鉴》在编年纪事时，一事首尾往往散见于几年或几十年之中，不便阅读，便把《资治通鉴》中重要史实，按性质归纳于二百三十九个专题之中，摘编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这本书不仅方便了读者，而且在我国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纪事本末体”的编撰体例。继起仿效者，更是代有其人，如南宋杨仲良的《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以及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等等。

南宋年间的朱熹，依《通鉴》所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这本书，也是编年纪事，每年之中，按朱熹的“义例”，先列大事，叫做“纲”，“纲”以下再详述细节，叫做“目”，分别用大号、小号字付印，这就是所谓的“纲目体”。这种史书的写法，后来也曾不断有人模仿。如袁黄的《历史纲鉴补》、王世贞的《纲鉴会纂》、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等。足见《通鉴》影响之大。

近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的研究、出版更为重视。史学家郭沫若、翦伯赞、陈垣等都把《通鉴》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文献。陈垣先生并撰写了《通鉴胡注表微》，充分肯定了这部书在传播我国历史知识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

开国领袖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兼卓越超群的学者，文韬武略，对《资治通鉴》也情有独钟，一生曾阅读过十七遍，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也多次引用过《通鉴》中所载的史实。1956 年，在他的领导、鼓励、支持下，由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等十二位专家组成了“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先于二十四史标点、校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点校本《资治通鉴》。无论对

深入研究，还是对广泛普及，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75 年 5 月，即毛泽东去世前一年，他还对人说，一定要好好地读读《资治通鉴》。

周恩来总理生前对《资治通鉴》的出版也十分重视，他曾对“四人帮”肆意阻挠古籍出版的罪恶行径，愤慨地指责道：“《资治通鉴》还用审查吗!?”

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资治通鉴》者也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曾经为害成灾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和破坏，涉足于《通鉴》研究的人一度寥寥无几。随着党和国家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学术思想大解放，致力于这部巨著研究的学者又逐渐多起来，他们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取得了不少卓有见识的研究成果。

1984 年和 1986 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山西夏县司马光墓文管所，曾先后各自举行了以纪念司马光逝世及其《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周年学术研讨，同时出版了不少新的研究论文和论著，把研究工作不断引向深入，掀起又一浪学术研讨高潮。

学者们一致认为，《资治通鉴》不啻是一部举世公认和推崇的史学巨著，其文

学艺术特色也十分显著。它虽然是史学作品而非文学作品，但其中的确不乏优秀的历史文学成分，这也正是《通鉴》获得不少人喜爱的一个原因。

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刻画。它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内心状态的描写（如董卓）、言谈议论的记叙（如韩信）和人物之间复杂矛盾与激烈争斗的勾勒（如《蜀汉之亡》里的司马昭），进而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典型性格。

其次是通过细节描写，对于人物和事件起到开拓场面、渲染气氛、突出特征、增强感染力等等不同作用。如《赤壁之战》、《侯景之乱》、《安史之乱》等。

第三是在交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各种矛盾中，特别注意情节的刻画、描绘、衔接与强化，使本来显得平淡枯燥的记述，情节跌宕、神采张扬。如吕布刺董卓。

第四是采取倒叙、穿插、取舍等手法，在记事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关系处理上，进行了大量的剪裁运化。

第五是讲究文字修饰，力求简洁洗练，形象化、个性化。

司马光曾自称："颇慕古文"而"不

能刻意致力”（《答陈充秘校书》），他的文章也正是因为不甚刻意致力而得自然之致。总之，《通鉴》在史学与文学上俱获成功，不仅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哲人虽去　无穷财富遗世人

司马光虽然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与文化财富是极为丰富的，而且从他的人生经历中，也会给我们不少有益的思考和启迪。

司马光的人品具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他的道德操守几乎完美到无可挑剔的境地。即使在今天，他身上的笃诚质朴、清俭廉洁及务实作风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求学之毅力、治学之严谨，以及为了完成自己的伟大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慕名利，甘守寂寞，勇于献身，死而无憾的精神，更是后世学子的楷模。尤其是他遗留下来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堪称是中国史学宝库中可与司马迁《史记》媲美、并称的“一双巨璧”。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司马光：

> 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指主撰《资治通

鉴》——引者注）。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摘自毛泽东1975年同工作人员孟锦云的谈话（见范忠程主编的《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193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1954年冬同吴晗的谈话（摘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4页，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

另据目前所知，传世的和新发现的有关司马光的墨迹和刻石等珍贵文物也是令

人瞩目的，主要有：

1.《资治通鉴》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原稿文字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余字。记载的史实是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将作乱”至十二月“慕容遣子 入令支掠居民千余而还”为止。系今《资治通鉴》第九十二卷内容，但文字与今通行本多有不同，并且每段史事只写开头二三字或四五字，以下便以“云云”二字略去。专家据此推测，此残卷若非《通志》原稿，即为《资治通鉴》初稿，还有人认为是《通鉴》成书后的删削提示稿。

十分珍贵而有意义的是，手稿起草于范纯仁写给司马光和司马旦兄弟二人的书札上，后面又有司马光手书的陈谢状。原札的文字虽经墨笔涂抹，但原文仍依稀可辨。手稿通体正楷，作字方正，“未尝为纵逸之态”（黄缙跋），正楷中又有隶书笔意，颇有南北朝的气息。于一纸间集中了范纯仁书札、司马光史稿和“谢人惠物状”，堪称“幅纸三绝”。因此，历代藏书家将这件手稿视为无价瑰宝竞相收藏，手卷上的藏印有十余处（枚）之多。如宋人任希夷、赵汝述、葛洪、赵崇和；元人柳贯、黄缙、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佑等

人。清乾隆时所编《石渠宝笈》等书均有著录。可见，此手稿原为私家收藏，清代入藏内府，成为乾隆、嘉庆、宣统等皇帝的秘籍珍玩。它是一件流传有绪的文物，是善本中之善本，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

2. 司马光笔记。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目前所知有日录三卷、手录二卷。日录逐日记录了朝内外大事，正好弥补了史书记载中有关王安石变法最初几年的空白；手录则详尽生动地记载了司马光自己谒见皇帝的情形。

3.《宁州帖》。现藏上海博物馆。长32.7、宽57.6厘米。2002年上海博物馆为庆祝建馆五十周年，与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共七十二件）中曾展出。从帖的落款“叔光（“光”字为花押）报九承议”看，可知是司马光答复给在宁州任官的侄儿——司马富的书信。内容为希望侄儿尽快辞职，返回故里以侍奉年迈的尊亲。时间约在司马光六十七岁前后。

本帖全系一丝不苟的正楷，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在横画的入笔出锋之处，时常带有隶意“蚕头凤尾”的意图与造型，明显地融入了隶书的传统。

4.《天圣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长30.3、宽48.6厘米。十七行，共一百五十一字。结体方正，沉着厚重。

5.《王尚恭墓志》。现藏开封市博物馆。刻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十月，1936年在洛阳北陈庄出土。志石呈正方形，长、宽均为77、厚15厘米。志文为隶书，四十一行，满行二十字。志文为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所撰，司马光书丹，李稹镌刻。是一方集名人撰文、名家书丹、名师镌刻的集大成之名志。可见，司马光不仅以史学著称，也以书法显名于当时。黄庭坚《论书》中即评价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书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宋高宗也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明末清初朱彝尊引《宋鉴》中即有宋高宗珍藏司马光隶书《中庸》、《家人》五卷的记载。我们现在见到的多为司马光楷书，而隶则罕见。2001年，《中国文物报》曾发表唐冬冬的一篇介绍该墓志的文章，文章称："就司马光书法而论，此墓志取法不高，似是承袭曹魏《王基残碑》等'铭书石'而来，故其淳

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孤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不怒而威的风致。在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风盛行之际，可谓难得之佳作。”

6.《家人卦》等刻石位于浙江南屏山麓。旁边还有《乐记》和《中庸》。《家人卦》从“家人利女贞”至“反身之谓也”，共二百零二字，宽2.21、高2.71米。隶书十二行，每行十七字，字径四寸余。《乐记》隶书十行，一百九十七字。《武林旧事》说此摩崖出自唐人手笔，而《四朝见闻录》、咸淳《临安志》、《梦粱录》均说是司马光书。阮元《两浙金石志》云：“据《宋鉴》称，绍兴六年十月庚辰，上谕大臣曰：司马光隶字真似汉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书乃《中庸》与《家人卦》，皆修身治国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摩崖所刊，合乎《宋鉴》，当是诸大臣闻思陵而谕，请刊于石者。”崖石左侧有“琴台”二字，为北宋书家米芾所书，至今仍依稀可辨。现为浙江省文物保

护单位。

7.“元祐通宝”钱文。中国历代钱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件瑰宝。在世界钱币史上，它以注重文字而独树一帜。宋代是中国钱文书法最为辉煌的时代。宋初，喜爱书法的宋太宗赵光义亲书钱文，首开宋代钱文书法之先河，而且书体备及真、行、草、隶，种类繁多，书写者多为当时的皇帝和名流大家。北宋哲宗赵煦元祐年间发行的“元祐通宝”和“元丰通宝”，其钱文就分别为苏轼和司马光所书。司马光的钱文书法严整劲峭，书如其人，是一件极美的艺术品。

8.《魏闲墓志》。现藏山西省平陆县博物馆。刻于宋熙宁二年（1069年）。清光绪初年出土。司马光撰。《文集》有载。

9.南宋牒文（卷）两件。一为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残长193、宽26.8厘米。一为乾道八年（1172年），长222、宽26.9厘米。均是给司马光后裔、山阴司马 的。

10.司马光刻像。现藏司马光茔祠。明嘉靖八年（1529年）刻。上题司马光《自题写真》诗一首。

11.耆英会图。现存河南淇县。为近年新发现。绢本，设色，高200、宽95.3

厘米。画面为高山峻岭，山林中一厅，厅中有老者十三人，童子三人。神态各异。题款云："文潞公耆英会图。嘉平中"。落款："叟子"。经鉴定，为北宋之物。图中有司马光。

据载，司马光还发展了古代一种叫做"投壶"的游戏。投壶，是从先秦时射击礼中衍化而来，一般在宴饮时举行。设特制的一个壶，宾主依次往壶中投矢，中多者为胜，输者罚酒。入宋以后，投壶游戏活动有所衰减，但在士大夫间仍有流行。司马光在这一古代游戏基础上，又更新制定了一套投壶规则。熙宁五年，他曾作《投壶新格》一文，专门论述，并从投壶游戏引申到治心、修身、为国、观人的"大道"。于细小中见大，游戏中得益。宋人王辟之在所著《渑水燕谈录》中既指出："此足以见公之志，虽嬉戏之间，亦不忘于正也。"由此也可见司马光对事物事事在心，处处留意的观察力和透析力。

因司马光这位历史名人的效应，给他当年曾经生活或涉足过的地方，也大为增彩添光。受惠最多者，当是司马光出生地——河南光山。自宋以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里巷、书院、遗迹随处可见；为他建祠立碑、题诗、作记的，更是代不

乏人。1993年，光山建立一座卷烟厂，该厂新产品开发人员即从《光山县志》和近千幅司马光古代肖像中，遴选出最具代表特征的一幅画像为蓝本，设计了一个以司马光肖像为主体的“司马光”牌香烟精品，并获国家商标管理局批准注册，投放市场，为当地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效益。

世事俱往　故园茔祠话沧桑

历经时代风雨，任人述说评断，我们最终不能不回首一下那片守护着司马光的英灵之地，凭吊这位“德行功业，冠绝一世”的高贤哲人。

从山西大同至运城高速公路上的水头镇通往夏县县城，登上蜿蜒逦迤的峨嵋岭(古称鸣条冈)，便会看到公路干线以西有一显明标志，在宽达50米的柏油大道之尽头，坐落着一处红墙匝绕、绿树掩映的古建筑群，这就是一代宗臣、杰出史家司马光的茔祠所在地。

茔祠地属小晁村，这里原本无村，大约为明代时避地浙江山阴的司马氏后裔为先人守坟而成为聚落的。现在村中即有不少司马光的子孙后人。

距茔祠不远，有个司马村，就是司马光的故里。明嘉靖间巡按朱实昌曾偕州、

县地方官员，鸠工集材，兴建牌坊一座，匾题“司马故里”。并在茔祠的东西建牌门两座，依茔祠地理，分别以“鸣条发秀”、“涑水锺灵”为题额。

当年司马光在夏县的一处独乐园，也在附近的坡底村。光绪《夏县志》记载说：“按《名臣录》，温公居洛，兄旦居夏县，胥有园池胜概。光岁往一省旦，旦亦间至洛视光。”宋·洪迈《六合斋随笔》有“乔木参天独乐园，至今犹是温公宅”之句。据载，在这座司马氏的别墅里，原来还有司马光作相之时“饬其家人不得怙势挠法，揭榜于此”的榜亭。今废。

司马光茔祠兀立于峨嵋岭上，四野开阔，景物殊胜。茔前中条横亘，瑶台呈瑞，峰岭回环，奔赴成势；祠后稷峰雄峙，涑水萦绕，阡陌交错，山川锦绣。每当春秋之际，“花满一川红蕊乱，渠环千顷翠波分”（司马康诗句），诗情画意，风光宜人。

茔祠占地一百余亩，平方旷达，规模宏敞，分四个区域：

文化广场　占地40余亩，为近年修建。中央雕塑司马光铜像一尊，高6.8米，寓司马光享年六十八岁。两侧另有司马光“砸缸救友”和“著述《通鉴》”两

组铜雕作品。

墓地　位于中轴线西侧，占地约50亩，这里栖息着司马光及其先祖和众多族人。现存墓冢十三座。每座周长5～100米，高1～5米不等。古冢垒垒，树木森森，石刻遍布，气象肃穆。据《夏县志》记载，除司马光远祖征东大将军司马阳墓远在墓地半里外，目前所知者，属司马光直系的墓葬有他的曾祖政、祖炫、父池、兄旦，及其子康；旁支的有他的叔伯父和从兄弟浩、沂、谘、里、宣等。

司马光先祖茔地，大约成于宋仁宗天圣之时或稍前。司马光在给他的叔伯父《司马浩墓志表》里曾这样谈及，当时，由于家贫，“祖墓迫隘，尊卑长幼前后积若干丧久未之葬”，司马浩因“以学究举，凡八上，终不遇，遂绝意不复自进于有司，专以治家为事”，待到家里稍有积蓄，司马浩方于“祖墓之西相地为新墓，称家之有，……悉举而葬之”。

司马光于生前曾几次请假或假便祭扫先茔，但多因公务缠身，只好匆匆而来，又急急而去。在他的《文集》里，我们明确可知者，有皇祐二年（1050年）、嘉祐元年（1056年）、治平二年（1065年）这么几次，司马光并有诗记之。如治平二年

所记：

十六载重归，顺途歌式微。
青松敝庐在，白首故人稀。
外饰服章改，流光颜貌非。
巫咸旧山色，相见尚依依。

另外还有：

十年一展墓，旬浃复东旋。
岂负襁褓爱，横遭章绶缠。
更来无几日，遗恨恐终天。
恸哭出松径，悲风为飒然。

表露了司马光从仕在外、忠孝难得两全的复杂之感，和对故园及先祖的深深怀念之情。尤其是对父母双亲，司马光始终都为自己未能于其生前死后以报劬劳、以尽孝道而深愧不安。故数年之后，司马光仍不免有“平生念此心先乱”之叹。

元祐元年（1086 年），司马光逝世后即归葬于此。除《宋史》和苏轼所撰司马光及其神道碑所载的当时有关情况之外，当时负责治丧工程的司马光侄儿司马富在《修坟记》中还透露，当司马光卒世后，高太皇太后和宋哲宗曾遣使臣诏命其子司马康说，“你父乃朝廷忠臣，他为了国家鞠躬尽瘁，以致损厥其寿，令人十分伤痛。为嘉其德行，以报其诚，朕决定以国礼安葬你父。”深受司马光言传身教，并

秉承司马家风的司马康泣血而辞说："臣父平生有俭约之德，生前他曾多次训诫我等，死后定要薄葬，如今他老人家的遗书尚在。现在朝廷这样决定，实在盛大崇广，上费国家之财，下劳百姓之力，这就恐怕不是先父的本愿了。"因而固辞不受。但在朝廷一再"诏命"之下，司马康不得不从。朝廷不仅下令内侍省供奉李永言等亲诣司马光先茔相地卜宅，发陕、解、蒲、华四州之卒穿土治圹，选上方百工制作丧具，还旨命尚书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特护司马光灵柩回归夏县安葬。

在安葬司马光时，宋哲宗特制《故赠太师追封温国公司马光安葬祭文》。曰：

> 呜呼！元丰之末，天步维艰。社稷之卫，中外所属。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当世，行满天下。措国于泰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岁月未周，纪纲约定。天若相之，又复夺之。殄瘁不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圣母。驯致其道，太平中期。长为宗臣，以表后世，入奠其葬，庶知予怀。

苏轼、范纯仁、程颐、范镇、文彦博、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也作有祭文或挽

诗。如黄庭坚的《挽司马温公》（共三首），其中之一云：

毁誉盖棺了，于今名君实。
哀荣有王命，终始著民言。
蝉冕三公府，深衣独乐园。
平生两无累，忧国爱元元。

文彦博挽诗亦有："东山方起为霖雨，大厦俄顷叹逝川"和"两宫痛惜皆临奠，只为夔皋志未宣"之叹。

在司马光的神道两旁，分列有高大庄重的石翁仲，古朴简练的石虎石羊等，虽经千余年的风雨洗礼，犹风采依旧，雄浑苍然。

祠堂　位于茔祠中轴线上。创建于宋金之际，历代重修。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时，夏县县令李遵堂修建为正殿五楹，左右廊房各五楹，并立"崇贤坊"一座。规模宏敞，轮奂聿新。现正殿犹存，唯享亭及东西廊为新修。享亭五间，内藏金代夏县令王庭直摹刊重立苏轼撰文并书丹的《司马温公神道碑》，（俗称"杏花碑"）。关于此碑，颇有一段神奇经历——

哲宗绍圣初年，因谗臣毁构陷，司马光遭贬，差点被章惇、蔡卞一伙奸人掘了坟。后在臣子谏议下，虽然没有酿成历史

悲剧，但昏了头的儿皇帝赵煦却居然允准章、蔡一伙将他钦定、御赐“忠清粹德”之额和苏轼撰文并书丹的《司马温公神道碑》仆毁。

据说，当章、蔡之徒砸碑的那天，万里晴空，突然间，阴风骤起，飞沙走石，无人敢于近前。后来一人大胆逞勇，奋锤猛击，大碑俄倾，那人也成了碑下之鬼。由于碑额为御篆，碑趺也高大，他们遂将碑身及文字断毁，而后挖坑掩埋。

直到金皇统八年（1148 年），也就是事后五十余年的一天，就任夏县邑令的王庭直拜谒司马光墓时，听了守墓僧人讲述往事，发现在碑座之旁生长一杏树，“虬枝蟠屈，周映交护”，长势十分奇特，不由感慨系之。遂命人就地去挖，终于在深土中发现了当年被毁的断碑。由于当时财力所限，寻找巨石恢复原碑不易，所以就依石取材，巧妙地将残石加以整理，磨制成大小相等五石，再以寻访到的原拓为蓝本，缩小摹刻，连同碑额与碑座，嵌存于僧人圆珍捐资修建的碑堂内，故后人称此碑为“杏花碑”。

大约又过了近四百年，到了明嘉靖三年（1521 年），御史朱实昌巡盐河东瞻仰司马光墓时，看到宋哲宗的御篆之额和昔

日高大的龟趺，不由产生恢复原碑的想法。为此，特从二百里之外的碑石产地—稷山，精选巨石，利用冬日冰天雪地，牛拉人推，历经数日才运到墓地，而后揣度宋碑规制，于原地重立。现耸峙于墓道之前、茔祠墙垣之外、司马光文化广场南侧碑楼内的巨碑，就是当年朱实昌的杰作。碑之额、趺依然是宋代原物，碑文也是苏轼原作，而书丹则变为朱实昌的手笔了。

这通碑的形制虽属一般，但其螭首之大（高 1.8 米），龟趺之巨（高 1.6 米），碑身之高（5.16 米），的确是异乎寻常的。丰碑再起，巨笔永传司马精神。碑石上那洋洋洒洒的二千三百余字雄文，永远昭示着司马光一生的丰功伟绩。

当我们伫立于碑前，读苏轼雄文，观文豪巨笔，想其不凡经历，一定会感慨万端，怜喜交集。

主殿高大雄伟，宽敞明丽。原祀司马光及先祖、后人四代。额曰“崇贤”。中供神像。司马池面南，司马旦位东。西则司马光，东南隅为司马康，西南角为司马旦之孙司马朴。个个衮冕巍峨，道貌可钦。堂中有联云：“父子祖孙聚一堂，俨若生前对话；禴祠蒸尝举三献，依然膝下承欢。”

禅院 位于祠堂东侧，为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 年）创建的司马光祖茔香火院。敕赐“余庆禅院”额。现“敕牒”碑石仍屹立在寺后。禅院自成院落。正面五间大殿系宋代原物。内供彩塑金妆大佛三尊，其高都在 3 米有余。尤其是这些大佛颌上的胡须，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至于韦陀、胁侍菩萨等，也自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两侧，原为十六罗汉，今存十二尊，均为宋塑风格。艺术精湛，造型传神，施彩绚丽，满堂生辉。

不可忽略的是，除杏花碑外，在司马光茔祠内至今犹保存有自宋迄民国三十余座珍贵碑石，内容涉及人事、建筑、地亩、祭祀等，对研究司马光及其家世、茔祠的沿革兴废和书法艺术等，都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意义和重要价值。如当年王安石为司马光叔伯父司马沂撰文、书法家雷简夫书丹的《司马沂墓表》，不仅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当初关系“素厚”的历史见证，也是碑石书法之精品。至于苏轼撰文并书丹的《司马光神道碑》，更是集历史、书法、镌刻为一体的国家级名碑。在此，我们不能不为这些名碑以及神道上遗存至今的北宋时期重要石刻文物，能够在章惇等人先后摧毁，以及金人南下，司马氏子

孙为躲避灭门之灾、随宋室南渡，以致先人茔祠数代无人保护的情况下，还能完好地保存下来而感到万分庆幸，更为司马光于身后能为我们留下这样一份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感到受益匪浅。

司马光一生克勤克俭，勤奋务实，生荣死哀，想不到在他死后，居然引起历史纷争，搅得他不得安息。好在世事俱已往矣，他的事迹，他的伟业，已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尤其是处在当今盛世，随着党和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愈加重视，人们对先哲的品德、精神的敬仰，一代名臣，杰出史家司马光永远会安息于此，永享后人为他日夜守护的这片清静之地。

悠悠时光，煌煌青史，将会永远证实这位历史老人：道德辉煌映涑水，文章发越秀峨嵋。

诗文寓情　凭吊先贤

自题写真[①]

宋·司马光

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②]。

居然不肯市朝住[③]，骨相天生林野人[④]。

[说 明]

诗刻于石，题为《宋涑水司马文正公真像》，为明嘉靖八年（1529年）所刻，现存司马光茔祠。康熙、乾隆、光绪版《夏县志》“艺文”均有收录。

此诗可以说是司马光本人的自画像。仅四句二十八字，既活脱脱地勾勒出自身的平凡容貌，又表露出自己不凡的禀性和志向。

[注 释]

①写真：中国肖像画的传统名称。要求形神肖似，故名。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将军善画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

②漫：随意，不拘束。

③市朝：争名逐利的场所。市，交易买卖的地方。朝，官员治事的地方。

④骨相：旧时指人的骨骼相貌。

归乡纪事

宋·司马光

皇祐二年，谒告归乡里[1]，至治平二年[2]方得再来，怆然感之，诗以纪事[3]。

十六载重归[4]，顺涂歌式微[5]。
青松敝庐在[6]，白首故人稀[7]。
外饰服章改[8]，流光颜貌非[9]。
巫咸旧山色[10]，相见尚依依[11]。

[说 明]

诗载康熙、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原诗无题目，据作者诗前小序拟。这是司马光四十七岁时回乡之作。诗中虽无一字写其祖茔，但他此次回乡，确实是特地请假为祭扫先茔而来的，读者可与下首《辞坟》诗参照欣赏、领会。作者在这里抒发了他深深的怀乡之情及其他重返久别故乡后的所见所感，流露出一种风物依旧，而故人已稀、颜貌已非的惆怅与凄伤心绪。

[注 释]

①皇祐二年：即公元 1050 年。皇祐，宋仁宗赵祯年号。谒告：请假。《司马温公传家集》（以下简称《传家集》）也提及此年司马光曾“请假焚黄省展坟墓”事。

②治平二年：即公元 1065 年。治平：

宋英宗赵曙年号。《传家集》："臣近蒙恩给假至陕州焚黄"，即此次。

③怆然：伤悲、凄怆的样子。纪事：即记事。纪，通"记"。

④十六载：作者自公元1050年拜谒祖茔后，至公元1065年再来，时为十六年，故云。

⑤顺塗：沿途。塗，通"途"，道路。式微：《诗·邶风》篇名，后人用作思归之意。

⑥敝庐：谦称自己的居室。这里指旧居。

⑦白首：人老发白。故人：旧友。

⑧服章：指表示官吏身份、品秩的服饰。

⑨流光：光阴。

⑩巫咸：本为人名，即商相巫咸。相传他发明鼓，是用筮占卜的创始者，又是位占星家。死后葬于夏县城东瑶台山麓(旧时曾有其墓祠)，故又称瑶台山为巫咸山。

⑪依依：恋恋不舍的样子。

辞　坟

宋·司马光

嘉祐元年通判并州[1]，因公事至绛[2]

私归拜坟，不敢至夏县而去，于今十年矣[3]。

十年一展墓[4]，旬浃复东旋[5]。
岂负禋祼恩[6]，横遭章绶缠[7]。
更来知几日，遗恨恐终天[8]。
恸哭出松径[9]，悲风为飒然[10]。

[说 明]

诗载康熙、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这首诗与前首诗同为司马光于治平二年（1065 年）回乡所作。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充沛自然。字里行间无不吐露出他因国事缠身，历久难还，无以报至亲禋祼之恩，及其难得“忠孝两全”的矛盾心理和遗憾。尤其是后两句的描写，情景交融，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凄怆生动的画面，使所有为人子者的心灵，都不能不为之震撼！

[注 释]

①嘉祐元年：公元 1056 年。嘉祐，为宋仁宗赵祯年号。通判：官名。宋初始于诸州设置，即共同处理政务之意。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并州：即今太原。

②绛：春秋时晋国的国都之一。早期城址在今山西运城的闻喜、绛县一带。后又迁至新田（今新绛、侯马一带）。司马光曾作《故绛城》诗。

③于今十年：即从嘉祐元年算起，十年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

④展墓：指瞻拜、祭扫祖宗坟墓。展，察看，检查。

⑤此句意谓很快便东去京城。旬浃：表示时光短暂。旬，十天。浃，古代以干支纪日，称自甲至癸一周十日为浃日。

⑥襁褓：泛指背负小儿所用的东西。这里指儿时。襁，布幅，用以络负；褓，小儿的被，用以裹覆。

⑦章绶：封建时代官僚阶层身着的章服绶带。这里借指国事。

⑧此句大意是说，来日无多，如不再瞻拜先祖，只恐抱憾终身。终天：终身。

⑨恸哭：大哭；哀痛之至。松径：松柏小路。

⑩飒然：风之声。飒，音sà。

司马温国文正公铭

宋·苏　轼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①。

孰堪顾天，惟圣与仁②。

圣子受命，如尧之初③。

神母诏之，匪亟匪徐④。

圣神无心，孰左右之⑤。

民自择相，我兴授之⑥。

其相惟何，太师温公。

公来自西，一马二童。
万人环之，如渴赴泉[7]。
孰不见公，莫如我先。
二圣忘己，惟公是式[8]。
公亦无我，惟民是度[9]。
民曰乐哉，既相司马。
尔贾于途，我耕于野[10]。
士曰时哉[11]，既用君实。
我后子先，时不可失。
公如麟凤，不鸷不搏[12]。
羽毛毕朝，雄狡率服[13]。
为政一年，疾病半之[14]。
功则多矣，百年之思。
知公于异，识公于微[15]。
匪公之思，神考是怀[16]。
天子万年，四夷来同[17]。
荐于清庙[18]，神考是功。

[作者介绍]

苏轼（1037—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散文家苏洵之子。嘉祐进士。历仕神宗、英宗、哲宗，官至礼部尚书。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被人诬以“谤讪朝廷”之罪贬谪黄州。哲宗时又相继遭贬于惠州、儋州，最后北还，病死

常州，追谥“文忠”。

苏轼与父洵、弟辙均以文章名世，合称“三苏”。加上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五人誉为“唐宋八大家”。

苏轼一家与司马光素善，尤其是苏轼，先后与司马光交往达二十余年，故二人相知颇深。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轼母亲程氏亡故，承他与弟苏辙泣请，司马光为其撰写了《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卒，宋哲宗特诏命苏轼为司马光撰写了《司马温国文正公神道碑》，并写有洋洋万言的《司马温公行状》，用大量事实，描绘了当时朝野上下对司马光的崇敬仰慕，其中无疑也表露了苏轼对司马光的仰止之情。此外，苏轼还写有《祭司马温公文》等（详见“祭文”部分）。

[说 明]

这篇铭文，选自于苏轼所撰的《司马温国文正公神道碑》之“铭”。此碑原立于元祐三年（1088），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额。绍圣初，碑为章惇、蔡卞等仆毁。金皇统九年（1149）夏县令王庭直于一杏树下挖出断碑，加以整治摹刊为四石，俗称“杏花碑”。后此石不知何时而

佚，今存者为“元至正”十二年（1352）重刊。明嘉靖二年（1523），巡御史朱实昌又依苏文选石再立，复宋碑之规制，人称“忠清粹德之碑”。

铭文主要歌颂的是元祐元年司马光被高太皇太后及哲宗诏为宰相后之功德勋节。

［注 释］

①於皇：赞叹辞。於，音 wū。叹词。皇，美好，伟大。子惠我民：像对待亲生一样施惠于百姓。封建统治者常称老百姓为“子民”。

②孰堪顾天：谁值得上天顾念。圣：指哲宗。仁：指哲宗之祖母高太皇太后（1032—1093）。亳州蒙城（今属安徽）人。英宗皇后，因哲宗即位时尚年幼，垂帘临政九年，卒谥“宣仁圣烈”。

③圣子受命二句：是说宋哲宗赵煦像帝尧一样年幼而即位。圣子：指哲宗。其即位时年方九岁。

④神母：即指高太皇太后。匪：同“非”。亟：快，急。徐：慢，缓。

⑤无心：无成见或私心。左右：辅佐。《尚书大传·虞夏传·皋陶谟》：“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

⑥兴：喜悦，愉快。

⑦万人环之二句：苏轼神道碑文曾云，当司马光被召入京时，“民拥其马，至不得行。卫士见公，擎跽流涕者，不可胜数。”环，围。

⑧惟公是式：只以司马光为典范或榜样。式，规格，榜样。

⑨惟民是度：只为民着想或考虑。度，音 duó。揣测，考虑。

⑩尔贾于途二句：是说商者、农者各行其是，各得其乐。贾，音 gǔ。经商。

⑪时：正当其时，即作相正是时候。

⑫鸷：音 zhì。本为一种猛禽，这里指凶猛。搏：攫取。

⑬羽毛毕朝二句：即鸟兽全来臣服。喻指司马光施政有方，中外服帖。

⑭为政一年二句：据《宋史·司马光传》：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突然患病，说话迟钝。元祐元年，又得病。当年八月即病卒。

⑮知公于异二句：苏轼碑文有云：“二圣之知公也，知之于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世，知之于方异。”意谓：宋神宗时，当司马光持有不同政见，也能了解司马光，而哲宗、高太皇太后更能了解司马光。

⑯匪公之思二句：即不仅怀念司马光，也怀念宋神宗。神考，即指宋神宗，哲宗之父。

⑰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旧时统称“四夷”。是古代统治者对华夏族以外各少数民族的蔑称。这里指北宋王朝以外的其他各少数民族政权。

⑱荐于清庙：即配享于帝王宗庙。荐，献，进。清庙，帝王宗庙。古时帝王祭祀前代帝王，以功臣配享。

司马文正公铭

宋·范 镇

於穆安平[①]，有魏忠臣。
更六百年[②]，有其元孙[③]。
元孙温公，前人是似[④]。
率其诚心，以佐天子。
天子圣明，四海一心。
有从有违，咸卒用公[⑤]。
公之显用，自我神考。
命于西枢，曰予耆老。
公言如经，其或不然。
帝独贤公，欲使并存。
公退如避，归居洛师[⑥]。
帝徐思之，既克知之。
知而不以，以遗圣子[⑦]。
惟我圣子，协帝圣母。
人事尽矣，天命顺矣。
如川之迴，如冰之开[⑧]。

或蹈其机，岂人也哉？
公亦不知，曰是惟天[9]。
二圣临我，如山如渊。
公惟相之，亦何所为？
惟天是因，唯民是师。
事既粗定，公亦不留。
龙衮蝉冠，归于其邱[10]。
公之在朝，布衣脱粟[11]。
唯其为善，惟曰不足[12]。
生既不有，死亦何失！
四方颂之，岂惟兹石[13]。

[作者介绍]

范镇（1008—1089），宋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字景仁。举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官多与司马光相同，政见基本一致，议论如出一口。且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关系很好，出处交游四十余年如一日。他们曾约定："生而互为之传，后死者当作铭。"司马光于生前已给他写了《传》，不料，范镇尚未为司马光作《传》，而司马光却作古。因此，范镇为之甚感遗憾。叹惋之下，只好为其作《墓志铭》。

[说 明]

这篇铭文即选自范镇《司马文正公墓

志铭》的“铭”。该志全文收录在光绪版《夏县志》“艺文”。铭文简略地叙述了司马光的先世，而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司马光的生前经历及其政绩，以寄托对好友之哀思。

［注 释］

①於穆：赞叹词。意同前“於皇”。穆，美。安平：即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懿之弟），字叔达，封“安平王”，谥曰“献”。为司马光之远祖。

②更：更替。

③元孙：即玄孙。“元”同“玄”。宋人因避始祖玄郎讳，遇“玄”改作“元”。

④前人是似：即效仿先贤或继承先人的美德。

⑤有从有违二句：意谓当司马光在朝廷之日，经常怀忠以进直言，皇帝对于他的建言有的听了，有的则未依建议去办，但无论怎样，最后还是任用了司马光。

⑥命于西枢八句：《宋史·司马光传》：神宗欲拜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但又不听其建言，司马光认为这种“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的空头官职，于“救生民之患”无益，故以年老坚辞不就，力求外仕，退居洛阳。耆老：年老。六十曰耆。

⑦帝徐思之四句：是说神宗想了想，

还是理解了司马光。但又未用他，目的是将司马光这样的人才留给他的儿子。苏轼《司马光神道碑》中亦谈到齐神武皇帝高欢将慕容绍宗留给其子世宗，唐太宗李世民将李勣留给其子高宗的故事，来赞扬古代君王“宁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孙专享得贤之利”的长计远虑。

⑧惟我圣子六句：是说哲宗、高太皇太后尽人事、顺天意而起用司马光。

⑨“或蹈其机”四句：《宋史·司马光传》：载，司马光任相后，尽罢王安石之法，有人劝他说，熙、丰旧臣，多乖巧小人，应预防后患。司马光正色言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⑩事既粗定四句：是说当司马光居相，大事方定，他便亡故。龙衮：古代帝王朝服，上绣龙纹。蝉冠：指侍从贵近之官。意思是说司马光官高位显。邱：同“丘”，墓。

⑪布衣：布制衣服，谓衣着俭朴。脱粟：粗粮、糙米。意谓司马光衣食十分俭朴。

⑫唯其为善二句：是说在大臣之中只有司马光可称“为善”，但他仍认为自己做的还不够。

⑬兹石：黑色石头，指“墓志”。兹，黑色。

司马温公挽诗二首

宋·文彦博

（一）

莫逆论交司马文①，君心知我我知君。
同谋同道殊无间，一死一生今岁分。
八十衰翁如槁木②，一千余日是残曛③。
前途若有相逢处，尚有英灵解世纷④。

（二）

留滞周南十五年⑤，成书奏牍过三千⑥。
东山方起为霖雨⑦，大厦俄顷叹逝川⑧。
密有忠言如药石⑨，别加优礼赐貂蝉⑩。
两宫痛惜皆临奠⑪，只为夔皋志未宣⑫。

［作者介绍］

文彦博（1006－1097年），北宋名臣。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仁宗时进士，曾官翼城知县、绛州通判、河东节度使、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将入相五十年，谥“忠烈”。他虽然比司马光大十余岁，但生活在同一时代，且为至交。见解多同，相处甚和。司马光退居洛阳间，曾参与他组织的“耆英会”优游酬唱，各得其欢。善诗文，传世有《潞公集》。

［说 明］

此诗选自于康熙《夏县志》。乾隆、光绪版《夏县志》亦有录。写于司马光逝世之际，表达了作者对司马光逝世的悲悼之情。

第一首主要是说与司马光志同道合，彼此相知，如今生死两分，自己亦至耄耋（音 mào dié）之年，来日无多，期望九泉之下能与友人重聚，仍像生前一样去解决人世间的纷争，共商治国大计。

第二首是缅怀友人自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后，闲居洛阳潜心编纂《资治通鉴》和二次拜相主政的功绩，以及其逝世后的哀荣。文辞高雅，情真意切。

［注 释］

①司马文：即司马光。光死后赐谥号曰“文正”。

②槁木：枯干的树木。槁，音 gǎo，枯干。文彦博自喻。

③残曛：残阳。曛，音 xūn，落日的余光。

④解世纷：解决人世间的纷争。主要指商讨治国大计。

⑤周南：指洛阳。

⑥成书奏牍：指司马光完成的《资治通鉴》书稿和上达皇帝的奏章。牍，古代写字的木片。后世称公文为文牍。

⑦东山：东晋宰相谢安，辞官后再起

入朝，人谓“东山再起”。这里指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主国政。霖雨：本指连绵的大雨。后世以霖雨比喻济世之臣。

⑧大厦：喻扶颠持危之人。这里指司马光。逝川：逝去的流水。比喻过去了的时间或事物。

⑨密有忠言：司马光死后，留有奏牍，转达朝廷，只言朝政，不及私事。药石。治病的药物和砭石。这里指治国方略。

⑩貂蝉：汉代侍从官员帽上的装饰物。后用作达官显贵的代称。这里泛指荣显。

⑪两宫：即宋哲宗和高太皇太后。据史载，司马光逝世后，高太后念其为政刚直，为国竭诚，带着当时尚年幼的哲宗亲奔其丧，并追赠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⑫夔皋：为古时两位贤人。夔，音kuí，尧舜时乐官。皋，音gāo。舜时掌刑法，后被众选为继承人。因早死，未能继位。此处均喻指司马光。志未宣：志向未能实现。

司马温公像赞

宋·朱　熹

笃学力行①，清修苦饰②。

有德有言[3]，有功有烈[4]。
深衣大带[5]，张拱徐趋[6]。
遗像凛然[7]，可俗薄夫[8]！

［作者介绍］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宋高宗时进士。初任主簿、知州、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等。入朝先后担任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等。卒后追谥“文”，故又称“朱文公”。

朱熹是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者。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其一生主要时间都在从事著述和讲学。其理论得程颢、程颐之传，兼采周敦颐、张载等人学说，主张万理源于天理，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即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穷尽知识）。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楚辞集注》、《诗集传》以及后人分类整理的《朱子类语》，又有《朱文公文集》。

［说 明］

“像赞”载康熙、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在大手笔朱熹的笔下，仅用三十二个字，即将司马光的风采与神韵勾勒出来。从诗中可以看出，朱熹对司马光

其人的敬仰之意、景慕之情。

[注 释]

①笃学：勤学。力行：尽力而行。

②清修：指操行洁美。苦饰：艰苦朴素之意。

③德：品德。言：嘉言。

④功、烈：均指功业。

⑤深衣：古代诸侯、大夫、士在家闲居时所穿的衣服。大带：衣服上用丝织品的素或练制成的带子。

⑥张拱：双臂展开、抱拳敛手。徐趋：或慢步或急行。徐：缓慢。趋：跑，快走。

⑦凛然：态度严肃，令人敬畏的样子。

⑧俗：庸俗，凡庸。作动词解。薄夫：浅薄轻浮的人。联系上面所述，意思是说，司马光虽然衣着朴素，看上去不怎么样，但其清肃儒雅之姿及其不凡风骨，犹可使那些浅薄轻浮之人比之不如。

挽司马温公三首

宋·黄庭坚

（一）

元祐开皇极，功归用老成[①]。

惟深万物表，顿令四时行[②]。

日者倾三接，天乎奠两楹[③]。

堂堂宁复有，埋玉恸佳城[④]。

（二）

献纳无虚日[5]，居然迹已陈。

清班区玉石，宝历顺星辰[6]。

更化思鸣鶪[7]，遗书似获麟[8]。

易名无异论[9]，今代两三人。

（三）

毁誉盖棺了[10]，于今名君实。

哀荣有王命[11]，终始著民言[12]。

蝉冕三公府[13]，深衣独乐园[14]。

平生两无累，忧国爱元元[15]。

［作者介绍］

黄庭坚（1045－1105），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进士。以才能见重于文彦博。哲宗立诏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起居舍人。后因新党诬陷，屡遭贬斥。徽宗时，卒于宣州。

黄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工诗文，擅长行、草书。他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出苏轼门下，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以杜甫为宗，讲究修辞造句，强调“无一字无来处”，风格奇崛，为江西诗派开创者，诗名与苏轼相侔，故世称“苏黄”；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元丰八年（1085），黄庭坚曾奉命与司马光之子司马康、范祖禹、张舜民等人重行校定《资治通鉴》，元祐元年（1086）完工，送往杭州雕版。

[说 明]

诗载康熙、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

黄庭坚小司马光近三十岁，仅比其子司马康年长五岁，可以说是个晚辈。当司马光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时候，尤其是位居宰相之日，他还处于位卑官微之时。虽然司马光很欣赏他的才学，他也十分敬重司马光，但他不可能与司马光有多少接触的机会，故而，他对司马光的看法和赞贬，至少不会因私而有意去溢美。这三首诗完全是作者平日耳闻目睹事实，而后凝思于心、有感而发的。

[注 释]

①元祐开皇极二句：是说元祐之时的政治达到了盛世，而这应当归功于是任用了德高望重的人。元祐：即宋哲宗年号。这里指元祐元年，即1086年，此年司马光任相。皇极：帝王统治的准则。老成：年高有德。泛指有声望。

②惟深万物表二句：喻指司马光施政高深，天下秩序井然。深：高。

③日者倾三接二句：谓正当司马光为国倾心尽力的时候，却不幸遽然卒世。倾：竭尽。三接：谓接待国事，应对朝廷，政务繁忙。奠两楹：即奠楹，“死”的婉称。清·赵翼《故相公赠郡王傅文忠公》诗：“公竟染危疾，还朝遽奠楹。”

④堂堂宁复有二句：意谓哲人已逝，再也见不到司马光了。堂堂：巨大，高显貌，或形容容仪庄严大方。宁：竟，乃。复有：再有。埋玉：多用于悼念年纪尚不大有才华而去世的人。佳城：墓地。

⑤献纳无虚日：意谓司马光当政之日，每每都向皇帝进言献策，在其位谋其政，日不虚度。献纳：指建言以供采纳。

⑥清班区玉石二句：是说在清贵的官班里犹可区分谁是玉谁是石，国运的长短也是顺时而行。清班：清贵的官班。多指文学侍从一类大臣。区：分别。宝历：指国祚。即封建统治王朝的年代。星辰：众星的总称。也指岁月、光阴。

⑦更化：即指“元祐更化”。元丰八年神宗死，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司马光任门下侍郎，次年（元祐元年）为宰相，推翻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史称“元祐更化”。

鵙：音 jú。鸟名。又名伯劳、子规、杜鹃。唐·王维《送杨长史赴果州》诗：

“别后同明月，君应听子规。”

⑧获麟：绝笔之作。《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

⑨易名：为死者立谥号。谓易本名而改称其谥号。司马光谥“文正”，故旧时多称“文正公”。另据考，当时谥号为“文正”者，除司马光外，另外仅有范仲淹一人，故云“今代两三人”。“文正”一谥，司马光在皇祐四年（1052）上给宋仁宗的奏议《论夏令公（竦）谥状》中，曾谈到：“（文正）谥之至美，无以复加。虽以周公之才，不敢兼取。况如竦者，岂易克当?”

⑩盖棺了：即“盖棺定论”。

⑪王命：宋王朝诏命。

⑫著民言：见著民言，即传在民众口头。

⑬蝉冕：蝉饰的冠冕。喻荣耀。

三公：周代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或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称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又称三司）。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唐宋仍沿此称，惟

已无实际职务。明清时虽亦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但只用作大臣的最高荣衔。

⑭独乐园：为司马光闲居之所。有二处：一在洛阳，一在其故里，即澜涧庄。

⑮元元：民众、百姓。

丞相温公挽词三首

宋·陈师道

（一）

恭默思良弼[①]，诗书正百工[②]。
事多违谢傅，天遽夺杨公[③]。
一代风流尽，三师礼乐崇[④]。
若无天下议，恶美并成空[⑤]。

（二）

百姓归周老，三年待鲁儒[⑥]。
世方随日化，身已要人扶[⑦]。
玉几虽来晚，明堂讫后图[⑧]。
心知爱诸葛[⑨]，终不羡曹蜍[⑩]。

（三）

少学真成己[⑪]，中年记著书[⑫]。
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嘘[⑬]。
得志宁论晚，成功不愿余[⑭]。
一为天下恸，不敢爱吾庐[⑮]。

［作者介绍］

陈师道（1053—1102），北宋诗人。

字履常，一字无已，号后山居士。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学文于曾巩，绝意进取。章惇想让他去谒见，以便推荐，终不往。元祐初，以苏轼等相荐，为徐州教授，又任太学博士。后有人说他与苏轼过从甚密，罢为颍州教授。元符三年(1100)，召为秘书省正字，逾年而卒。其家境贫寒，而清介自守。爱苦吟，诗宗杜甫，受黄庭坚影响较大，为江西派代表性作家，常苏轼、黄庭坚等唱和。著有《后山集》、《后山谈丛》。

[说 明]

诗载康熙、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

本诗构思巧妙，用典多处，言简意赅，歌咏备至。作者采取倒叙的手法，于恭敬默然之中开始追思司马光的一生。第一首写司马光立朝正纲的功绩及其死后对他的看法与评价，其中毁誉皆有。第二首写人们对司马光的企盼及其为国尽瘁之忠。第三首是写他学有所成，呕心著述。末句再回应到他东山再起，以身赴国。首尾呼应，天衣无缝。

[注 释]

①恭默：恭敬而沉静不言。良弼：贤良的辅佐。

②正：整饬，纠正。百工：众官。工，官。

③事多违谢傅二句疑用典，未详。前句谓司马光立朝敢于直言，意见多与朝廷不同，后句谓老天突然夺去司马光之命。

④三师：指太师、太傅、太保。礼乐：礼与乐的合称。崇：修饰。《国语·周官》："容貌有崇，威仪有则。"本句意思是说，在司马光主持国政后，纲纪也因之修整。

⑤若无天下议二句：意思是说在司马光生前死后，天下人如果没有对他各自的看法和议论，自然对司马光好的坏的说法就都没有了。暗指正是因为众人所议，司马光的德业才更加得以彰显。此句非常有哲理。恶：音 wù。诋毁、诽谤。美：褒扬。

⑥百姓归周老二句，疑用典。不详。意谓天下百姓都向往归附一种太平盛世，翘首企盼有才能的贤者出世。归：向往，归附。

⑦世方随日化二句：意谓世道正当好日，司马光却已年高，体力不支了。化：改变，变化。这里指德化。

⑧玉几虽来晚二句：意谓哲宗虽然来之既晚，但仍和司马光共论今后的国计大事。玉几：可供扶倚的玉饰小案，为古代帝王之用具。后亦用以指帝王。明堂：古

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进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讫：完毕，终了。后图：后来的打算、计划。

⑨心知爱诸葛：《宋史·司马光传》说，自司马光为相后，见哲宗及高太皇太后“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许多人见他身体日渐羸弱，便举诸葛亮“食少事烦”故事去劝他保重，司马光不听，说“死生，命也”。做事益力。诸葛亮曾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语。

⑩曹蜍：晋人曹茂之，字永世，小字为蜍。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与时人李志齐名，皆善画，但为人无可称，不为世人所重。

⑪少学真成已：言司马光少年学问已成。《宋史·司马光传》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⑫中年记著书：言司马光中年时开始著述立言，修撰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⑬辍耕扶日月二句：是说司马光夜以继日，披肝沥胆撰写《通鉴》。起废：重新振兴起旷废的事物。吹嘘：本为替人宣扬、说好话，这里借指著述立言。

⑭得志宁论晚二句：即得志岂在晚，

成功不在多。颇富哲理。宁：岂。

⑮一为天下恸二句：意谓一旦为百姓泣请归政，则再也不敢留恋家舍。

寒食上冢至澜洄庄追思祖烈感而为诗[1]

宋·司马康

祖学当年向此勤[2]，子孙今日继清芬[3]。
贤能自过高阳里[4]，尊宠无惭万石君[5]。
花满一川红蕊乱，渠环千顷翠波分[6]。
高门驷马流余庆[7]，当见吾家世有闻[8]。

[作者介绍]

司马康（1050—1090），司马光之子，字公休。博学好读，熙宁进士。先授富平县（在今陕西省）主簿。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时，奏其留国子监听读。后又监西京粮科院，随父居洛阳，并为《资治通鉴》作文字检阅。元丰八年（1085）擢秘书省正字，次年除校书郎，后又为著作佐郎兼侍讲，任《神宗实录》检讨官。迁左司谏。

司马康幼端谨，性至孝。因居父丧，守墓庐浸湿受潮，患腹疾而卒。

[说 明]

诗载康熙、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这是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于某年寒食节上坟，路经其父故居澜洄庄时触景生

情而作。诗中所述，既有对祖辈当年在此苦读用功情景的深深缅怀，又有对其先人为门第、子孙留下的荣耀和恩泽的无限感念，充满了出身于司马家门的光荣和自豪感。

据光绪《夏县志·艺文》载，此诗曾刻石竖于独乐园，即当时的澜洄庄内。

[注 释]

①寒食上冢：即寒食节为祖宗上坟。寒食，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为民间传统祭祖之日，至今风俗犹存。冢，坟，这里指司马光及其先祖之坟。澜洄庄：为司马氏故居地。有说即后人所称的独乐园（其园有二：一在洛阳，一在夏县，此说指在夏县者），故址在夏县城西 30 里的坡底村。司马光居官后，这里是其兄司马旦之居所。光一回家，即来此省亲。

②向此勤：即在此用功苦读。

③清芬：比喻高洁的德行。

④高阳里：又名高阳乡，故地在今河南杞县西南，为秦末贤士郦食其的故乡。东汉末年，汉献帝封著名文学家蔡邕为“高阳侯”。作者不仅以其故乡与之相比，而且明说还超过了它。

⑤无惭：无愧。万石君：受封为食万石粮的大官。这里指官位荣显。

⑥红蕊：红颜色花蕊。翠波：青绿的水波。

⑦高门驷马：高门，即高大之门，喻富贵之家。驷马，古代一车套四马，故称。为古代显贵人物乘用。此句是说门楼高大，可容驷马高车进出。与古语“高门容驷”等意同。均指门第显赫或人物显达。余庆：指先代的遗泽。

⑧世有闻：世代有名声。

怀司马温公

元·归　旸

瑶台何巍巍[1]，涑水亦弭弭[2]。

我君独何之[3]，空堂遗剑履[4]。

念昔熙宁初[5]，事事稽周礼[6]。

新法纷如毛，旧基寝以圮[7]。

公时居洛师[8]，容与花竹里。

朝被高阜云，夕钓伊川水[9]。

宣仁始临朝[10]，翻然为时起。

惓惓抚疮痍[11]，汲汲除莠秕[12]。

坐令憔悴民[13]，复见雍熙理[14]。

胡为厌氛浊[15]，溘然骑箕尾[16]。

忠清与粹德[17]，令闻传不已[18]。

嗟予生已晚，高山夙仰止[19]。

稽首遗像前，酌泉荐芳芷[20]。

[作者介绍]

归旸，生卒年月不详。字彦温，号西雪，元代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学无师传，精敏过人，登至顺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礼部尚书。后由于言事与朝廷不合，托病而归，侨居弘州，徙蔚州等地。因平生钦慕先贤司马光，于元末动乱之际，不避艰险，特远来夏县，卜居于温公墓侧。年老患病后，家人请他回家，坚持不去，直至谢世，死后亦埋葬于此，墓距司马光茔祠半里许。

[说 明]

诗载康熙、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

作为一名元代仕宦，其不避艰险，弃官归隐，卜居于温公墓侧，死后亦与先贤相守，可见他对司马光的崇敬之程度。因此，在他的这首诗作中，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温公的仰止之情。全诗包括四个层次内容：首四句为诗的起兴；再八句写王安石变法期间，司马光因与其政见不合而退出政局、闲居洛阳的情形；再八句是说司马光东山再起后努力勤政、除弊兴利，以至溘然逝去。末六句是写作者对先贤司马光的敬仰及怀念之情。

[注 释]

①瑶台：即瑶台山，又称巫咸山，在夏县城东五里。何：多么。巍巍：高大貌。

②涑水：发源于绛县，流经夏县西部。渳渳：水满貌。

③我君：指司马光。何之：到什么地方去了。

④剑履：旧时，封建帝王赐给亲信大臣的一种特殊待遇，受赐者可佩剑穿履朝见皇帝。即所谓“剑履上殿”。这里意思是说司马光早已作古，唯有人去楼空，睹物思人之憾。

⑤熙宁：宋神宗年号。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推行新法。

⑥稽：参照对比。周礼，儒家经典之一，此处泛指祖宗之法。

⑦旧基：指代代相传的法统秩序。圮：坍塌，崩毁。

⑧洛师：洛阳。

⑨伊川：即伊河，洛河支流，流经洛阳南部。

⑩宣仁：即宣仁圣烈高皇后（英宗之后）。其子神宗死后，宣仁太后立幼孙哲宗，自己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废除新法。

⑪惓惓：恳切诚挚。疮痍：创伤。此处指新法推行中造成的民生凋敝。

⑫汲汲：急切紧迫的样子。莠秕：糟粕之类。这里指不好的东西。

⑬坐令：致使。

⑭雍熙：宋太宗年号，即公元 984—988 年，为宋王朝盛世。

⑮氛浊：喧嚣、浑浊的尘世。

⑯骑箕尾：古称大臣之死。溘然：忽然。溘，音 kè。

⑰忠清粹德，系宋哲宗为司马光神道碑（苏轼撰文）题额之语，盛赞司马光一生品操。

⑱令闻：好的声名。

⑲高山夙仰止，即“高山仰止”意。表示对道德高尚之人十分倾慕。高山：喻道德崇高。仰：敬慕。

⑳荐：献。芷，音 zhǐ，一种香草。

题司马温公墓

元·归 旸

宋家元祐几百年[1]，白日已堕吴山前[2]。

当时中国相司马[3]，至今犹有儿童传。

苍生苦被青苗误[4]，杜鹃飞向江南去。

蜩啾百鸟噤无声[5]，阿阁新栽凤凰树[6]。

山河不动风雨时，神孙大母俱无为[7]。

熙宁一变如庆历[8]，满眼元气春淋漓。

粉旗低昂归涑水[9]，老鸮却化千年鬼[10]。

东京王气冷如冰[11]，五国降人作天子[12]。

［作者介绍］

见前首诗《怀司马温公》。

［说 明］

诗载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

这首诗所述并非司马光的一生，截取的是司马光为相后至卒世这段时间。是说司马光元祐年间入京后勇立潮头，罢青苗等法，政局气象随之焕发，以及他逝世的情形。诗中带有作者明显的倾向性。

［注 释］

①几百年：宋王朝自太祖赵匡胤创立至元祐，时间一百余年。

②“白日”一句：意谓宋王朝日渐衰落。白日：太阳。堕，落。吴山：又名虞坂、盐坂。自上及下七山相重，为中条山重要通道之一。在夏县城南十五里，北通平陆县，春秋时晋国假虞灭虢即此。

③中国相司马：司马光政绩卓著，德服外夷。《宋史·司马光传》有载，说辽、夏遣使臣入宋，必问司马光生活起居，并敕其守边官吏：“中国相司马矣”，不要轻举妄动，以便引起两国不合。

④青苗：即青苗法，王安石所实行的新法之一。其法规定：于夏秋未熟前，凡民户自愿请贷者，即将所贷粮食折成现钱贷付，随税纳还时，须每种加纳三分或二

分息钱。

⑤蜩啾：泛指嘈杂之声。蜩，音 tiáo，蝉。啾：音 jiù，象声词。

⑥阿阁：四面有栋、有檐 的楼阁。

⑦神孙大母：指宋哲宗和宣仁高太后。

⑧熙宁一变：指宋神宗熙宁二年的王安石变法。庆历：宋仁宗年号。即公元 1041—1048 年。仁宗用范仲淹、富弼等人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⑨旐：音 zhào，古代旗帜的一种，上画龟蛇。这里指旧时出丧时为棺柩引路的旗，俗称魂幡。涑水：指司马光故里。

⑩鸮：音 xiāo。即猫头鹰。

⑪东京：即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王气：旧指象征帝王运数的祥瑞之气。

⑫本句意思不详。

谒司马温公墓

元·范　庸

予到官之五日，拜司马温国文正公墓，顾瞻良久而有是诗。实至元改元闰十二月既望[①]也。

苍苍中条山[②]，悠悠涑河水[③]。

哲人生其间[④]，而有司马氏。

山水秀且明，桑梓故乡里。
宋朝入相时，天下闻之喜。
通鉴一编书[5]，名分尽乎礼[6]。
天地来是非，以礼为纲纪。
大哉君臣道，逆顺合条理[7]。
遂令千载下，惊惧良有以[8]。
禹都鸣条冈[9]，邱垅峙高垒。
大儒世臣家，何处孙与子[10]。
我时来拜瞻，翁仲没荆杞[11]。
考古询寺碑，怀贤心未已。
党人仆其碑[12]，今日果谁耻[13]？
杏花荫龟趺[14]，异时入青史。
细读东坡铭，文章剩褒美。
回首北风来，商声振林起[15]。

[作者介绍]

范庸，生卒、籍贯、职官均未详。据诗序，可能在夏县做过官。但经查各种《县志》，均无片言只语。

[说 明]

诗刻于石，现存司马光茔祠。乾隆《夏县志》收录。

这首诗是作者拜谒司马光墓而后作。写的较为通俗易懂。分四层意思：第一层主要写司马光这位“哲人”的籍贯故里。第二层是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

为封建帝王立下了一套治世的纲纪。第三层写司马光的墓地情形及其对后祀无人、荆杞满目的感慨。第四层主要写司马光的功德之碑虽曾被毁，但其文永生不灭，青史永垂。尤其是最后两句，诗人在叙事抒怀之后，巧借景象，以景寄情，以情即景，以意境托心境，令人回味无穷。

［注 释］

①至元改元：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年号，时间为公元 1264 - 1294 年。至元改元即公元 1264 年。望：旧时称农历十五为望，望后一日为既望。

②中条山：在山西省西南部运城一带黄河和涑水河间。东北西南走向，长约 160 公里，宽 10—15 公里。司马光故里即在中条山下。

③涑河：即涑水河，在山西省西南部运城一带。源出绛县太阴山，西南流入永济伍姓湖，以下有人工渠道通黄河，长约 170 公里。流量很小，为季节性河流。此河流经夏县，故司马光曾称为“涑水先生”，并著有《涑水纪闻》。

④哲人：才能识见超越寻常的人。

⑤《通鉴》：即《资治通鉴》。编：古时用以穿连竹简的皮条或绳子。后因称一部书或书的一部分。

⑥名分尽乎礼：即君臣之道都合乎礼法。名分：名位及其应守的职分。

⑦天地来是非四句：意谓天地间所有的是是非非，都以“礼”来作校正的标准。只有这样，君臣之道，才能合乎条理。纲纪：治理，管理。

⑧良有以：确实有因由和根据。即指司马光的君臣名分和条理。

⑨禹都：即传说中的禹之都城，在今夏县，距司马光墓不远。鸣条冈：古地名。又名高堠原。相传商汤伐桀，战于鸣条之野，即此。司马光墓即在此冈上。故下句谓“丘坟峙高垒”。

⑩何处孙与子：是说像司马光这样一个大儒名臣，子孙却不知在何处。据光绪《夏县志》记载，司马光的后代至其曾孙，于宋高宗南渡时举家自汴京迁到浙江山阴后，从此再也没人回过故里，约有十世。至明代时才始有司马后代回到夏县。证明元代时其故里确实无司马后人。

⑪翁仲：指墓前的石人。没荆杞：由于没有后人经常前来扫墓，故墓地石人均淹没于丛生的荆杞之中。

⑫党人仆其碑：史载，司马光死后，章惇、蔡卞等人再三向哲宗进谗，说司马光“诬谤先帝（神宗）”，遂将其与苏轼等百余人列入“元祐党人”，砸毁苏轼撰文并

书丹的司马光神道碑。

⑬今日果谁耻：是说今日到底是谁落了个耻辱下场呢？

⑭杏花荫龟趺：司马光碑被砸掩埋后，不意竟从龟趺之侧生长出一株杏树。金皇统八年，夏县县令王庭直来谒坟，听司马光香火寺余庆禅院寺僧圆珍言及往事，不禁心惊其奇，遂命人挖出断碑，重加整理摹刊为四石，建碑堂树之。

⑮回首北风来二句：是说回首之间，北风吹起，松林呼呼，让人听来就像一种呜咽凄怆的声音。商声：凄怆的声音。

题司马温公画像

元·郝　经

后来三代汉唐宋，太师温公绝世无①。
汲黯魏征与宋璟②，马迁刘向及仲舒③。
问学德度兼名节④，纯粹骨鲠一大儒⑤。
麒麟凤凰代希有，布帛菽粟民所须⑥。
无心求世笃修心，正襟危坐三省吾⑦。
以道事君入官联⑧，循分守信不敢逾。
进言格非理必尽⑨，浑厚质直辞无渝⑩。
制礼作乐如成康⑪，渐仁摩义期唐虞⑫。
不幸熙丰方有为⑬，祖宗良法尽铲除⑭。
磊磊显谏章十上，不用不可一日居。

勇退不补枢密班，□□洛下甘著书。
论列治乱尤爱君，心存魏阙身江湖。
深钩致远推象数，更拟大元作潜虚。
穷神知化德亦盛，不忍赤子共焦楛[15]。
一童一马哭裕陵，万民遮拥牵衣裾。
有田不敢种青苗，司马相公来活予[16]。
两宫下诏登一相，旱灾泼雨天下苏。
东丹惊喜西夏服，中朝突兀尊皇舆[17]。
谁知孔明食遽少，以死勤事皆骇吁[18]？
革弊治蛊虽未竟，已定鼎命开规模[19]。
建炎国脉实在此[20]，绍圣奸党独厚诬[21]。
高风奕奕今共仰，遗像尚可惩奸谀[22]。
槁木宁有食肉相，隐隐但是金粟肤[23]。
布衾自可覆苍生[24]，貂蝉不称山泽癯[25]。
泫然想见公薨时[26]，鬻衣致奠哭过车[27]。
不独此本在人间，一日四海皆画图[28]。
更不负公有子瞻，两碑万字堆琼琚[29]。
刻石署公为首恶[30]，小人私计空区区[31]。

［作者介绍］

郝经（1223—1275年），元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字伯常。幼时遭金末兵乱，金亡后迁河北，居于元将张柔家，得读其藏书。宪宗时入忽必烈（即元世祖）王府，甚受信任。从攻鄂州（今湖北武昌），闻宪宗死讯，力劝忽必烈北还争位，

遂与贾似道约和退兵。中统元年（1260年）以翰林学士出使南宋议和，为贾似道扣留于镇州（今江苏仪征）长达十六年。羁留中，据说有人送给他40只大雁，内有一只体质稍异，郝经命人饲养，以后郝经给元朝皇帝写了个奏折，拴在雁足上，飞往北方。被人捉住后，将奏折交给皇帝，元朝遂进师南伐。因此，至元十二年（1275年）郝经方才得释，北还后病死。著有《续后汉书》、《陵川集》等。

［说 明］

诗载乾隆《夏县志》“艺文”。

作者以凝练的语言，赞颂了司马光的学问、德度和名节，以及他为国“以死勤事”的忠心。认为司马光的政治作为及其学问堪与汲黯、魏征、宋璟、司马迁、刘向、董仲舒等人相媲美，特别是司马光的治学精神，尤其是他在生活上坚守清俭的一贯作风和良好品德，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注 释］

①太师：辅弼国君或太子的高官。后世多用作对宰辅一类高官的尊称。宋哲宗赠司马光为“太师”。

②这句是说，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与才能可与汲黯、魏征、宋璟相比。

汲黯（前？—112年），汉濮阳（今属河南）人，字长孺。汉武帝时为东海郡太守，后召为九卿，敢于面折廷诤。汉武帝外表虽然显得十分敬重他，内心却很不高兴。后出为淮阳太守，七年而卒。

魏征（580—643年），唐初政治家。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少时孤贫落拓，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李密败，降唐。又被窦建德所获，任起居舍人。建德失败，入唐为太子洗马。唐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前后陈谏二百余事。贞元三年（629年）任秘书监，参与朝政，校定秘府图籍。后来一度任侍中，封“郑国公”。曾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多次劝太宗以隋亡为鉴，认为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等。著作有《隋书》序论及《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

宋璟（663—737年），唐政治家。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调露进士。累官至御史台中丞，为武则天所重。睿宗时升任宰相，能革除前弊，选拔人才。后因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被贬职。开元四年（716年）冬，继姚崇居相位。主张宽赋役，省刑罚，禁销恶钱；选择人才，使百官称

职。开元八年罢相。

③这句是说，司马光的学问立言也可与司马迁、刘向和董仲舒比肩。

马迁：即司马迁（约前 145 或前 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早年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 108 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馆所藏图书，并对历法进行改革。后因替李陵辩解，得罪下狱，遭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奋著述，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

刘向（约前 77 - 前 6 年），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治《春秋穀梁传》。曾任谏大夫、宗正等。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成帝时，任光禄大夫等，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有《洪范五行传》、《说苑》、《烈女传》等存世。

仲舒，即董仲舒（前 179 - 前 104 年），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良贤文学之士，他曾提出“天人三策”建议，

为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其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其中心是所谓“天人感应”说，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和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的论点。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阶级矛盾现象有所揭露。教育上，主张以教化为“隄防”，立太学，设痒序。著有《春秋繁露》及《董子文集》。

④问学：求学。问，不知而问于别人。亦可作“学问”解。德度：道德标准。

⑤骨鲠：喻正直。又作“骨梗”。

⑥布帛菽粟：为日常生活所必需，故用以比喻虽属平常但不可缺少的东西。

⑦无心求世笃修心二句：意谓无心去求闻达于世，只是常常反省自己的言行有无过错。求世：以求闻达于世。笃：笃厚，真诚、纯一。正襟危坐：理好衣服端正地坐着，表示严肃或尊敬。三省：从三个方面反省。省，音 xǐng。《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后泛指每天反省自己的言行，看是否有过错。

⑧官联：官吏联合治事。《周礼·天官·

大宰》注："官联，谓国有大事，一官不能独共，则六官共举之。……联，谓连事通职，相佐助也"。

⑨格非：纠正错误。《孟子·离娄上》："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⑩渝：变更，违背。

⑪成康：周武王（姬发）少弟，名封，初封于康，故称康叔。周公既诛武庚，分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为卫国的始祖。成王亲政，举之为周司寇。尚书有《康诰》篇，相传为命封康叔的教令。

⑫渐仁摩义：又作"渐仁摩谊"，指以仁义感化教育众民。"渐"谓浸润之，"摩"谓砥砺之。

唐虞：即唐尧虞舜。古史言陶唐氏尧和有虞氏舜，都以揖让而有天下，故以唐虞时为太平盛世。

⑬熙丰：即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元丰（1078—1085年）年间。

⑭祖宗良法尽铲除，即指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

⑮"磊磊显谏章十上"十句：是说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后，司马光建言不为用，遂退居洛阳去写《资治通鉴》。虽然他辞官在家，心却犹系国家治乱，不忍百姓为其所苦。枢密班：即国家政权的机要部门。宋神宗曾一再拜司马光为枢密使，

他坚辞不就。魏阙：古代宫门外的阙门。为古代悬布法令的地方。后来也作为朝廷的代称。深钩致远：意同深谋远虑。象数：《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注："言龟以表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占所以知吉凶。"大元：大龟。潜虚：一语双关。一喻司马光犹如大元潜匿于深水。一指司马光所撰《潜虚》（一卷）。他仿汉扬雄《太玄》之体，以五行为本，五五二十五，又倍之为五十章。卷首附有气、体、性、名、行、变、解七图。惜书未成而卒。今本为后人增补。赤子：即子民百姓。焦楛：因火烧而干枯。

⑯一童一马哭裕陵四句：是说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前去京城致奠，沿途上受到百姓拥戴。裕陵：宋人称宋神宗为裕陵。《宋史·司马光传》："帝崩，赴阙临。……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⑰两宫下诏登一相四句：言宣仁太后和哲宗拜司马光为相后的新气象，如久旱得雨，中外佩服。两宫：即高太皇太后和皇帝。有时太上皇和皇帝、皇帝和皇后、两帝和两后并举时，也叫"两宫"。东丹：指辽。西夏：即西夏政权。《宋史·司马光

传》载，司马光为相后，辽、夏君主不仅称臣于宋朝，还派人入宋，并致问候。中朝：即朝中。突兀：高出貌。皇舆：国君所称之车。又借喻国君，朝廷。《宋史·司马光传》有载，拜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后，因其有病，高太皇太后及哲宗特免他朝觐，并赐许他乘轿子，三天一入省。司马光受宠若惊，不敢当。于是又诏命其子司马康扶着司马光进殿入对，并允许他可以不拜。

⑱谁知孔明食遽少二句：是说司马光像诸葛亮一样躬亲国事，不遗余力，让所有的臣僚们都感佩。遽：音 jù，疾，速。骇吁：惊叹。

⑲革弊治蛊虽未竟二句：是说虽然他革弊治蛊的事还未完成，但已安定好了帝位，开创了新的气象。革弊：革除时弊。治蛊：治理毒害。蛊，音 gǔ，一种毒虫。这里指毒害。鼎命：帝位。规模：规制、格局或气象。

⑳建炎：南宋高宗赵构年号。公元1127—1130年。

㉑绍圣奸党独厚诬：是说绍圣间章惇等诬陷司马光诽谤神宗事。奸党：邪恶不正，为非作歹的帮派。

㉒谀：谄媚，用不实之词奉承人。

㉓槁木宁有食肉相二句：是说司马光

的外貌形象及内在品质。如司马光《自题写真》所云，外表是“黄面瘦身”，其气质却是“骨相天生”，脱俗不凡。槁木：枯木。《庄子·田子方》：“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五代时和尚贯休《山居诗》亦有云：“但令心似莲花洁，何必身将枯木齐。”食肉相：即富贵之相。但是：只是。金粟：佛名。即维摩诘大士。佛家谓他的前身是金粟如来。借喻司马光气质不凡。

㉔布衾自可覆苍生：意谓为百姓挡风避寒。布衾：布制的被子。司马光有一床被子，上面用隶书写有百十个字，内容为节俭自守，并以“君子以俭为德，小人以奢丧躯”为警示。协助司马光一同编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曾为之作有《布衾铭》。苍生：老百姓。

㉕貂蝉不称山泽臞：意谓为官者如不称职，那么山林川泽也不会丰腴。貂蝉：古代王公显官冠上的饰物，始于汉代武官。后常以“貂蝉”比喻达官显贵。不称：不胜任。山泽：山林与川泽。《国语·齐》：“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臞：音 qú，消瘦。

㉖泫然：流泪的样子。薨：音 hōng。《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后世称大臣之死曰“薨”。

㉗鬻衣致奠哭过车：《宋史·司马光传》载，司马光卒后，“京师人罢市而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过车：指经过的灵车。

㉘不独此本在人间二句：是说不仅如此，人们为了纪念他，到处都还画像以祀，饮食必祝。据说，有人曾因专画其像，售而致富。

㉙子瞻：即苏轼。两碑：指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额，和苏轼所撰司马光神道碑。琼琚：华美的佩玉。琼，玉之美者。琚，佩玉名。比喻为华美的诗文。唐韩愈《祭柳子厚文》：“佩玉琼琚，大放厥词。”

㉚刻石署公为首恶二句：指“元祐党人碑”，亦称“元祐党籍碑”。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马光死，绍圣元年（1094 年）章惇为相，首斥司马光为奸党。徽宗崇宁元年（1102 年）蔡京为相，则又把元祐间反对新法诸臣自司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其罪状，立碑于端礼门。崇宁三年又增至三百零九人，包括苏轼等，再次立碑于朝堂，并令全国皆刻，以示耻辱。据《宋史·司马光传》，长安有一石工名叫安民者，不忍去刻，府官大怒，欲加其罪，安民哭着说道：“小人被召来刻石我不敢辞，但求于石末免镌‘安民’二字，怕的是为后世所耻。”所

有在场者闻言都感到自愧。后来，“党人碑”终被下令仆毁。所列“党人”的后代子孙，反以先祖名列此碑而感到光荣，并重加摹刊。

㉛小人私计空区区：即章惇、蔡京之辈的阴谋最终成空。区区：小，少。

谒司马温公祠

元·王思诚

丞相祠邻孔庙垣[1]，高坟老树涑河干。
诸儒传授渊源远，二圣遭逢礼数宽[2]。
到处苍生思久相，每闻强虏问平安[3]。
想当归葬乡闾日，苍哭途哀涕泪澜[4]。

[作者介绍]

王思诚，元滋阳（今山东兖州）人。字致道。天资过人，至治进士。至正间迁国子司业，拜监察御史。多次上书，议论时政，为朝廷赏识。鞠狱公正，多平反。出签河南山西道肃政廉访司事。官至通议大夫，国子祭酒。卒谥“献肃”。

[说 明]

诗载乾隆《夏县志》“艺文”。

这首诗是王思诚出签河东肃政廉访司事时，拜谒司马光祠而作。写得比较平淡。主要是叙事为主，缺乏情感。

[注 释]

①丞相祠邻孔庙垣：交代司马光祠的坐落位置。丞相祠：即司马光祠堂。孔庙：即文庙。据《夏县志》载，司马光祠堂在夏县者有两处，一在县城，与文庙邻；一在司马光墓。以此句看，当指县城祠堂。

②礼数：礼仪的等级。

③到处苍生思久相二句：言天下百姓引领企盼司马光任相，辽、夏之人往来问候其起居平安之事。

④想当归葬乡闾日二句：意谓拜谒祠堂时，不由想起当年司马光灵柩运回故里归葬的时候，沿途上众人涕哭志哀的情形。

乡闾：即乡里。澜：大波浪。这里形容泪雨滂沱的样子。

司马温公像赞

明·方孝孺

儒者之泽，大行于民[①]。
伊周以来[②]，惟公一人。
时未可为，万钟不受[③]。
时逢多艰，为世父母[④]。
凡民之心，惟久乃安[⑤]。
欲其即从，圣人犹难。
亦独何修，政化甚速[⑥]。
诚于为善，四海悦服。
用术相欺，惟恐不深[⑦]。
公神在天，汝果何心[⑧]。

［作者介绍］

方孝孺（1357—1402 年），明初著名儒臣。浙江宁海人。字希直，又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初从学宋濂，后明太祖召见，除汉中教授。惠帝时官至侍讲学士，任《太祖实录》总裁。燕王（即明成祖）兵入京师（今江苏南京）后，因不肯为成祖朱棣起草登极诏书，被杀，以致诛灭十族（九族及方孝孺的学生），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善文章，著有《逊志斋集》。

［说 明］

诗载康熙、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

方孝孺是位著名的儒者，所以在他看来，司马光以儒家之道治国泽民，既有功效，也为最好。赞扬了司马光“万钟不受”的高风亮节和“为世父母”的爱民情怀，揭示了司马光“诚于为善”的施政方略，表明了作者对司马光为人行事的肯定态度。

［注 释］

①儒者之泽二句：意谓儒家学说的恩泽，广被于百姓。《周礼·天官·宰》：“儒以道得民。”

②伊周：即伊尹、周公，两人均为商

朝主持国政的大臣，常为世人并称。

伊尹，为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一说名挚。传为奴隶出身，原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汤用为“小臣”，后来任以国政，帮助汤攻灭夏桀。汤去世后，历仕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由太甲即位，因太甲破坏商汤法制，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伊最后死于沃丁之时。

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周武王之弟。名旦，人称“周公旦”，又称叔旦。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他出师东征，平定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并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

③时未可为二句：据《宋史·司马光传》：宋仁宗曾给司马光遗赐价值百余万，他率同僚三次上章不受。说：现在国家窘乏，不应当受此重物。结果皇上不答应。于是他将所得珠宝上交谏院作为公用之财。

万钟：指丰实的粮食。钟，古量器名。这里指优厚的俸禄。

④时逢多艰二句：谓值国家艰难之时，则胸怀百姓，替百姓说话办事。父母：即父母官。

⑤凡民之心二句：意即百姓的心愿，只是希望国家的长治久安。

⑥欲其即从四句：意谓想要让百姓和自己接近，并跟着自己走，这是圣人也难办到的事。不知司马光究竟有什么办法，竟能使政事与教化进行的那样之快。从，顺。修：即修能，卓越的才能。政化：政事与教化。

⑦诚于为善四句：即回答了上面四句所提出的问题。这就是：只要真诚专一，大行善事，那么天下之人就会悦服；如果用术相欺，那就恐怕为时不久。不深：为时不久。深：历时久。

⑧公神在天二句：意谓司马光的神灵在天，看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司马断碑[1]

明·王　翰

事业堂堂三代前[2]，可怜碑石几多传。
眉山手墨已无半[3]，哲庙宸书仅得全[4]。
荒冢雨余生直棘[5]，杏园春晚少啼鹃。
江南君到逢司马，为问渠孙若个贤[6]。

[作者介绍]

王翰，明代人，字时举。祖籍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因其父王仲文任夏县县令时，居官清廉，以致其母卒也无钱返

回老家，留他守丧，遂定居夏县。王翰少孤，靠卖薪自给。适值元末之际，他的老乡归旸，因仰慕司马光而寓居于夏县，许多名士都从学于其门下，他则时时去偷听归旸讲授，并经人引见拜师。学成后，结庐于中条山。一有所得，便拾取落叶记下。一旦风起，落叶则飘荡涧谷之中。且时常击节高歌，声振玉石。

明洪武初，以学问修行辟为县学训导，升平陆等地教谕。所到之处，均有声名。明永乐年间，以才名登教授。后又荐为翰林编修。其性方正，不随俗，俯仰之间，均以圣贤为师法。喜爱收藏书籍，所藏经、史、子、集约数千卷。

[说 明]

诗载康熙、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

王翰作为司马光的崇拜者归旸的门生，自然对司马光也是敬慕有加。但他不像他的业师归旸，涉及司马光在位时的政治是非与看法倾向问题，而是选取“断碑”这个主题，叙事抒情，谈感受，发议论。其中既有对司马光堂堂事业的赞扬，又有对司马光神道碑不幸遭遇的怜惜；既有对司马光墓地荒寂的惋叹，又有对司马光后人终于还夏的欣喜。语言于朴实中见

高雅，写得尽情也尽理。

［注 释］

①断碑：指“杏花碑”，即金代王庭直摹刊重立的《司马温公神道碑》。

②堂堂：强大貌。三代：自祖至孙。也有以曾祖、祖、父为三代的。这里指后者。

③眉山：地名，在四川省。这里代指苏轼，因其祖籍眉山。此句指苏轼撰文并书丹的司马光神道碑。

④哲庙：即宋哲宗。庙：庙号。宸书：帝王之书。宸，音 chén。帝王代称。这里指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额。

⑤荒冢雨余生直棘二句：描述司马光墓地荒凉之状。

⑥江南君到逢司马二句：参见范庸《谒司马温公墓》注⑩。江南：即指浙江山阴。司马：据考，明时回夏县的山阴司马光子孙有司马恂和司马相等。渠：他。若个：谁，那个。

清明登温公墓

明·钟　昶

刮地阴风起白杨[①]，太师高冢洗沧浪[②]。

一抔土护千年骨[③]，万载天知九曲肠[④]。

清瘦中条存故像，芳名涑水抱余香。

登临寒食空回首[⑤]，独乐园前草树荒。

[作者介绍]

钟恕，明南阳府（今河南南阳）人。嘉靖八年（1529）以举人知夏县。政明人和，兴学礼士。建敬一亭、启圣祠，救灾赈荒，重纂县志，政绩颇多。后迁工部主事。有诗名。

[说 明]

诗载康熙、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

诗为作者嘉靖间知夏县时，于清明时节登司马光墓园而作。语言典雅，风格清新。情景交融，抒怀自然。

[注 释]

①阴风：凉风。

②太师高冢洗沧浪：言司马光的坟冢像水洗一样青苍。沧浪：青苍色。

③一抔土：一捧土。抔，用手捧。后称坟墓为一捧土。千年：形容岁月长久。

④万载：犹万年。九曲肠：指司马光忧国忧民的赤心衷情。

⑤寒食：节令名，清明前一天（一说前两天）。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之推事，以介子推抱木焚死，遂定于当日禁火寒食。

谒司马公坟祠作

明·陈凤梧

重垣松柏拱坟祠[1]，石虎莓苔认宋时[2]。
盛德尚传司马里，忠清再勒子瞻碑[3]。
云仍已尽犹香火[4]，昭穆相承是本支[5]。
今日远来瞻扫地[6]，高山流水得吾师[7]。

[作者介绍]

陈凤梧（生卒不详），字文鸣，明泰和（今属江西）人。弘治进士，历任湖广提学佥事、山西提学副使、河南按察使等职，后迁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罢归而卒。

[说 明]

诗载康熙、乾隆、光绪《夏县志》“艺文”。

这首诗包含四层意思：首两句描述了司马光墓祠风物；次两句是称颂司马光的品行与盛德，虽百代之下犹口传于民间，铭记于人心；再两句是说其子孙后代虽已绵远，但仍香火不断，末两句则是表达作者对司马光的敬仰和崇拜。整首诗写得很为文雅而有韵致。

[注 释]

①重垣：重重墙垣。垣，矮墙，也泛指墙。拱：拱卫，环绕。

②石虎：泛指司马光神道两侧的石雕，现仍存，为宋代原物。莓苔：是说由于年淹代远，石雕上已生出苔藓。

③忠清：指宋哲宗为司马光御篆的“忠清粹德之碑”。

④云仍：远孙。

⑤昭穆：古代宗法制度。祖宗在宗庙灵位或坟地葬位排列的次序。左为昭，右为穆。本支：即司马光的这一支系。

⑥瞻扫地：瞻谒拜扫墓地。

⑦高山流水：典出《列子·汤问》伯牙与钟子期故事。后人多用来称知己或知音。

谒司马温公祠

明·李维彦

平生无愧姓名香，走卒儿童岂易忘[1]。
独乐故园应茂□，鸣条高冢向斜阳。
开夷虏国空堪忆[2]，目党人碑漫可伤。
邪正有时公论在，忠清粹德永难忘。

[作者介绍]

事迹不详。

[说 明]

诗载康熙《夏县志》“艺文”。

这首诗写得通俗易懂。起首两句意思是说司马光的平生行事无愧，就连他的姓名也格外馨香，令世人难忘；次两句是描

述司马光故里的遗迹和坟墓；再两句是表明作者对司马光治国功德的追忆和被人诋毁的憎愤；最后两句揭示出“邪正有时，公论自有”的深刻道理。

[注 释]

①走卒：隶卒；差役。宋·苏轼《独乐园》诗有：“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句。

②此句疑指司马光为政时，对北宋边境及少数民族政权实行的优抚政策，使宋王朝得以暂时安宁之事。

赠温公裔孙司马侍御拜扫先陇[1]

明·郭　璟

司马锺灵壮宋朝[2]，首丘奕世枕鸣条[3]。

勋名烨烨乾坤久[4]，□笔巍巍太华高[5]。

赴阙言归留赤子[6]，拒荆首政罢青苗[7]。

忠清粹德源流远，圣代于今有凤毛[8]。

[作者介绍]

郭璟，明夏县（今属山西）人。正统十二年（1447）举人。其父郭龄，授广安县，威惠有声。九年后升重庆知府，累官至参政。郭璟初授真定府训导，升宝鸡教谕。历官廉慎，喜吟咏。

[说 明]

诗载康熙《夏县志》“艺文”。

据首题《赠温公裔孙司马侍御拜扫先陇》，经查阅《夏县志》，这首诗可能是题赠给司马光裔孙司马相的。《夏县志》“艺文”明代吕柟所作《积德之什》文后，有注云：自明以来，定居浙江山阴的司马后裔就有司马恂、司马相者，先后四次至夏县祭扫先茔。并介绍说，司马相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进士，本欲由浙定居夏县，结果因“大狱事执法忤当道”而后卒。侍御即是掌举刻非法等事，所以，综合几方面考证，首题中的“司马侍御”当为司马相。

［注 释］

①先陇：祖先的坟墓。陇，音 lǒng，丘垄。

②锺灵：谓天地间灵气所聚。

③首丘：指不忘故土或死后归葬故乡。奕世：累世，一代接一代。据《夏县志》载，司马光墓地还葬有他的祖父、父、子及很多族人。

④烨烨：音 yè。明光闪烁貌，光盛貌。

⑤太华：山名。即西岳华山，在陕西。

⑥赴阙言归留赤子：指司马光于宋神宗死时赴京吊唁，沿途百姓一再吁请“公勿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之事。

⑦拒荆首政罢青苗：指司马光居相后，

首要的一件政事就是罢去王安石的“青苗法”。荆：即荆公，王安石。

⑧风毛：谓先人遗留下来的风采。

司马温公故里

明·林　梵

走卒及儿童，无不知司马。

勋名赫然垂，早已被朝野①。

洛社耆英会，致政亦赋雅②。

故里久寂寥，谁为继起者③。

俯仰数百年，感怀心独写④。

[作者介绍]

林梵，生平事迹不详。仅知曾于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任官。

[说　明]

诗载乾隆《夏县志》“艺文”。表述了作者对司马光的钦敬，以及对这位先贤后祀寥落的感慨。

[注　释]

①被朝野：遍及朝廷和民间。被：及。

②洛社耆英会二句：宋元丰五年（1082），文彦博留守西京，仿唐白居易“九老会”，聚齐退位后住在洛阳的一批高年老臣，于富弼宅第置酒相乐。十二人中唯司马光一人不及七十岁。宴时，尚齿不尚官，称之“洛阳耆英会”。司马光曾作

《洛阳耆英会序》。致政：归还政事。

③故里久寂寥二句：感叹司马光故里后祀冷清，不知何人能继之而起。寂寥：静寂。

④感怀：有感于怀。独写：独自表述。

重阳[1]后一日谒司马坟祠

明·马 峦

不到坟祠四十年，重来触景倍思前。

颓垣谁护忠清刻，巨石重镌粹德篇[2]。

元祐治功光史册，子瞻文翰播人间。

凄风苦雨从今古[3]，惇汴奸名不与湔[4]。

[作者介绍]

马峦，字子端，明夏县（今属山西）人。力学敦行，平生十分仰慕先贤司马光，因其号“迂叟”而自号为“希迂子”。劲直敢言，待友诚信。著述甚多，有《温公年谱》等。

[说 明]

诗载康熙、乾隆《夏县志》“艺文”。

作者由久未往谒、重来思前兴起，明写对司马光功德之碑遭遇的感慨，实则是对司马光的深深缅怀，倾泻了对章惇、蔡卞一伙奸人的愤慨。

[注 释]

①重阳：农历九月九日。古以九为阳

数，九月而又九日，故称“重阳”。

②颓垣谁护忠清刻二句：苏轼撰书的《司马温公神道碑》被砸毁后，金王庭直又摹刊于四石，嵌于祠堂壁间，后墙壁颓废。嘉靖间，巡盐御史朱实昌选巨石再镌重立。故云。

③凄风苦雨：形容天气恶劣。后也用于比喻处境悲残凄凉。

④惇：即章惇（1035—1105年），北宋建州浦城（今福建）人，字子原。举进士。初为王安石所任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司马光任相后，将其贬黜。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又被起用，任尚书左仆射，借“绍述”之名，大肆攻讦元祐老臣，并毁司马光神道碑。徽宗即位后被贬逐。卞：即蔡卞（1058—1117年），北宋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字元度。蔡京之弟，王安石之婿。熙宁进士。历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侍御史。哲宗立，迁礼部侍郎。绍圣元年为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四年，拜尚书左丞。托“绍述”之说，欺上胁下，陷害异己。徽宗时，为谏官所劾，贬官。后来又起知大名府，擢知枢密院。当时其兄蔡京为相，政事有不协，出知河南。累迁镇东军节度使。也是大肆反对司马光者之一。湔：音 jiān，洗涤。

温公墓碑老杏[1]图诗

明·程文海

精诚可以贯金石[2]，谁谓草木真无情。
君看穹龟涑水公[3]，老杏布护数百龄。
风枝雨叶拥幢盖[4]，荫森若有神物冯[5]。
涑水先生三代士[6]，青春行天和且平[7]。
问学深探古人颐[8]，德化直与元气并[9]。
苏公雄文照四海，比较当世谁轻重。
丰碑俯仰漫兴废，百仆不夺二老名[10]。
由来宋祠圯中叶，已在绍圣非崇宁[11]。
夏耋大夫独好事，异国肯与扶颠倾[12]。
古祠香火今几载，大家深刻罗轩屏[13]。
何人卜居占此土，白云老子今疑丞[14]。
摩挲往事起惆怅[15]，表显更为图丹青[16]。
乃知天地崇至诚，陈根断石犹宠灵[17]。
此心岂有古今异，遗迹诚向天人征[18]。

[作者介绍]

程文海，生平不详。仅知为广平（今河北）人。

[说 明]

此诗刻于石，为明正德十年（1520年）潘选书，知县荣蔡立，现存司马光茔祠。主要是说杏树与章惇等所毁司马光神道碑轶事。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司马光的

崇敬之情，以及由此事而对“乃知天地崇至诚”的人生感悟。

[注 释]

①老杏：即金皇统年间王庭直发现的那株保护宋时龟趺的杏树。明时犹在，约有二百余年树龄。

②精诚可以贯金石：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③穹龟：即宋时所立司马光神道碑的大龟趺。穹：高，大。

④幢盖：旌旗和伞盖。这里比喻树冠茂盛的样子。

⑤冯：音 píng。同“凭”。依仗，倚托。

⑥三代士：指其祖炫、父池及司马光本人三代均为官。

⑦青春：本指年少，亦引为青年。行天：志气凌云意。

⑧问学深探古人颐：意即求学追根，学问可直比古人。颐：音 yí。下颌。

⑨德化：以德感人。元气：指天地未分之前混沌合一之气。也用以指人的精神、生命力。

⑩二老：指苏轼与司马光。

⑪由来宋祠圯中叶二句：意谓司马光之祀中断于绍圣年间。

⑫夏耋大夫独好事二句：意思是说，

唯金皇统间县令王庭直喜做好事，虽然时代已非宋时，但他犹顾念先贤司马光，再将神道碑摹刊于世。耋：音 dié。老，寿。六十岁以上曰耋。泛指年高。颠倾：陨落倾倒。

⑬大家深刻罗轩屏：是说司马光这位著名人物深深地刻在了罗轩屏上。大家：自成一家的著名人物。深刻：镂刻很深。

⑭白云老子：碑文序言有“白云翁”，即此。疑丞：古官名。传说供天子咨询的官。参见苏轼《司马文正公铭》注⑤。

⑮摩挲：同“摩娑”。抚摸。惆怅：因失意而感伤，懊恼。

⑯丹青：图画。

⑰陈根断石：指杏树和砸毁的司马光神道碑。宠灵：犹恩宠，宠异。

⑱征：证明，验证。

谒司马先生祠

明·王　溱

矫矫温国公[1]，进退一何舒[2]。
洛社随耆英，翛然赋闲居[3]。
一朝登政府[4]，□□□枢□。
儿童识姓字，故旧寂无书[5]。
有旧亦不嫌，无书亦不疏[6]。
悠悠玄化流，日月自盈虚[7]。
君子道有常[8]，小人则不如。

感时悲且歌，结思聊以纾[9]。

[作者介绍]

王溱，生平不详。仅知为开洲人，号“玉溪先生”，曾任平阳知府。

[说 明]

此诗刻于石，现存司马光茔祠。约于明嘉靖四年（1525 年）谒温公祠而作。夏县尹单彪刻立。

作者从司马光为政进退的角度，肯定了他遇事泰然的豁达态度和自然超脱的精神，抒发了作者郁积已久的感悲思绪。

[注 释]

①矫矫：出众之貌。

②舒：自如。

③翛然：自然超脱貌。翛，音 xiāo。

④政府：唐宋时称宰相治理政务的处所为政府。

⑤故旧寂无书：老友没有书信。故旧：故交，老友。书：信。

⑥有旧亦不嫌二句：意谓有故交来往也不嫌烦，没有书信也不疏远。言其豁达。

⑦悠悠玄化流二句：意谓至德之教化慢慢而长远地流布，就好像日月有圆有缺一样随其自然。玄化：至德的教

化。

⑧道：思想，学说。常：恒久，经常。

⑨结思：郁积的思绪。纾：音 shū。舒缓，解除。

谒司马先生祠

明·吕 柟

晓行盐泽畔[①]，白露零群芳[②]。
促驾追王子[③]，言访司马庄[④]。
芦花垂白雪， 菊蕊正悠扬[⑤]。
睠此苦池水[⑥]，长途何莽苍[⑦]。
志在警枕前[⑧]，道于击瓮行[⑨]。
猛虎产深谷，顾子犹慈祥。
嗟彼泽中虺，兴心毒未央[⑩]。
日月毓生物[⑪]，楚丘咏终臧。[⑫]
安得生羽翰，长啸学归旸[⑬]。

[作者介绍]

吕柟（1479—1542年），明陕西高陵人，字仲木，号泾野。正德进士，授修撰，为宦官刘瑾所忌，托病而去。世宗时官至南京礼部侍郎，与湛若水等共主讲席。时王阳明、湛若水的学说盛行于世，他独宗程、朱之说不变。吕柟曾任解州（今属山西）等地知州，政绩颇著，并留

有许多碑文刻石。著作有《四书因问》、《泾野集》等。

[说 明]

此诗与王溱诗同刻一石。作于明嘉靖年间。当时王溱往谒司马光坟祠，吕柟作陪，各有吟咏。

吕柟此诗既交代了二人这次出访的目的，又用清新的手法，描绘了沿途秀美而雄浑的盐湖风光。再后直奔主题，抒发胸意，以表达对司马光高深志行的欣羡和赞美。

[注 释]

①盐泽：指今山西运城盐池。又名解池。因其地旧属解州，故名。盛产盐，有解盐、河东盐之称。

②白露零群芳：言秋天的露水凝为霜后百花因之而凋谢。白露：《诗·国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零：落。

③王子：指王溱。子：尊称。

④司马庄：即司马光故里。

⑤悠扬：飞扬，飘忽起伏。

⑥睠：音 juàn。同"眷"，反顾。

⑦莽苍：空旷无际貌。

⑧警枕：司马光为了发奋学习，特为自己做了一个圆木枕头，小睡犹可，稍一转身，则木滚头落，随之警醒，尔后继续

挑灯夜读。故名之为“警枕”。

⑨击瓮：即人们耳熟能详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⑩猛虎产深谷四句：借以说明司马光的爱民之心和兴国壮志。泽：水聚会处。水草丛杂之地也称泽。虺：音 huī。毒蛇。《楚辞·天问》：“雄虺九首。”未央：未尽。

⑪日月航生物：太阳月亮孕育着有生命的物质。航，方言，怀孕，孕育之意。生物：有生命的物质。

⑫楚丘：复姓。战国齐有楚丘先生，年七十，披裘带索往说孟尝君。借喻司马光。咏终臧：交谈最终的善言。咏：曼声长吟。臧，音 zàng，善。

⑬羽翰：用羽毛做的笔，即毛笔。古人常用羽毛为笔，故以“翰”代称。长啸：悠长的鸣声。

谒公祠墓

明·王溱 吕柟

涑水萦环司马林[①]，长松原上昼阴阴[②]。

石麟无语自终古，相业有光还到今[③]。

荆国何心偏见左，宣仁虽女亦知钦[④]。

仰高此日登临望[⑤]，南畔条山几翠岑[⑥]。

［作者介绍］

见前《谒司马先生祠》诗。

[说 明]

此诗亦刻石，与前二诗为同时所作。诗前并有序云："维嘉靖四年十月丁亥，平阳知府开洲王溱乃偕解州判官高陵吕柟，谨以瓣香清酒，敢告于宋丞相太师温国文正公神道前曰：溱等晨披霜露，来自安邑，敬申瞻拜，罄兹仰止。"明白地道出了他们此行的目的与心意。

[注 释]

①司马林：即司马光墓地。林：喻人或事物的会聚丛集。前注已说，司马光墓地不仅葬其本人，还有其先祖及叔伯兄弟及后代多人。

②阴阴：阴森。

③石麟：指司马光神道前的石虎、石羊、石人等。相业：宰相的功业。

④荆国何心偏见左二句：是说王安石你为何那样偏执相左，而高太皇太后身为女性，却也知道敬重他（司马光）。荆国：即王安石，其封号为"荆国公"，世称"荆公"。

⑤仰高：即高山仰止，意谓仰望司马光。

⑥条山：即中条山。岑：音 cén。小而高的山。

司马温公赞

清·康　熙

仁英继统[1]，韩富当朝[2]。
谐孝两宫[3]，伊韩之劳[4]。
爰有温公[5]，维持左右。
直斥守忠，议礼匡救[6]。
熙宁元丰，新法聿行[7]。
惟公上言，辨之甚明。
宣仁临朝，自外召之。
爰立作相，心乎好之[8]。
惟士与民，万口如一。
佥曰休哉[9]，相我君实。
既遇其时，亦伸其志。
有猷有为[10]，补偏救弊。
惟公一生，悉本于诚[11]。
言可对人，达于生平[12]。
德化遐宣，膏泽普沐[13]。
于何见之，社祭尸祝[14]。

[作者介绍]

康熙，清世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1611—1722年在位。八岁即位，年号康熙。平定三藩叛乱；攻灭台湾郑氏政权，备御西方殖民者侵略；出兵驱逐沙俄侵略军，遏制沙俄侵华野

心，确定中俄东段边界；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治理黄河，减轻水患，保证大运河畅通；进行全国土地测量；编撰《全唐诗》、《康熙字典》等。

[说 明]

诗载乾隆《夏县志》“艺文”。题曰“御制”，选录自《乐善堂全集》。“乐善堂”，为清康熙第七子弘瞻（怡亲王）书室名。

本诗是从一个封建帝王的眼光和立国施政的角度来评价司马光的。无论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怎样，但其至少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只要诚实做人，对天下百姓有恩惠，就一定会受到世人的拥戴和崇敬。

[注 释]

①仁英：指宋仁宗（赵祯，1023－1063年在位）、宋英宗（赵曙，1064－1067年在位）。

②韩富：即韩琦（1008—1075年）、富弼（1004—1083年）。韩琦，宋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字稚圭，自号赣叟。天圣进士。累迁右司谏，曾一次劾罢宰执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人，为时论所称。建议多被仁宗采纳。与范仲淹共事，和睦

有方，时称“韩、范”。支持“庆历新政”。嘉祐三年（1056年）拜相。英宗即位，封“魏国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和司马光、富弼等一样，与王安石政见不同。

富弼，宋洛阳（今属河南）人，字彦国。与范仲淹等推行“庆历新政”。至和二年（1055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称“贤相”。英宗继位，拜枢密使，封“郑国公”。熙宁二年（1069年）拜相。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求退，出判亳州。后又被劾降官。

③谐孝：合和与善待。谐：合和，协调。孝：旧时称善事父母为孝。《书·尧典》：“克谐以孝。”

④伊韩：伊疑指伊尹。韩，不详。

⑤爰：音 yuán。语助词。《诗·邶风·凯风》：“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⑥守忠：即任守忠（约990－约1068年），宋人，字稷臣。宦官。章献刘太后垂帘时备受宠信。仁宗亲政，出为黄州都监。宋、夏战争时，为秦凤、泾原州都监。后为宣政使、入内都知。仁宗未有后嗣，拟为英宗。他则欲立昏弱者以便操纵，司马光先后多次上书弹劾。英宗即位，又离间英宗与两太后，再遭司马光怒斥，将其贬为保信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

⑦聿：音 yù。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

⑧好：音 hào。喜爱。

⑨佥：音 qiān。皆，从。休：美善。

⑩有猷有为：既有谋又有作为。猷：音 yóu。谋划，或道，法则。

⑪悉本于诚：苏轼《司马温公神道碑》即总结道，司马光之所以"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如果不是"至诚一德"，怎么中外之人会那样感念他呢？

⑫言可对人：《宋史·司马光传》载，司马光自少至老，说话做事从不妄为，他常说："我并无任何比别人强的地方，只不过平生所为，没有不可对人讲的而已。"其诚心天性，为天下所信所敬。

⑬德化遐宣二句：是说司马光的道德与教化声名远扬，恩惠犹如膏雨一样普施于民，滋润百姓。遐宣：远扬。膏泽：犹膏雨。

⑭于何见之二句：是说在什么地方才可以看到他的"德化"与"膏泽"呢？那就是家家烧香，户户祭祀。社祭：祭地神。这里泛指祭祀。尸祝：立尸而祝祷之，表示尊敬。又引申为崇拜的意思。

谒司马温公祠

清·杨愈□

百代名祠桧柏林，若堂封在郁森森[①]。
友恭伯仲图形座[②]，俎豆春秋陟降临[③]。
当代盐梅伊吕业[④]，编年全鉴孔颜心[⑤]。
榱题遥带河山拱[⑥]，奕叶犹传祖德深[⑦]。
登堂起敬拜如罗[⑧]，碑断文残自洗磨[⑨]。
祇为中情深向往，遂轻百里远经过。
天空日白廊阴转，云散霞红杉影多[⑩]。
宋社已墟元老没[⑪]，无边霜露起吟哦[⑫]。

[作者介绍]

杨愈□，生平不详。

[说 明]

诗载乾隆《夏县志》“艺文”。题下有记曰：“祠列数像，外存遗冢。”可见当时塑像尚存。

从诗中看，作者是因对司马光极度向往和仰慕，远道而来特地拜谒的。言词间无不充满着作者对这位贤哲的敬重和感佩。

[注 释]

①若：助词，无义。或作如，好像。堂封：宰相的封邑。《新唐书》一二七《源乾曜传》：“帝乃诏中书、门下共食实户三百，堂封自此始。”

②友恭伯仲图形座：意谓兄弟按照应在的位置来排列而座。友恭伯仲：兄弟相亲。古礼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伯仲：兄弟。图形：画像。《宋书·礼志》四："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这里的"图形"，疑指塑像。据光绪《夏县志》，司马光祠堂供奉四代，即其父司马池、其兄司马旦及司马光本人，其子司马康、其后裔司马朴。

③俎豆春秋陟降临：意谓按时祭祀，祈求上天及祖宗默佑。俎豆：均为古代宴客、朝聘、祭祀用的礼器。俎，音 zǔ，置肉的几案；豆，盛干肉一类食物的器皿。这里指祭祀、崇奉。春秋：岁月，四季。岁有四季而以春秋代表之。也可作春秋二祭。陟降：升降，上下。古称天及祖宗之默佑叫陟降，言往来于天人之间。陟，音 zhì。

④盐梅：鹹盐和酸梅。盐梅为调味之品，用以比喻整治国政。后来诗文中常以"盐梅"指宰相或职权相当于宰相的人。伊吕：伊尹、吕尚。伊尹佐商汤，吕尚佐周武王，都是开国元勋。伊、吕，古时常常并称，以颂扬人的地位和功业。

⑤编年全鉴：即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编年，以年为纲记述历史，也就是按年代顺序编写史书，史称"编年体"。《春秋》与《竹书纪年》为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时代上起周威王二十三年，下迄五代末，前

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以通史编年，成为编年体的空前巨著。此后，在编年体基础上，宋代袁枢综合纪传与编年体，又创“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编年体合成为我国古代史书三大基本体例。

孔颜：指孔子（前551－前479年）和颜回（前521－前490年）。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世称“文圣”。曾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虽未必完全可信，但至少说明他熟悉古代经典，做过整理工作。他曾长期聚徒讲学，传说有三千弟子，成为儒家学派之祖。其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其思想成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

颜回为其高足之一。勤奋好学，安贫乐道，在孔门中以德行著称，后世儒家尊为“复圣。”

⑥榱题遥带河山拱：名为写景，实则疑为赞扬司马光敢于勇立潮头施政普惠，使四海悦服。榱题：屋檐的椽头，今通称出檐。《孔子·尽心》下：“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遥带：远带。拱：敛手，抱拳。恭敬之态。

⑦奕叶犹传祖德深：是说司马光的祖德深厚，多少代仍在相传。奕叶：累世。

⑧如罗：不知是指司马光坟祠内余庆禅院正殿供奉的佛和罗汉，还是以此来比司马光。

⑨碑断文残：指杏花碑。

⑩天空日白廊阴转二句：写景。杉：木名。

⑪宋社：宋家的社稷。元老：指司马光。

⑫吟哦：朗诵、浅唱。

温公故里

清·江　闿

身系三朝安与危[1]，如公正直石工知[2]。

由来先见原非易，□是新参未败时。

[作者介绍]

江闿，贵州贵阳人。字辰六。康熙举人，举鸿博。康熙三十五年（1691 年）任解州知州。为政简静不挠，有名声。著有《河汾集》。

[说 明]

诗载康熙《夏县志》“艺文”。为江闿知解州时谒司马光故里而后作。全诗没有从正面去高谈宏论，而是从《元祐党籍碑》工匠刻石之事，来侧面反衬司马光在人心目中的地位。文字不多，但言简意赅，干练清新。

[注 释]

①身系三朝：指司马光历仕宋英宗、神宗和哲宗三朝。

②如公正直石工知：蔡京执政后，撰《元祐党籍碑》，颁令刻于全国各州县。长安有一名叫安民的石匠，被征应役刻石，他说“我是个愚人，不知道你们立碑之意。但像司马先生这样的人，其正直坦荡海内皆知，现在说他是奸邪之人，此事我实在做不出。”最后官吏欲治其罪，安民无奈，只好请求在碑末不刻自己的名字。

司马温公墓

清·江　闿

此身病革还忧国[1]，正直无惭表墓碑[2]。

试看晁村无恙在[3]，暴尸发冢果何为[4]?!

[作者介绍]

江闿，见前诗。

[说 明]

诗载康熙《夏县志》“艺文”。

这是江闿又一首凭吊司马光墓诗。风格基本与前首相同。表现出作者对章惇之辈“暴尸发冢”丑恶不义行为的愤慨与轻蔑。

[注 释]

①病革：病危将死。革：急也。

②无惭：无愧。表：彰显。

③晁村：即今司马光茔祠所在地小晁村。据载，此地原无村庄，当初为司马氏守坟者所居之处，而后逐渐形成一个小村落。

④暴尸发冢：系指司马光逝世后，章惇等奏请宋哲宗企图发冢、破棺、暴尸之事。宋哲宗虽以“此非盛德之事”而未予采纳，却下令追回对司马光的赠谥，毁掉所立“忠清粹德之碑”。

谒温公神道碑恭赋[1]

清·司马灏文

何物驮来泰华石[2]，不是赑屃能辟易[3]。
波翻海底轩天门[4]，洛中神龟无脚迹[5]。
曾抱九畴呈卦图[6]，复到禹都凌腰脊[7]。
身高于地经丈余，首尾相悬数十尺。
观者莫不惊雄威，力超狮象通灵魄。
原为宣仁圣母来[8]，相公遗爱镇幽宅[9]。
一朝惇卞谋群奸，碑碎烟荒隧道圻[10]。
鬼神夜哭天为昏，颠倒是非毁旦奭[11]。
此龟腾奔诉玉皇[12]，口吐刚牙如银白。
欲嚼佞臣断头颅[13]，上帝秉公当显赫[14]。
帝谓天理有循环，汝且回旋毋遽迫[15]。
我以杏树覆汝身，春花夏实不敢摘[16]。

大灵稽首蹑云归[17]，稳卧杏根铺锦席。
一梦混沌数百年，桃源不知魏晋客[18]。
忽来旌节绣衣郎[19]，高安朱公方指画[20]。
呼龟龟始抖精神，寻碑碑尚留旧额[21]。
忠清粹德御篆尊，另伐巨珉竖阡陌[22]。
崔嵬直上干青霄[23]，犹见苏公文章伯[24]。
颜筋柳骨摹写工[25]，长在鸣条鸿濛闢[26]。
前有瑶台后稷山[27]，拥护高冢如拱璧[28]。
巡辙之后今许侯，重整碑楼何奕奕[29]。
规模宏敞瞻望崇，墓道环墙无阡隙。
此邦典型推先贤，大吏诸君并担责[30]。
我来拜谒焕然新，输诚纪德追遗泽[31]。
碑前沥酒殊低徊[32]，但见森翳多古柏[33]。
涑水发发漩其南[34]，先公垂训阴德积[35]。

[作者介绍]

司马灏文，为司马光浙江山阴后裔。据光绪《夏县志》和司马光茔祠现存清乾隆十一年（1746）《重修余庆禅院碑记》，可知司马灏文曾为山西沁州牧和太谷县令，并来夏县拜扫先茔，重修城中祠堂，撰《司马温国公祠墓记》等。

[说 明]

文载乾隆《夏县志》“艺文”。为司马灏文于乾隆间来夏县认宗祭祖时所作之一。叙述和赞颂的对象为明代嘉靖二年

（1523）朱实昌重建的“忠清粹德之碑”。碑为螭首龟趺，宋代原物。碑额题作“忠清粹德之碑”，为宋哲宗御篆。高172、宽180、厚54厘米。趺长383、宽180、高135（头部为162）厘米。赑屃下面的底座仍为青石，长310、宽250厘米，厚度不详。石上并有浮雕图案：海波翻滚，龟鱼畅游，壮阔生动。碑身高510、宽176、厚44厘米。形制高大，一派雄风浩气。碑文仍为苏轼所撰，但书迹已非苏轼之笔，而是出于朱实昌之手，颜体正书，字径5厘米。其螭首之大，龟趺之巨，碑身之雄，文辞之美，为华夏碑石之珍品。

作者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大龟和高碑描写得十分生动有趣，借以为司马光吐气，抒发自己的胸襟块垒。

［注 释］

①赋，文体名。汉·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最早以“赋”名篇者一般认为是战国荀卿的《赋篇》。到汉代形成一种特定的形式，讲究语言文采、韵节，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在当时颇为盛行。以后或向骈文方向发展，或进一步散文化。接近于散文的为“文赋”，接近于骈文的为“骈赋”、“律赋”。

②泰华石：大而光泽的石头。泰，大

极，过甚。华，光彩，光辉。

③赑屃：传说中的龟名，强壮而有力。杨慎《升庵集》："俗传龙生九子，……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碑趺即碑下的石座，习惯相沿雕作赑屃的形状，就是取其力大能负重的意思。

辟易：惊退（邪物）。

④轩天门：高高的天门。天门，天上之门。

⑤⑥"洛中神龟"与"九畴""卦图"：巧借"洛书"故事言事。传说伏羲氏时候，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它就是后来的《周易》。汉儒认为，"洛书"即《洪范九畴》。一说禹治洪水时，上天赐给他《洪范九畴》。洛：即洛水，在今河南。神龟：古代以龟甲卜吉凶，故称龟为神龟。九畴：九种法则，即天帝赐给禹九种治理天下的大法。

⑦复到禹都凌腰脊：是说当年出于洛水的神龟，今天又跑到司马光的墓前来为其承重负碑。凌腰脊：撑起腰脊。

⑧宣仁圣母：指高太皇太后。

⑨相公遗爱镇幽宅：是说就连这个神龟也好像受了司马光的遗爱，故而远道而来为他镇守坟穴。相公：指司马光。遗爱：

指遗留给后世的爱。幽宅：坟墓，墓穴。

⑩烟荒：人烟荒芜。圻，音qí。通“琦”。曲折的堤岸。

⑪旦奭：指周公旦、召公奭，均为周初功臣。

⑫玉皇：道教称天帝曰玉皇大帝，简称玉帝、玉皇。

⑬佞臣：奸臣。

⑭上帝：天帝，天神。显赫：形容声名昭著或权势熏灼。

⑮遽迫：畏惧、着急。

⑯夏实：夏天的果实。

⑰大灵：即神龟。稽首：旧时跪拜礼。有二说：一是行跪拜礼时，头至地；一是行礼时，两手拱至地，头至首，不触及地。头若及地，曰稽颡。蹑云归：踏云而归。

⑱桃源不知魏晋客：晋·陶渊明《桃花源记》里虚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乐土中，人人丰衣足食，怡然自乐，居然不知到了何时何代，也不知世间还有祸乱忧患。后因称这种理想境界为“世外桃源”。

⑲旌节绣衣郎：指朝廷官员，即下句所说的“高安朱公”。旌、节，均为古代为官者所持的朝廷发给的职务信物。这里指朝廷官员。绣衣。华丽、精美之服，借指显官。

⑳高安朱公：即巡御史朱实昌，明江

西高安人。指画：指点规划。画，通“划”。

㉑旧额：宋时所立“忠清粹德之碑”额。额，指碑额，也就是碑首。其上或刻螭、虎、龙、雀以装饰，书额字体多用篆隶，篆书称篆额，隶书称题额。

㉒另伐巨珉竖阡陌：言另行选采高大而且质地良好的石头刻碑，并将其竖于司马光墓道。伐：采伐。珉：音 mǐng。似玉的美石。阡陌：田界，或田间的小路。在这里应当指墓地神道。

㉓崔嵬：高耸貌。干青霄：高及云际。

㉔苏公：即苏轼。文章伯：对善写文章者的尊称。同“文伯”。伯：文章出众或擅长一艺的人称伯。如诗伯、匠伯，还有这里的“文章伯”等。

㉕颜筋柳骨：指书法而言。颜即颜真卿，柳即柳公权，二人皆为唐代大书法家，其字遒劲有力，故世人常常将二人并称。摹写：依样描写。古人立碑，常用此办法。

㉖鸿濛：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闢：音 pì，开。

㉗瑶台：山名。在山西夏县城东五里。孤峰峭拔，苍翠摩空，旧时为游赏之所，中秋尤盛。夏县古八景之一。稷山：稷王山。在夏县城西七十华里，相传后稷刚刚生下来，被抛弃于此，故名。

㉘扶护：扶助，保护。拱璧：大璧。拱，两手相合。两手相合抱一璧，故为大璧。

㉙巡辙之后今许侯二句：是说继朱实昌之后又有一位姓许的人，将碑楼再修，使之焕然一新。巡辙：沿着前辙。许侯：据乾隆《夏县志》“职官”，名为许日炽，南海人，以进士授夏县，政声颇隆，并重修温公祠墓、碑亭。后升解州，历官右江道。奕奕：高大，盛美。

㉚此邦典型推先贤二句：是说这个地方为了树立典型推崇先贤，各位当政者都尽了职责。先贤：古代的贤人。推：举荐，尊崇。大吏诸君并担责：据作者夹注，当朱实昌选石立碑时，曾给下属官员都分有责任，要求捐俸修碑楼。

㉛输诚纪德追遗泽：谓诚心地记下他们的功德，追思他们的恩泽。输诚：表达诚心。

㉜沥酒：奠酒。低徊：徘徊：来回走动。

㉝森翳：林木之茂。

㉞发发：快速貌。漩其南：流绕其南。

㉟阴德：暗中施德于人。

谒司马温公祠堂坟寺

民国·赵炳麟

我为御史时，曾得司马砚。

器之题跋东坡铭，手持进讲迩英殿。

得砚之时我壮年，时人谬许继铁面。

吾友谏官新昌胡，长歌和我泪如霰①。

是时末政已不纲，须臾竟遇沧桑变。

吏隐忆复司马渠，手批公牍奖其善②。

今来展谒名公坟，趋旁更瞻香火院③。

形象犹存赣直神④，裔孙时有馨香荐⑤。

折纹虽新碑复竖，杏花早萎谁人见⑥。

况际神州已陆沉，四郊正聚蜗牛战⑦。

遗碑断没宿草多⑧，传家一集孰修缮⑨。

天苍苍兮地茫茫，应瞻中国生邦彦⑩。

[作者介绍]

赵炳麟，民国时人，生平不详，据诗句仅知曾做御史。

[说 明]

诗为刻石，现存司马光茔祠，据作者题记，这是民国十四年（1925）重阳节前二日，他与安邑县令郑有愚一同前去司马光茔祠拜谒而作。郑有愚，名裕孚，广西桂林人。历知山西神池、和顺、清源、崞县、临晋、临汾等县，能文章，有政绩。

[注 释]

①我为御史时八句：据作者自注云，宣统二年（1910）他曾得到一方司马光用

过的砚，并做诗记述了这件事。他的好友胡思敬为此作诗相和。诗见《柏岩诗存》卷三。题跋：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前面的文字叫题，后面的文字叫跋。东坡：苏轼字。

迩英殿：为北宋宫廷殿宇之一。司马光常于此为神宗、英宗进讲《资治通鉴》。

谬许：错许。铁面：喻刚直无私。北宋赵抃为殿中侍御史时，弹劾不避权贵，京师号为“铁面御史”。这里是说大家错将这个称号加给他（赵炳麟）。和：音 hè。应和。

霰：音 xiān。雪珠，雨点下降遇冷凝结而成的微小冰粒。

②吏隐忆复司马渠二句：作者自注云：“六年前（即民国九年），夏县知事呈报复修司马渠，余手批奖其民。”司民渠，据光绪《夏县志》：“相传为温公（司马光）开浚，以灌田园，故名”。吏隐：旧时士大夫常以官职低微，自称“吏隐”。公牍：公文。

③香火院：即司马光茔祠内的“余庆禅院”。创建于宋元丰八年（1085），专为司马光先辈守墓而设。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卒后，便主要成为司马光的香火院。

④赣直：刚正。神：神情容色。

⑤馨香：香美。馨，音 xīn。香气远

闻。荐：进，献。

⑥折纹虽新碑复竖二句：还是说杏花碑事。

⑦况际神州已陆沉二句：是说当时国土沉沦，正在作战。陆沉：喻国土沉沦。蜗牛战：疑为“蜗战”。即为琐细之事而引起的争斗。

⑧宿草：隔年的草。后喻墓地。

⑨传家一集：即指《司马文正公传家集》。

⑩邦彦：国中英俊之士。

故赠太师追封温国公司马光安葬祭文

宋·赵　煦

呜呼[1]！元丰之末，天步维艰。社稷之卫，中外所属[2]。惟是一老，屏予一人[3]。名高当世，行满天下[4]。措国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5]。岁月未周，纪纲约定[6]。天若相之，又复夺之[7]。殄瘁不衰，古今所共[8]。知之者神考，用之者圣母[9]。驯致其道，太平中期[10]。长为宗臣[11]，以表后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怀[12]。

［作者介绍］

赵煦，即宋哲宗（1077—1100），神

宗之子。元丰八年（1082）立为太子，同年三月即位，时年尚幼，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改次年为元祐元年。陆续起用旧党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为相，罢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八年（1093）太后死，始亲政，改年绍圣，明令绍述神宗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旧党，起用新党章惇为相，曾布、蔡卞等为执政，次第恢复新法，史称“绍圣绍述”。在位十六年。

［说 明］

此文选自《唐宋八大家全集·苏轼集》（2000 年 9 月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为内制祭文。“内制”，是唐宋时期由翰林学士所掌写的皇帝诏令之称。

唐初，中书省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命，没有内外制之分。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始置翰林学士，掌内制；中书舍人只掌外制。宋代，翰林学士带“知制诰”的叫内制，其他官员带“知制诰”的叫外制。后来也因称翰林学士为内制。

由此可见，这篇祭文是由苏轼起草，以宋哲宗名义而出现的，所以祭文的口气完全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的。

据《宋史·司马光传》，司马光卒后，太皇高太后听到噩耗十分悲恸，领着年幼

的哲宗亲临其丧，哭之甚哀，以致停朝三日，并赠之“太师”、“温国公”，还有一品礼服，银三千两，绢四千，用龙脑水银以敛。又命户部侍郎赵瞻护其灵柩归葬夏县。这篇祭文用于司马光安葬之时。

[注 释]

①呜呼：叹词。表示哀叹悲伤。古祭文中多用此词。后来又以此作为“死”的代词，与“呜呼哀哉”同意。“呜呼”另有一意，即表示赞美。如《尚书》：“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

②元丰之末四句：是说元丰末年，国运多艰，举国上下包括外夷，都在企盼着栋梁之臣出现。因为，当时宋神宗赵顼（1048—1085）死，哲宗赵煦（1077—1100）才九岁。天步：国运，时运。社稷：国家。卫：保护。属：同“瞩”。

③惟是一老二句：意为唯有这位老者，是护卫辅佐我的人。屏：指障蔽或捍卫之物。

④行：德行。

⑤措国于太山之安二句：意谓将国家安置得稳如泰山，治理政事都能涉及根本。措，安放。太山：即泰山。

⑥岁月未周二句：意谓时间不到一年，法度已基本定下。据《宋史》，司马光为相

八月即卒，故云。纪纲：法度。

⑦天若相之二句：是说老天如果是扶助他，却又为何夺他而去呢？相：辅助，扶助。之：代词，指司马光。

⑧殄瘁不哀二句：疑文字有误。殄瘁：困病，困苦。殄（音 tiǎn）、瘁，皆为病。《诗·大雅瞻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哀：怜惜。

⑨知之者神考二句：是说了解司马光的人是宋神宗，而任用司马光的人是高太皇太后。

⑩驯致其道二句：是说逐渐达到司马光的治国之道，有望太平盛世。驯致，逐渐达到。《易·坤》：“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⑪宗臣：人所宗仰的大臣。《汉书》三九《萧何曹参传》赞：“唯何、参擅功名，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为一代之宗臣。”

⑫庶知予怀：即希望能知道我的心意。庶，副词。表示希望。

祭司马君实文

宋·苏　轼

左仆射赠太师温公之灵。

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惟时与人，鲜偶常奇[①]。公事仁宗，百

未一施。独发大议，唯天我知[2]。厚陵之初，先事而规。帝欲得民，一导无私。母子之间，莫如孝慈。人所难言，我则易之[3]。神宗知公，敬如筮龟。专谈仁义，辅以书诗。枉尺直寻，原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谁欺。

退居于洛，四海是仪。化及豚鱼，名闻乳儿[4]。二圣见公，曰予得师。付以衡石，惟公所为。公亦何为，视民所宜。有莠则锄，有疾则医。问疾所生，师老兵疲。和戎上策，决用无疑。此计一定，太平可基。譬如农夫，既辟既菑。投种未粒，刈获而炊[5]。宾客满门，公以疾辞。不见十日，入哭其帷。天为雨泣，路人垂涕。画像于家，饮食必祀。刈我众僚，左右畴咨。共载一舟，丧具缉维。终天之诀，宁复来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呜呼哀哉。尚飨[6]！

［说 明］

选自《唐宋八大家全集·苏轼集》。

据宋人笔记记载，当司马光去世的时候，皇帝正率领大臣们举行明堂祭拜的重大典礼，大臣们因此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去

奠祭司马光，等到所有的仪式都完了，大家都希望尽快赶去吊唁，但当时替皇帝讲学的程颐却根据儒家的礼法，拦住大家。他引用《论语》孔子所说“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说他们刚参加了明堂吉礼之后不该又去吊丧。大家都觉得这不近人情，所以就有人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个性朗达，平日又不拘泥于古礼，所以又大大讥讽了程颐一番。于是大家以苏轼为首，带了祭文，不顾程颐反对，前去司马光家中奠拜。不料这位程老夫子竟事先赶到司马光家，先将司马光以古礼入殓，再用锦囊裹其尸，并嘱咐其子孙们不得接受悼祭。等苏轼与苏辙等人到了，发现程颐已在那里，本来心里就很不高兴，于是苏轼便又狠狠地讽刺了他一番，并说：“你这些礼节还是有些疏失不周，应该写个信物，送给闫罗王。”程颐个性严肃，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自然对此难以接受，从此两人失欢。

这篇祭文，就是苏轼为其生前挚友而作。叙述了自宋仁宗以来至宋哲宗时司马光的政治作为，以及臣僚们对他的感念。同时，对友人的逝世深表哀思和祭奠。

[注 释]

①百世一人四句：感叹人才难得，时

机难遇。百世、千载，形容岁月长久。

鲜偶常奇：言人才与机遇很难两得。鲜：少。偶：双。奇：音jī，单。

②公事仁宗四句：言在宋仁宗时期，司马光的作为并未发挥。因为他当时官低位微，而且多辗转于地方上。尽管如此，他还是怀着“忠君”“利国”之诚，向仁宗多次上策建言。

③厚陵之初八句：言宋英宗即位后，因生重病，不能亲政，由皇太后曹氏垂帘，代管军国大事。当时，北宋统治表面平静，实际上内外矛盾尖锐，危机四伏。尤其是英宗与不是亲生母亲曹太后的不和，加上有人从中离间，两宫矛盾日益加深。司马光苦口婆心，从中加以劝导，终于使母子关系和好。

厚陵：宋英宗赵曙陵名“永厚陵”，宋人亦以“厚陵”称英宗。

④神宗知公十四句：是写司马光在宋神宗时的为政与著述情况。

筮龟：二者都是用来占卜吉凶的。意指对司马光的倚重。仁义：古代一种含义广泛的道德观念。书诗：即《尚书》、《诗经》，泛指儒家经典。

枉尺直寻：屈一尺而得伸八尺。指小有所屈而大有收获。枉：屈。直：伸。

寻：古代以八尺为一寻。仪：法度，标准。

化及豚鱼：言司马光的德化之深广。

⑤二圣见公十八句：言宋哲宗高太皇太后起用司马光后，所采取和进行的一系列措施与方略。衡石：比喻分量很重。

既辟既菑：言既要开垦田地，又要杀除杂草。辟：开拓。菑：音 zī，杀草。

投种未粒，矧获而炊：言连颗种子也不放，何从收获来做饭呢？矧：音 shěn。况。又《书·大诰》："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

⑥宾客满门以下至全文完：言司马光猝逝及众人悲悼情形。畴咨：指访问访求之意。

丧具：衣棺之属。奠章：祭文。侑（音 yòu）劝。卮：音 zhì，古代一种盛酒器，这里指酒。尚飨：亦作"尚享"。意谓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旧时祭文常用作结语。

祭司马温公文

宋·范纯仁

呜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龟[①]。笃生我公，为世父师。夷齐之清[②]，渊骞之德[③]。子产之惠[④]，叔向之

直[5]。人擅其一，居以成名。公□众德，乾乾不宁[6]。九流百家[7]，金匮石室[8]。钩索沉隐[9]，裁其失得。根抵治乱，经纶皇极[10]。作为文章，有书秩秩[11]。玄圭大衷[12]，望之萧然。冬暘夏水，赴者争先。仁英两朝，锽锽厥声[13]。国有正人，折奸于萌。荏染柔木[14]，求直于绳[15]。我公尽规，君心则宁。烈烈神考，体貌有德。公献有可，岩岩翼翼[16]。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归休于洛。君则休矣，四方颙颙[17]，君子野人，洎于他邦[18]。闻风怀归，于父于兄[19]。天施不济，惑怨寒暑。公独何施，四海一誉。元丰二年，国有大事。穆穆文母[20]，宥我麟趾[21]。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重万钧。士贺于朝，民歌于廛[22]。农庆于野，兵休于边。燠尔慄寒[23]，养其饥孱[24]。无痡于饥[25]，无休于田。培其本根，枝叶则茂。岂曰我作，宪章惟旧。於赫圣者，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实遗圣子。卷耳思贤[26]，夙夜周京[27]。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来，人之戚嬉。帝之从违，岂人事耶？天实为之。纯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

知，贵相知心。惟公我知，洞达表里。采其所长，谓或可使。申结义好，丘山不移。匪我则然，公实取之。泚泚清洛[28]，独乐之园。嘉华春敷，修竹瘦寒。清酌修然，我招我从。琅琅嘉言，有铭在躬[29]。朝偶乏人，备位枢机。入与国论，获亲风规[30]。六七年间，为益不赀[31]。私祈白首，从公以归。忧劳伤生。公既遘疾[32]，庶几有瘳[33]。卒相王室，国祠既誓。公以丧闻，我心之悲。不获至门，入哭于室。公既大敛[34]，终天之情，不一见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将殁[35]，知免而喜。公身既修，公志既毕。既寿令终，无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万一。任重道远，税驾兹日[36]。庶几念此，以纾我悲。犹有鬼神，实闻我辞。

[作者介绍]

范纯仁（1027—1101），宋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尧夫。范仲淹之次子。皇祐进士。与司马光友善。神宗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且语多激切，出知河中府（在今山西永济市）徙成都路转运使。哲宗立，召除给事中，请去熙丰新法之甚者，但不同意司马光复差役旧法。元

祐元年（1086）同知枢密院事，三年，拜相。反对治蔡确安州诗狱。次年出知太原、河南等府。八年，复相。哲宗亲政后，因忤章惇，累贬永州安置。徽宗立，又除观文殿大学士。召入觐，以眼有病乞归。卒谥“忠宣”。

范纯仁一生平易宽人，为义而挺然不屈。他常说，我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尽。并戒其子弟，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

［说 明］

文载康熙《夏县志》“艺文”。署曰“代范枢密祭司马温公文，宋范舜民”。范枢密，即范纯仁。

张舜民，宋彬州（治今陕西彬县）人，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治平进士。为襄乐令。元丰四年（1081），因做诗述及宋兵久屯失利情形，被劾，谪监郴州酒税。司马光当政时赦还，荐为监察御史。徽宗初，召为右谏议大夫。坐元祐党人，谪楚州团练副使，商州安置。后复为集贤殿修撰。喜论事，以敢言而称。

［注 释］

①畀：音 bì，给予，付与。

元龟：大龟。古代用于占卜。又引申为可作借鉴的前事。

②夷齐之清：即像伯夷、叔齐那样高洁。伯夷、叔齐为商末孤竹君两个儿子。孤竹君在位时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于兄伯夷，伯夷不肯接受。后二人便都投奔到周。到周后，见周武王进军讨伐商王朝，二人均表反对，武王不听，遂灭商。他们又逃到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不食周粟而死。后人多赞其志行高洁。

③渊骞：疑诚实、深远。

④子产：公元前？—前522年。春秋郑国人。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谥成子。自郑简公时执国政，历三朝。当时，晋、楚争霸，郑国弱小，处于两强之间，子产从中周旋，卑抗得宜，保持无事。子产死，孔子称为古之遗爱。

⑤叔向：一作叔响。春秋时晋国大夫。食邑在杨（今山西洪洞东南）。晋悼公时，为太子彪的师傅。晋平公六年（前552年）因其弟羊舌虎和栾盈同党，一度为范宣子所囚。后被晋平公任为太傅。敢于直言，表露政治观点。曾写信指责郑子产的“刑书”。

⑥乾乾：自强不息。《易·乾》：“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⑦九流：先秦诸家学术流派，即儒、

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家。百家：指学术上的各种派别。《汉书·艺文志》载诸子有一百八十九家，以成数而言，称为“百家”。

⑧金匮石室：中国汉代藏重要文书之处。

⑨钩索沉隐：即探索幽渺。

⑩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绪叫经，编丝成绳为纶，统称经纶。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大事。

⑪有书：指司马光所撰《通志》等。秩秩：有顺序貌。

⑫玄圭：黑色的玉，古代帝王举行典礼所用的一种玉器。

⑬锽锽：钟鼓之音。

⑭荏染柔木：出自《诗经·巧言》。荏染：柔弱貌。

⑮求直于绳：意同《荀子·劝学篇》有“木直中绳”语。即木通过墨线方可取直。

⑯岩岩：高峻貌。翼翼：敬貌。

⑰颙颙：音 yóng。仰慕貌。

⑱洎：音 jì，及。

⑲于：助词，无义。

⑳穆穆：端庄盛美貌。文母：《诗·周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文为赞美

祖德之辞，犹言文德之母。文母，后代也用作后妃的美称。

㉑宥：宽宏。麟趾：《诗·周南》有《麟之趾》篇，言文王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无犯非礼。后固以称趾为颂扬宗室子弟之词。

㉒廛：音 chán，民居之域。

㉓燠：热、暖。慄寒：寒冷。

㉔饥孱：饿与弱。

㉕痏：音 wěi，伤。

㉖卷耳：《诗·周南》篇名。贵族妇女怀念远征丈夫之诗。这里指思贤。

㉗周京：遍及京城。

㉘泚泚：音 cǐ，清澈。洛：洛水。

㉙铭：疑指司马光《布衾铭》。据《夏县志》载范祖禹《布衾铭并序》："高平公作布衾铭，以戒学者。公（司马光）爱其文义，取而书之衾之首。"

㉚风规：风教、成规。

㉛不赀：无法估量。赀：音 zī，计量。

㉜遘疾：遭病。

㉝瘳：音 chōu，病愈。

㉞大敛：尸体上穿衣服为小敛，尸体入棺为大敛。

㉟曾子：公元前 505－前 435 年。春

秋鲁国人，名参。字子与，孔子弟子。

㊱税驾：犹解驾、停车。谓休息或归宿。税，音 tuō。解脱。

祭司马温公文

宋·程 颐

鸣呼！公乎诚贯天地，行通神明。徇己者私，众口或容于异论[1]；合听则圣，百姓曾无于间言[2]。老始逢时，心期行道，致君泽民，虽有志而未终，救弊除烦，则为功而已大[3]。何天乎之不吊斯人也，而遽亡[4]。普天兴殄瘁之悲，明王失倚毗之望[5]。如其可赎，人百其身[6]。死生既极于哀荣[7]，名德永高于今古。藐兹羸老[8]，夙被深知，抚官序哀，聊陈薄奠。

[作者介绍]

程颐（1033—1107），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程颢（1032—1085），为其兄，也是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兄弟二人均从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世称“二程”。

早年，二人均在洛阳讲学。期间，受

到正在洛阳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的大为赏识。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死，宣仁皇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回京执政。遂推荐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颐到崇政殿讲学，同时也参与修订国子监的条规。结果程颢还未动身就患病而死，时年 53 岁。

［说 明］

文载康熙、乾隆《夏县志》“艺文”。但作者说法不一。康熙志为“代家君祭司马温公文”，下注：“宋儒程伊川。”乾隆志则谓：“祭司马温公文。”下署“程颢。”程伊川，即程颐。程颢死于 1085 年，而司马光逝世于元祐元年（1086），故程颢绝无可能为司马光写祭文。可见，乾隆《夏县志》明显有误，这篇祭文应当是出自于程颐之手。

家君，即二程之父。名珦。仁宗时为黄陂尉。知龚州、磁州、汉州。累转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有清节之名，文彦博、苏轼等九人表其德行，诏赐帛二百，官给其葬。

［注 释］

①徇己者私二句：可能是说他与司马光的私人关系之好，曾引起别人的议论。

②合听则圣二句：可能是说只要好话

坏话都听，则无事不通，百姓也不会有任何闲言。圣：无事不通曰圣。间：通"闲"。

③老始逢时六句：是说司马光年已垂暮，好不容易逢到机遇，一心希望按照他的治国之道去辅佐朝廷，施惠于民，可惜虽有大志而未能彻底实现，但整治时弊，解除烦法苛政，却已立有功劳。

④何天乎之不吊斯人也，而遽亡：老天为何不怜悯这个人，而让他突然间死亡。吊：悲伤，怜悯。遽，速。

⑤倚毗：依靠。毗：音 pí，辅佐。

⑥如其可赎二句：是言如果能换一换的话，那么即使用"百身"去赎都可以。赎：用财物换回人身自由或抵押品。这里指换的意思。

⑦哀荣：即"生荣死哀"，都尽其盛。

⑧藐：弱小。与前句"名德永高于今古"的"高"而言。自谦。羸老：瘦弱衰老。羸，音 léi，瘦弱，疲病。

⑨夙被深知：即向来深蒙厚知。

温公祠告文

明·司马恂

维景泰四年六月十六日，十二世孙恂致祭于宋太师温国文正司马公

曰：人之有祖，犹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本之大者，其末必茂；源之深者，其流必长。烈烈我祖[1]，起宋中叶。为世巨儒，有功圣门[2]；职当揆路[3]，有功社稷。立言垂□，□功万世。声名振动于夷夏，恩泽渗漏于子孙。是以瓜瓞绵绵[4]，愈久不替[5]。奈何播迁江南[6]，去远宗国[7]，而于我祖之□□不能修，而追远之礼[8]不能举。此恂等为子孙者之罪□□，而水木本源之念未尝忘于心，而涑水鸣条未尝不□□于怀。恂之父庭芳[9]，已尝请于上建祠宇于山阴，像我祖□奉祀之矣。恂也不肖[10]，忝官[11]朝著，奉使于潞，遂得请命恭谒祠下，奠我一觞[12]，陈我心曲[13]，拜瞻德容[14]，悲喜交集，然又拘以法制[15]，不可久留，明当辞去岂胜恋慕。尚飨。

［作者介绍］

司马恂，明进士，司马光十二世孙，浙江山阴后裔，官至国子监祭酒。景泰四年（1453），任礼科给事中，封王潞州(今山西长治)。

［说 明］

文载康熙《夏县志》“艺文”。因印刷不清，故所录部分个别文字阙如。这是司

马恂就职潞州时借便谒祭而作。

全文充满质朴真情，追思了其先祖司马光的功绩，更多的则是寻根认宗，吐露了自己身处江南，追远之礼久未能行，然又时刻未忘木本水源的心曲，表达了一种思祖念祖，但怎奈身在官职，不可久留，只得匆匆辞去的惆怅之情。

［注 释］

①烈烈：威武貌。《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相土，商代的祖先，契的孙子。

②圣门：朝廷。圣：君主时代对帝王的美称。

③揆路：百揆之路。谓宰相。揆：音kuí。社稷：国家。

④瓜瓞绵绵：瓜一代接一代生长，比喻子孙繁盛。《诗·大雅·绵》："绵绵瓜瓞。"瓞：音dié，小瓜。

⑤不替：不衰。替：衰败。

⑥播迁江南：据史载，宋高宗南渡，司马光曾孙吏部侍郎司马伋跟随迁往，因家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

⑦宗国：本族的国家，一说为嫡长之国。这里指本族的根源或祖居之地。

⑧追远之礼：祭祖之礼。祖先虽远，须依礼追祭。

⑨庭芳：为司马光十三世孙司马竹。

⑩不肖：子不似父，后来又称不孝之子为不肖。这里为自谦之词。

⑪忝官：愧居官位。多作自谦之词。忝：音 tiǎn。羞辱，有愧于。

⑫觞：音 shāng，盛有酒的杯子，以酒饮人或自饮。这里指酒。

⑬心曲：内心深处。后称心中委屈之事或难以吐露的情怀。

⑭德容：美好的仪容。敬词。

⑮法制：礼法制度。

祭温公墓文

明·司马垔

维成化十年岁次甲午八月癸未朔初七日己丑，十三世孙赐同进士出身、行人司行人[①]，谨洁牲醴[②]，庶修致祭于文祖宋太师温国文正公曰：

於皇昊天，降福下民。笃生文祖[③]，秉德之纯。维我文祖，天与周还[④]。自强不息，转坤回乾。维宋之祚[⑤]，几绝而继[⑥]。亦既绝只，复偏以系[⑦]。曰谁使然，文祖之德。文祖在天，宋享其泽。岂徒宋人，功在万世。廉贪□薄，久益无弊。嗟予小子[⑧]，获续文传。仰钻之功，实自幼

年。□我文祖，爰锡繁祉[9]。既壮而仕，为世所齿。兹承朝命，出□□边。乃得洁觞，恭奠墓前。穹窿佳城，文祖在兹。精神在天，□余之思。小子孱弱，朝夕敬守。顺于文祖，求善厥后[10]。况我□父，规画素成。文祖相之，歆兹明诚[11]。

[作者介绍]

司马垔，明进士，司马光十三世孙，浙江山阴后裔，司马轸之子。官至福建按察司副使。成化十年（1474）八月，任行人司行人。

[说 明]

文载康熙《夏县志》“艺文”。这是司马垔于明成化十年八月任行人司行人，奉命赍赏边功，途经夏县时谒坟祭奠而作。

[注 释]

①行人：古官名。掌朝觐聘问。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春秋战国时各国皆有。汉代为大鸿胪官，后改称大行令。明代设行人司，复有行人之官。掌传旨、册封等事。

②牲醴：祭祀用的家畜和甜酒。

③笃生：谓生而不平凡。犹得天独厚。

④周还：同“周旋”。

⑤祚：音 zuò，皇位，国运。

⑥几绝而继：几乎断了又将它接上。绝，断。这里指将要灭亡。

⑦系：连接，继续。

⑧小子：子弟，年幼的一辈。这里为司马垔谦称，是对长辈而言。

⑨爰锡繁祉：即赐予厚福。爰：语助词。锡：同“赐”。繁祉：盛福。

⑩厥：之。《书·无逸》：“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

⑪歆：音 xīn，用食品祭祀鬼神。犹言食、享。

明：泛指祭神、供神之物。献给神者都称“明”，如水曰明水，火曰明火，还有明烛等等。

祭温公墓文

明·司马相

维嘉靖六年岁次丁亥春正月己卯朔越三日辛巳，十五世孙刑部主事相，谨以牲醑香帛之奠，致祭于宋太师司马温国文正公之神曰：

维公精诚贯天地，而出处一节；孝行昭神明，而不可磨涅[1]；勋业映古今，而丹青为烈；清白□子孙，岂容迹熄而泽竭[2]。公尝言“积德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而今历数

百年，更十余世，何一线之相承，仅绵绵而不绝。公平生不喜释老③，而今守祠墓者，一二□□，岁奉频繁；而子姓南迁，未有振世之杰④。呜呼！鸣条之阳，涑水洋洋。安平世系，彼天一方⑤。鞅掌王事⑥，洒扫松楸⑦，其在根之蹇劣也耶⑧。呜呼，尚飨！

［作者介绍］

司马相，明进士，司马光十五世孙，浙江山阴后裔。官至刑部主事等。

［说 明］

文载康熙《夏县志》“艺文”。

据明·吕柟《积德之什》记载，司马相未进士前，他时常怅然道：“吾祖温国公直道殊勋，冠绝宋代，乃吾积滞江边不能一还，反不若异姓者之归暘、张谦，何邪?”为此痛心裂骨积二十余年。等到举了进士，仕刑部，终于机会到来。于是日夜兼程赶来夏县，于嘉靖六年（1527）春祭祀祖先，终于了却了夙愿。

［注 释］

①磨涅：磨砺浸染。指经受的考验或外界的影响。

②迹熄而泽竭：遗迹泯灭而恩泽完竭。

③释老：即佛、道。

④振世之杰：特殊、非凡之人。

⑤安平世系二句：言司马氏后裔天各一方。安平：据史载，司马氏出自晋安平献王司马孚，故云。

⑥鞅掌王事：公务繁忙。鞅掌：烦劳。《诗·小雅·北山》："或王事鞅掌"。是说事情繁杂，无暇修整容仪。后谓职事忙碌为鞅掌。

⑦洒扫松楸：指扫墓。松楸：本指松树与楸树，因多植于墓地，常用为墓地的代称。

⑧其在根之蹇劣也耶：意谓为先人扫墓，是礼之当然，岂会在于是距离远近、族派大小呢？其：岂。蹇劣：困顿、弱小。蹇：音 jiǎn。

盖棺毁誉千古事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祖籍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世称“涑水先生”。出生地在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既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名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大家。九百多年来，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人们对他的政治作为各有评价，但对他为中国史学所做的赫赫贡献，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夸。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即曾给予他极高的历史评价，认为他的《通鉴》可与《史记》相媲美，并把他和司马迁并称为我国史学界前后“两司马”。

初识司马光

也许和很多的读书人相同，我首先是孩提时代从识字课本上“砸缸救童”的故事中，第一次听到这位先贤哲人——司马光的大名。

那时候，自己虽然对好多事情还不太懂，但那段有趣生动的故事，特别是司马光惊世骇俗的举动，却着实撼动了我幼小的心灵。我惊羡他的聪明与机灵，更为叹

服他的临危不惊和果敢英勇。因此，在我蒙昧初辟的那段时光，雷锋、王杰、黄继光、刘英俊等，无疑是我眼里的时代榜样，而九百年前的小司马光，则是我心目中的古代偶像！

后来读初中、上高中、升大学，因为一直都处在受教育阶段，古代名贤勤学苦读的故事，自然会从老师的谆谆教诲里和大量有关读书学习的文章中，频频传入耳际与视线。我非但耳熟能详了“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匡衡凿壁偷光”，“车胤以囊盛萤”和“孙康冬夜映雪”等千古佳话，也知道了许多有关司马光与书的美谈。

据说，司马光自幼即与书结下不解之缘。六岁时在父兄教导下开始读书写字。七岁听讲完《左氏春秋》，便能“了其大旨”。此后他每日朝诵夕思，学兴愈浓。当时，跟他一块读书的同伴一旦书能背过，便去玩，他却要坚持背得滚瓜烂熟；晚上还要把当天所学反复思考，直到弄懂，方肯罢休。他觉得，只有多下功夫，多用力气，才能把知识真正学到手。所以，当他年方十五岁的时候，已是“书无所不通”，而且文章也写得古朴、淳厚，文学家苏轼曾评价他的文章，颇有“西汉

之风”。

即便如此，司马光仍不敢满足，整日苦读，以致到了饥渴不觉、寒暑不知的忘我程度。但他还是苦于时间不够用，于是便索性用一截圆木，为自己特制了一个枕头。每当夜读困倦、倒头入睡的时候，只要稍一翻动，圆木即滚，他也随之惊醒，然后继续挑灯夜读。这就是人们常讲的“警枕”故事。

司马光就是凭藉这种苦志劳筋的惊人毅力和勤奋顽强的学习精神，晨昏披览，发奋学习，乃至终其一生。据宋代人马永卿《赖真子》和《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到了垂暮之年的司马光，每天看书学习都到深夜；至五更初，又爬起病老之身，伏案再读。直到临死，他的屋里、床头，依然全是书！

司马光生前不仅喜读书，还爱藏书，而且非常惜书。他书斋里的藏书多达万余卷，虽然翻阅了几十年，犹卷卷整洁，册册如新。他曾对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点本钱，而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惜自己的书籍。”并把自己多年的经验，从收藏、晾晒、翻阅、放置等方面一一传授给其子司马康，这些都确实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可以说，当我青少年时代在校读书时期，司马光的故事和事迹给了我不少教育和启迪。我曾想，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和毅力，没有更多的知识积累，势必会一事无成的。同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也是不会问世的。这，或许不独是我本人的认识和感受吧。

走近司马光

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工作的原因，使我有幸走近司马光。不过，就像去接触一位新识的朋友一样，主要是从生活、为人方面开始，去了解和熟识对方。

原来，祖籍夏县的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时在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 年），当时他的父亲正在那里做县官，所以给他取名曰“光”，以作纪念（又说诞生于四川郫县，乳名“岷”）。其父司马池，历仕真宗、仁宗两朝，官至专门负责皇家藏书兼皇帝顾问的“天章阁待制”和掌管国家盐铁、户部及度支的高级副官“三司副使”，人称“天章公”。清直仁厚，名重一时。

生活在这样一个仕宦家庭，又是家里一个小儿子（他有个比他大十五岁的长兄，名叫司马旦），父母对他的管教却从

未有过丝毫的放松。

据说，在司马光六岁的时候，一次，家里买来些青核桃让他与姐姐吃。结果姐弟俩怎么也将青皮剥不掉。姐姐因事出去后，一个女佣便将核桃放入沸水中一煮，很快就剥开了。姐姐返回后，惊奇地诘问弟弟是谁把青皮脱掉的，司马光随口诡称是他自己剥的。不料，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正好全被他的父亲看到，不禁呵斥道："小小孩子，怎么能信口撒谎呢?!"这件事对司马光教育很大，从此以后，司马光立志再也不说假话，并且就像他的字"君实"一样，一生诚实，为人处事都从不掺假。

据说，一次司马光叫仆人去卖掉他家的马，他再三叮嘱道，"此马夏月有肺病"，一定要给买马的人讲清楚。为此，许多人都笑他太傻。还有一次，他回老家，一个村夫向他提了个古怪问题，司马光一时回答不上来，便老实地承认自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待研究清楚了再作回答。村夫于是逢人便夸，"我曾难倒了大名鼎鼎的司马光!"对此，司马光就像没听到一样。

无论是作为官宦子弟，还是后来做官为臣，司马光始终都崇尚俭朴，厌恶奢

靡。并身体力行，教育后辈。他在晚年时，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给其子司马康写过一封千余字的长信，言辞恳切，事理明晰。真可谓诲之谆谆，诱之循循。信中说："我本贫寒之家，清白的家风世代相承，所以我的性格极不喜欢豪华奢侈。大约在三岁时，家里长者给我做了一件镶金饰银的华美衣服，我一看见就觉得害羞脸红，故而弃之。二十岁考中进士，参加皇帝特设的琼林宴，别人都戴花，唯独我不愿戴，同榜们说，这是皇帝所赐之物，君命不可违，我才勉强戴上一支。平生我都是穿能御寒、食可饱腹而已，但并非故意如此来沽名钓誉，只是随性顺意。别人都以奢靡为荣，我却独以俭素为美。"许多人因此嘲笑他太"固陋"，他也毫不介意。他说："古人都以俭为美德，而今人却讥讽朴素节约的人，这实在是件奇怪的事呢！"之后，他又举出许多历史上和当朝靠俭朴而成就大业、名扬后世，和因追求奢侈、贪慕富贵而一事无成，甚至坏名败家、丧身亡国的正反典型事例，来说明"以俭立名，以奢处败"的道理，阐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深义。

因之，在长达四十八年的为政期间，

司马光在生活上的清俭自守、廉洁自奉的卓然德品，远为一般封建官僚士大夫所不及。宋仁宗曾赐予他价值百余万的珠金，他却三上章奏坚辞不受；别的士大夫家呼婢唤奴，他居然囊中羞涩，买不起一婢；像他一样的官宦，钟鸣鼎食，衣锦室金，他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就是他在洛阳时曾买地修筑的那所“独乐园”，当朝廷使臣光顾时，也不禁为其房舍低矮和陈设简陋而感到寒碜！他的夫人亡故后，居然没有多少钱办丧事，最后只好将自己的一块田地卖了，才送别亡妻。这便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司马光“典地葬妻”。他曾说：“光自结发以来，虽行无所长，然实不敢锱铢妄取于人，此众人所知也。”因此，当他六十八岁溘然卒世，他的室内也是陈设萧然，别无长物。

司马光的这种“清廉”家风，的确也被他的儿子所继承。当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故世后，高太皇太后和宋哲宗念其为国尽忠尽瘁，决定为其举行“国葬”时，其子司马康多次上书，泣血面辞说，他的父亲曾留下遗训，屡诫子孙，死后要从简薄葬。如果把丧事办大了，劳民伤财，这就有失其父遗愿了。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当然，生活在

封建社会高层的司马光，他虽然比同一时代、同一阶级的许多人要俭朴些，但跟广大的黎民百姓相比，又有很大的区别。不过，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司马光犹能在北宋仕风败坏不堪的浊流中卓然兀立，正确地对待荣辱富贵，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良好德行和品质，才博得了世代人们对他的肯定和赞许。

理解司马光

司马光励学洁行的可贵精神和优良品德，无疑已为古今世人所共认，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认识上的差异，人们对司马光的政治评价，历来聚讼纷纭，褒少于抑。司马光曾一度被视为顽固、落后的“保守派”、“复辟派”，甚至是反动的“投降派”、“卖国贼”，近乎丑类和罪人。于是乎，对于他的政治观点、政治作为便不加区别一概否定，对正史和历史笔记中有关赞扬、肯定他的资料一字不提，而对那些否定、贬抑之词，则又全盘相信。这对司马光来说，是极不公允的。

司马光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历史人物，他在政治上是否有过作为，起过作用呢？

通过拜读他的著述，翻检不少有关介

绍和研究他的专著和文章，拨去历史尘封，摒弃政治偏见，我们不难看到，在封建社会的北宋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位有思想、有主张、忠君爱国、勤政为民、操守坚贞、卓尔不群的“忠臣贤相”、“仁人君子”——司马光。

自他于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 年）荣登金榜、步入仕途起，以至到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卒于相位，始终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常常为国事于梦中惊起：“着公服、执手版，危坐久之”，殚精竭虑；即便到了皓首之际，也是“躬亲庶务，不舍昼夜，欲以身殉天下”，以致“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他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宦海沉浮四十八个春秋，只要身当其职，大到王朝立嗣继统、政治举措、人事进退、生民治乱，小至皇帝饮食起居，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以死直谏，无所顾避。如对宋王朝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浪费之时弊，他曾尖锐地指责说：“国库之财，皆是天下生民之膏血，并非哪一人的，怎么能够轻取乱费呢?!”如此之举，足见司马光的谏诤勇气，也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更为可贵的是他的民本思想，认为“为政在顺民心”，并以民心好恶作为行事的取舍标

准。他曾多次上疏，力陈农民疾苦，建议："了解农家之困苦，体察稼穑之艰难。"同时，反对战事，并毫无顾忌地向皇帝揭露战争所带来"人人有丧，户户被惊，号哭之声，弥天亘野，天地为之惨凄，日月为之无色"的悲凉残景，流露出对百姓疾苦的无限同情。

在治理国家的工作作风方面，司马光力主务实，反对虚夸粉饰。认为："夫国家者，必先实而后文。"他所说的"实"，就是指在治理国家中要做实事，求实效，从实际情况出发。所谓"文"，即是"文采之饰，歌颂之声"。否则，浮华自欺，必然导致"文具而实亡，本失而末在"的危险下场。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司马光也特别强调切实慎重，反对专贵言辞和一时表现取才用人的做法，主张将那些德行诚实、工作踏实，并有实际工作能力而恬静待命的"君子"加以选拔，切不可把那些不走正道、玩弄伎俩的"小人"妄加重用。

谈到变法改革和处理与民族政权有关事务问题上，司马光并非如有的人所说的那样"顽固"与"保守"，也并不是对任何改革都持反对的态度。主张当革则革，不当革则坚决不革，改革必须慎重。如在

治平年前后，他就多次指出宋王朝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要求采取措施，革除弊政，如罢招禁军，减少冗兵；施行节用，减少浮费；科场不用诗赋等等。在对待边防问题上，也反对苟安，主张振军经武，反对任意割地求和。至于他不同意变法和反对对外用兵一事，也是基于宋王朝当时的实力和社会客观环境而考虑。对于世俗生活方面的陋习和颓风，如迷信鬼神佛道，大谈轮回转世，讲求阴阳风水，追逐奢华厚葬等等表现，司马光也是力主革除的。

可见，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司马光就是以自己所总结的“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这一治朝理政的主张和原则，去实践“安邦治国”的，反映出司马光为国家致治的良苦用心。

梳理封建时代，有哪一位统治者不是提倡和宣扬良弼忠臣，黎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翘首期望能有一位明辅贤相，司马光的许多施政主张和行为，正是统治者和当时人们各所期盼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益处和实惠，符合渴求安定、和平的国情和民心。这种愿望无疑也是与王安石的最初出发点及其最终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在问题的认识和

处理上，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关于二人的治国方略，在南宋人李焘所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好有一比。王安石认为："治天下譬如医用药，当知虚实寒热。方虚寒时，纯用乌头附子不患过热。"而司马光则认为："治天下譬如屋室，敝则修之，非大坏而不更造，非良匠美材则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矣。"前者治国只考虑能够治好的一面，而后者治国，除考虑到能治好的一面外，同时还考虑到不能治好的一面，足见司马光对政治问题的审慎和老练，这也可能是他从长期的历史资料搜集与研究中，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思维，剖析往古，了解时局，贯穿今古，进而从其得失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和经验。

而王安石恰恰就缺乏这一点。当然，在许多方面和若干问题上，他们还是各有是非，互见高低，有同有异，长短不一。只要我们以史实为依据，设身处地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屏弃以变法和反对变法作为评价他们二人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就一定会对司马光得出一个比较客观而公正的历史结论。

敬仰司马光

由于变法之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司马光于熙宁四年（1071 年）退出政治舞台，隐居洛阳长达十五个春秋，潜心竭力从事《资治通鉴》的著述，至元丰八年（1085 年）书成。从而，为后世留下一部堪与司马迁《史记》相媲美的史学巨著。

事实上，早在他政治生涯如日中天期间，他即有编写一部通史的宏愿。原因是，他在研读古史时，深感《春秋》之后千余年来，《史记》以下至《五代史》卷帙浩繁，非专门学习，一生很难通览。更重要的是为帝王治世，能遍知前世得失，观古而知今，以史为鉴，驾驭好封建统治之“船”。于是他采用编年体例，将上自战国、下至五代，以“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的史实，编成《历年图》（即通鉴提纲）一书进呈英宗。之后首先写出《周纪》、《秦纪》，取名《通志》，深得英宗赏识，并特赐御府笔墨缯帛，诏设书局，命他自选编写人员，续成此书。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赞助下，司马光先后选定了名噪一时、各有所长、且志同道合的史学英才刘恕、刘攽、范祖禹作为他的得力

助手，前后历十九年编修，终于完成了这部记载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凡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编写这样一部巨制鸿篇，其任务之巨，要求之细，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见，而作为这部规模宏伟史著的主编，司马光并未像隋唐以来那些主持官修史书的人一样，只是挂名，不去动手或很少动手，而是从发凡起例、谋篇布局、甄审别择、阐微表幽，以至加工润色、删定成书，都考虑周详，亲自动手。

古代的书多是卷轴式的，每卷长约四丈。司马光给自己规定任务，每天删改一卷；如因事耽误，未能按时完成，便一定要挤出时间追补。据说，由范祖禹分担撰写的唐史部分，初稿多达六百余卷。司马光花费了大约四年的时间，将其删定为八十一卷。包括文章的剪裁，文字的润色，乃至句法的锤炼，尤其是对史料的考订。有人作过一个统计，说司马光为编写《通鉴》，曾查阅了皇家、私家和他个人以及朋友的藏书多达三百余种。司马光死后，有人曾在洛阳发现，《通鉴》草稿充栋盈室，堆满了两间屋子。黄庭坚曾翻阅过其中几百卷，居然没有一笔潦草之字。可见

司马光在治学治史方面是何等的认真严谨。

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于1961年6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赞云："作字方正不仅是写字的问题，而且表现作者落笔不苟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因为这对于那些以轻率潦草的态度对待编写历史的人是一个最好的教育。"

就是这样的"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采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以致使一个当年正值黄金年华的司马光，至《通鉴》完成之日，已是一位"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的可怜老人。他不无感叹地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像这样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呕心沥血，高度认真负责，不惜为事业献身之人及其精神，即便是铁石心肠者，也会为之感动不已，并从内心深处发出崇敬之情的。试问：往古历代修史著书的主编，像司马光这样达到鞠躬尽瘁的程度者能有几人?！试想：以司马光这样史学造诣之高深，又有三位一流的助手为辅翼，又怎能会编写不出高质量

的史书呢？难怪，就连那些在政治方面对司马光极尽贬抑之人，也不能不感佩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最具创见和最具求实的精神”。

《通鉴》自书成问世至今九百余年，不仅成为历代封建帝王安邦治世之“国器”，而且被历朝历代奉为经世致用最经典、最权威的读本，也是后世学者们治史、做学问必读的重要典籍，好评如潮，赞誉迭起。梁启超曾评赞《通鉴》与司马光为“天地一大文”，一“伟人”。毛泽东一生也极为喜爱《通鉴》，居然把《通鉴》阅读了十七遍！并高度称赞：“《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名家伟人尚且如此看待司马光，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敬仰这位先贤哲人呢?!

感谢司马光

从司马光逝世迄今，已有九百余年。历经世代的风霜雪雨，这颗政坛和史学巨星虽曾在历史的天空中或明或暗，但其响亮而伟大的名字，犹如洪钟大吕，一直回荡在千古天地间。

其实，当他还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时候，欧阳修就曾以“社稷之臣”把他推荐

给宋神宗，《宋史》更称其“有旋乾转坤之功”。臣民因受到他的德政，深感“如寒极而春，旱极而雨，如解倒悬，如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引退洛阳时，益发“名震天下”，其名声之大，“如雷霆，如河汉，如家至而日见之”。甚至“军伍夷狄”，以至他的政敌，只要听到他的名字，也“莫不敛衽变色，咨嗟太息，或至于流涕”。苏轼也记载说，当他在元丰末年由登州经过八州入京时，所到之处，就有数千人围聚在他的马前，求他寄谢司马光。这样的感人场面，当时是“千余里不绝”。当司马光领诏从洛阳返回京城时，数万群众都来夹道相迎，以致“民拥其马，至不得行”。到了京师，人们更是“迭足聚观”，有的甚至“登树骑屋”，以睹司马光之丰采。就是常与北宋有矛盾的辽国和西夏使者入朝时，其主子也总忘不了要带话问候。司马光死后，亦极尽哀荣。高太皇太后率领时尚年幼的哲宗亲临其丧，甚至连朝也不上。同时命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碑文，哲宗并亲篆“忠精粹德之碑”额。京师百姓相偕以致奠，商人罢市而往吊。当其灵柩起运夏县时，灵车所经，万巷哭声。京师与各地的士民还纷纷把司马光的遗像“请”

回家里来烧香供奉，以致许多画工因此而致富。可见其德业之盛，声名之隆。这些也都无疑是出于朝野上下，对他忠直无私的操守与德行及其精神与作风的敬重。因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司马光，他所赢得的如此嘉声，又在千载之下，为他的家乡带来无上的光荣，及其在做事、为人、生活、学习等方面，给世人留下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我们更要感谢司马光的，是他为我们留了了《资治通鉴》这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因它“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而且还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巨著。据史料记载，自司马光逝世一月后，《通鉴》始由国子监奉旨在杭州镂版，历时六年而第一次刊行，至今九百多年间，该书至少刊刻过七十多次。印行如此频繁，在我国古代史书刊刻出版史上实属罕见。《通鉴》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不少学者都纷纷仿照《通鉴》体例或方法，撰写刊行了许多类似或相关的史学著作，或穷其一生，以《通鉴》作为研究对象来治学，从而形成一种专门学问——通鉴学。影响最大的，前者如南宋的朱熹与袁枢所新创的“纲鉴

体”和“纪事本末体”；后者如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明代的史学家严衍，均前后用了长达三十年的时间来注释或订补《通鉴》。由于《通鉴》叙事详尽，文笔精练，“叙之井井，不漏不烦”，写人状物，生动具体，形象宛然，故而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

最后，我们还应感谢的是，司马光身后为我们留下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司马光茔祠。它既可令我们借以凭吊这位先贤哲人，抒发思古幽情，更能让我们从中探访和领略中国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风韵。虽然章惇、蔡京之徒对司马光极尽诋毁，以致推倒苏轼所撰之碑，“六贼”之首蔡京一伙又将司马光等人打入“元祐党人”，然而黑碣不复，丰碑再起，司马光的可贵精神和历史功绩，依然垂诸青史，记在人心。一代名臣，杰出史家，已成为历史对司马光的定论。

我们感谢司马光，我们更应该永远记住司马光！

后　　记

这些年来，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特别是学术界实事求是学术空气与日渐浓，介绍和研究司马光的文章层出不穷。他们大多都能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出发，从各自不同的认识角度，对司马光的一生做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给予比较恰切的肯定和批评，这确实是件好事情。

稍稍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主要都是学者专家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涉及的事，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限于时间等原因，很少全看全听。而像这种介绍司马光，能贴近百姓，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诗文形式的书籍，近年来可能还没有面世。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帮助更多的人们从多方位来了解司马光及其所处的历史，尤其是为繁荣旅游事业，编者特从地方志和有关文集中遴选出历代凭吊司马光诗文36首（篇），并加以注释，以便给司马光茔祠这个旅游热点，增添一份新的文化内容。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的每位作者和每首（篇）诗文，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的传统意识和各自的倾向性，还望

诸位读者拨云见日，鉴察分明。

二〇〇三年桃月

杨明珠再识于独乐斋